

XIN WEN JIE

2021年第07期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onthly

# 新闻界



7  
2021

ISSN 1007-2438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资助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



##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控股的大邑安仁老公馆

- 1 老街全景图
- 2 陈月生公馆门楼
- 3 同庆会馆大门
- 4 刘元璋公馆一进院
- 5 明轩书栈
- 6 陈月生公馆主楼



欢迎订阅

# 《新闻界》杂志

思想影响传播 媒介推动文明

240元/年(12期)

## 《新闻界》近年荣誉

-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
-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 2014年中国新闻奖, 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14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201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期刊
- 2015年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期刊
- 2015年四川省新闻二等奖、三等奖
- 2016年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17年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18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7-243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51-1046/G2

编辑部电话: 028-86968866

电子邮箱: xinwenjie66@163.com

刊期: 月刊(每月10日出版)

邮编: 610012

# Contents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P<sub>4</sub> / 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及传播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影响  
文 | 陈力丹 王敏

P<sub>15</sub> / 用红船精神厚植“马新观”  
文 | 徐玲英 童兵

## 数字新闻学·数字新闻与情感转向

P<sub>25</sub> / 数字新闻学的情感转向：迈向新的研究议程  
文 | 凯伦·沃尔-乔根森 田浩

P<sub>33</sub> / 虚拟可导航空间与情感体验：可视化作为数字新闻核心叙事的中国经验与理论前瞻  
文 | 李梦颖 陆晔

## 新闻学评论

P<sub>43</sub> / 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业共识以何达成？  
——基于《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19）的考察  
文 | 朱春阳 钱威丞

|        |                                 |                                        |
|--------|---------------------------------|----------------------------------------|
| 编委会主任  | 李 鹏                             | 李天铎 / 昆山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讲座教授                 |
| 编委会副主任 | 廖 翥                             | 李金铨 /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教授                      |
| 总编辑    | 邓树明                             | Christian Huchs / 希腊雅典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
| 执行副主编  | 李韵奕                             | Graham Murdock /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 编委     | 王炎龙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 Jlises Mejias /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传播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
|        | 张志安 /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 Vincen Mosco / 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        | 刘海龙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                                        |
|        | 展 江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
|        | 常 江 /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                                        |
|        | 曹 晋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                                        |
|        | 冯建三 /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           |                                        |
| 栏目主持   | 常江：数字新闻学 蒋晓丽：博士生新论              |                                        |
| 学术顾问   | 尹 鸿 李良荣 陈力丹 杜骏飞 郑保卫 童 兵 喻国明 蒋晓丽 |                                        |

## 新闻学研究

P<sub>47</sub> / 电视时间：1980-1990 年代电视流的驯化与时空秩序  
文 | 方惠

## 传播学研究

P<sub>55</sub> / 记忆实践：传播学视域下集体记忆研究的路径转向  
文 | 潘晓婷 陈莹

## 传播与社会

P<sub>64</sub> / 平台视域下全国居民疫苗接种的认知、意愿及影响要素  
——基于五大互联网平台的舆情大数据分析  
文 | 喻国明 杨雅 陈雪娇

## 博士生新论

P<sub>73</sub> / “技术去能”与“多维透视”：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图景  
文 | 汤志豪

P<sub>83</sub> / 突破“雅俗之争”：“武器论”与中国摄影观念的范式转移  
文 | 赵鹏

编辑出版 《新闻界》编辑部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 号  
电话 (028) 86968866  
电子邮箱 xinwenjie66@163.com  
邮编 610012  
刊名题写 甘惜分  
投稿渠道 www.xinwenjie.com  
刊号 ISSN1007-2438 CN51-1046/G2  
发地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阅 全国各邮局 (所)  
邮发代号 62-334  
广告许可证 川工商广字 002 号  
印刷 成都鑫达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 2021 年 7 月 10 日

定价 20 元/期  
法律顾问 曾兴圣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 (020) 85350935]

### 版权声明

凡本刊所刊登稿件，即视为作者授权本刊拥有网络传播、图书出版等再使用权，本刊有权决定是否以某种纸质出版或互联网出版形式进行二次出版。作者对此有异议者，须在来稿时特别说明；未经本刊允许，其他刊物或网络不得转载本刊作品；获本刊允许转载者，须注明转自《新闻界》。



# 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及传播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影响<sup>1)</sup>

陈力丹 王敏

**摘要** 一百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伴随着他们传播思想的传入。以往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忽略，藉此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本文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最早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起点，着重研究这两部著作中包含哪些他们的传播观，他们的传播观如何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进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影响。这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作者认为，研究马新观的前提，是要知道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如何走过来的。如果连“来时的路”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不忘初心”便无从谈起。本文做的工作，便是呈现这段“来时的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和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王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二十多年之后，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规模化的传播。这个过程需要从传播的角度加以梳理。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传播：自发阶段

从 1899 年 2、4 月《万国公报》第 121、124 期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大同学》里，中国人先后获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随后关于他们的生平、论著介绍逐渐多起来。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至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五部论著的名称和大体内容得到了传播，即《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哲学的贫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人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 年 9 月，他在《新民丛报》第 18 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图 1）



图1 《新民丛报》第 18 号《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

1)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共建新闻学院专项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原典著作和报刊研究”（GJ2020001）。

十月革命前被介绍最多的著作是《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1903 年 2 月，教育家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文章《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列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就包括这两本书，这是中文书刊首次刊列马恩的著作书目。1904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中国之社会主义》，转述了《资本论》的部分内容。1905 年，《民报》发表朱执信译介的《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项纲领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1906 年，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发表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资本论》的要点，其中“马尔克”（即马克思）一节，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并再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其他论著，1907 年，《天义报》发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部分译文，1908 年，该报介绍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这些刊物都只是将马克思学说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进行介绍，那时对马恩著作的翻译、介绍是零碎的、片段式的，有错误的解读。但不管怎样，开拓了人们的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情况介绍已经很多，这里不再重复。其特点是：未形成规模，在内容上多为提及或摘译，报纸和期刊是主要传播媒体。唯一发表的全译本马克思论著是《雇佣劳动与资本》。1919 年 5 月 5 日，李大钊主持的《晨报》“马克思研究”栏目（第 7 版一栏）从 5 月 9 日至 6 月 1 日，分 24 期连载，标题为《劳动与资本》，译者食力。根据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日文版转译。译者知道原著首次发表于报纸，却不清楚是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译文序言写道：“兹篇系译马克思小著 *Lohnarbeit und Kapital* 原名应直译《赁佣劳动与资本》。兹求简明，特改为《劳动与资本》。是书最初登载德国某报。一八四九年四月四日。始刊发单行本。据本年四月四日。恰满七十年。”“某报”，即《新莱茵报》；4 月 4 日是首发该著第一篇时的讯头日期，发表是在第二天 4 月 5 日。

## 二、中国共产党有组织地翻译和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

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组织建立共产党，先后在北京、济南、上海，会见李大钊、王翔千、陈独秀等人。5 月，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东亚书记处，工作纲要包括“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6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当时仅 5 个人（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独秀为书记。当年发展到 20 多人。8 月，党的早期组织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等。

1920 年 4 月陈望道在义乌老宅的柴房里，夜以继日地翻译《共产党宣言》，随后带着译稿赶往上海交给俞秀松，俞送到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住所）请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这时，原来准备连载该文的《星期评论》因故被迫停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决定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成裕里又新印刷所（寓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印刷，8 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书的封面印有马克思的半身坐像，这也是马克思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出版物上。（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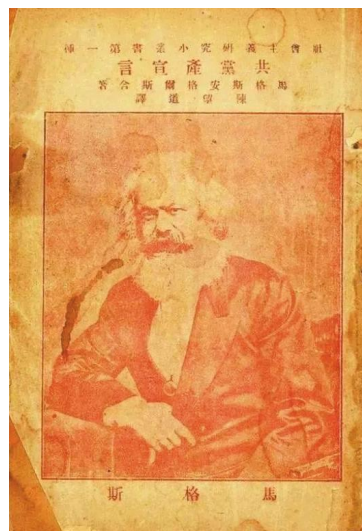


图 2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

1920 年 8 月初版封面

（因为印刷工人的错误，标题排成“共党产宣言”，9 月再版时得以改正）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看到陈望道的译本《共产党宣言》，即兴讲述道：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sup>[1]</sup>

习近平说：“一百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sup>[2]</sup> 1920年夏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上海，他在陈独秀住处看到了正在校对的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的译稿。回到湖南后，他与易礼容、何叔衡等人先后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销售《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书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毛泽东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sup>[3]</sup>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短短的几年里有很多版本。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于1920年9月和1924年9月相继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的上海书店再次出版《共产党宣言》。该书店主要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1924年6月至1926年5月，平民书社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重印17次。1925年4月，广州国光书店、武昌长江书店出版陈望道译本，1926年4月再版，两书店印了近20次。1927年1月，汉口党化社出版以《苏俄政策——共产党宣言》的书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陈望道译本。1930年，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的华兴书局秘密出版华

岗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封面只保留“宣言”二字，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一大1921年8月3日闭幕。十八天后，即9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立第一家党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领导人是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当天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图3），列出了翻译和出版计划，包括“马克思全书”15种。这十五种书的名称是：《马克思传》《工钱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哥达纲领批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乱》《资本论入门》《剩余价值论》《经济学批评》《革命与反革命》《自由贸易论》《神圣家族》《哲学之贫困》《犹太人问题》《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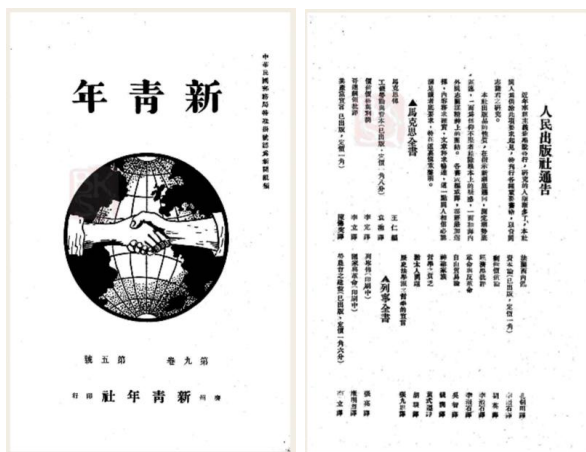


图3 1921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封面以及该号刊登的人民出版社通告

第一年“马克思全书”有三种出版，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即李汉俊译），《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

《工钱劳动与资本》（现译《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是15种马克思全书的第二种，根据1902年纽约英文版译出。此著从1921年起，到1961年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共计有26个中文版本。因为该著连载于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关于《新莱茵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信息，被持续传播而为全党熟悉。

1920年9月,上海新青年社出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翻译的德国马尔西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该书是中国最早译介马克思《资本论》的单行本著作。马尔西(Marry E. Marcy, 1877-1922)是马克思主义者,曾任在美国革命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的编辑。李汉俊根据1919年日本文泉堂出版的远藤无水的日译本《通俗马克思资本论》转译。李汉俊在译者序里说,此书“将马格斯经济学说底骨子即商品、价值、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底关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说明了出来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版再版,随后长沙文化书社、武汉利群书社、济南齐鲁书社、北京大学出版部等代销,成为那个时期“销售最多的书”之一。这本书一度被列为共产党各地初期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重要学习资料。李汉俊(以“袁让”笔名)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和《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同被北京大学“亢慕义斋”保存,并被武昌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和历史社会学研究会、高等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武昌妇女读书会等列为必读书。

毛泽东1920年通过《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接触了《资本论》,他把《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列为“书之重要者”。<sup>[4]</sup>文化书社是1920年9月毛泽东与易礼容等人在长沙组织发起,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书社的重要文告与社务报告多出自毛泽东之手。1921年4月《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中,毛泽东列出售书“排行榜”,在湖南的“销数”第二位的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200本),仅次于《杜威五大讲演》(220部)。

1922年6月,中共中央直接管辖的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李汉俊译)。(图4)《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这两本读物的印行,使人们在此前零星介绍的基础上,对《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有所更深的了解。1924年秋,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曾计划用5年时间翻译《资本论》,“如果能译为《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可是他的宏伟翻译计划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没有获得通过,出版社不敢承担出版《资本

论》的风险。<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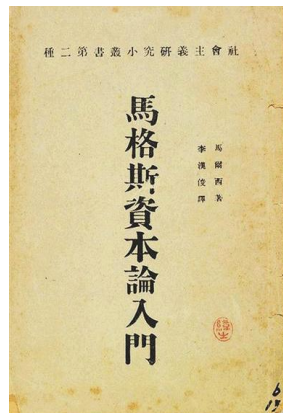


图4 李汉俊译马尔西《马格斯资本论入门》1920年版封面

1925年12月,毛泽民被派往上海领导上海书店和印刷厂的工作。在他领导下,上海书店成立了众多发行分支机构,如广州国光书店、长沙文化书社、湘潭书店等,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国内大江南北的发行网络,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的传播规模得到了很大提升。

1926年6月10日,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的李季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在《学林》第2卷发表《译马克思通俗资本论自序》,批评胡适等人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错漏较多。指出:要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就应将他的一切著作翻译过来,尤其是《资本论》。他推荐了博洽德(Tulian Brhardt)所编纂的《通俗资本论》。博洽德潜心研究《资本论》30年,曾经与他人合作将《资本论》2、3卷翻译成法文。他编纂的《资本论》包含了1-3卷马克思的所有思想,文字通俗,更适合民众阅读,英译本称此书为“民众的马克思”(The Popular Marx)。同月,社会科学社出版了博洽德主编、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1927年10月,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考茨基著、戴季陶等人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这些基础性的关于《资本论》论著,为以后《资本论》全译奠定了学术基础。

将《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由于《资本论》篇幅浩瀚,在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下出版商怕担风险,多年未能如愿。



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陈启修(1886-1960,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教员,1927年武汉《中央日报》总编辑、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总主席。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图5);共产党员潘冬舟(1906-1935)接手翻译,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资本论》第1卷第2册和第3册。由于叛徒的出卖,潘冬舟被蒋介石点名抓捕,1935年牺牲于武昌。与此同时,1932年9月,北京国际学社出版玉枢(侯外庐)、右铭(王思华)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上册;1936年6月,他们的《资本论》第1卷上、中、下三册合译本出版。侯外庐基本完成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第六篇(地租部分)的译稿托人带往延安途中毁于战火。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翻译《资本论》,对我来说实在是艰难。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为依据,找来英文、法文、日文译本为参考,一个词一个词地推敲着前进。若没有神圣的动力,一个从德文字母学起的人,简直是无法坚持下来的。”<sup>[6]</sup>1938年8-9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1-3卷,2000多页、300万字。他们为翻译此书历经10年,遭到过整卷译稿在日寇炮火中被焚毁的灾祸,遇到过翻译工作中数不清难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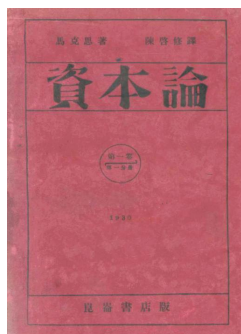


图5 陈启修译马克思《资本论》  
1930年版封面

由于诸多译者坚忍不拔的接力式努力,终于使得人们初窥《资本论》的全貌。

### 三、《共产党宣言》中传播思想的早期介绍与运用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解说和传播,开始于

1921年5月15日。这天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河上肇著、施存统翻译的文章《见于〈共产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说。1921年6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2号刊载李达的文章《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号《社会主义批评》译文刊载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部分内容。8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4号刊载施存统的文章《马克思底共产主义》,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施存统、李达均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员。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6号刊登文章《马克思学说》再次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介绍。

现在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的文章,大多关注的是政治和阶级斗争,忽略了其中包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博大的传播思想。他们这方面的思想,其实已经通过《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渗透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里。

李大钊早在1919年他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五部分就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写道:“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工业及农业上的化学应用,轮船、火车、电报、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开通,如同用魔法唤起的这些人类——在前世纪谁能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能包容在社会的劳动里呢?把这样伟大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像用魔法一般唤起来的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及交通关系——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如今恰如那魔术师自念咒语唤起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却无制御他们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sup>[7]</sup>(现在的最新译文是:“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魔法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sup>[8]</sup>)他的译文涉及的便是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宏观情

形，他就此论证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交通关系”。1922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发表《马克思学说》一文，其中节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也包含了交通关系对开辟世界市场意义的内容，他翻译为“交通手段”；陈望道1920年的首次《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翻译为“交换机关”。

李大钊、陈独秀译文中采用“交通关系”“交通手段”的表述，与当时中国人使用“交通”概念对应，理解是比较准确的，不仅指交通运输，也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比较准确的反映了马恩的原意。但现在的汉语“交通”已经无形中变成了“交通运输”意义上的“交通”，似乎人与人的精神交往无关。与此对应的德文原词是“Verkehrsmittel”，其词根“Verkehr”现在翻译为“交往”，可能是最合适选择，陈望道翻译为“交换机关”，与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翻译的“交换手段”接近。

但马恩使用这个概念的内涵超越了中文“交往”“交换”的涵盖，他们在用英语表达时，“Verkehr”对应的是“intercourse”。无论“Verkehr”还是“intercourse”，既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指精神意义上的信息传递，还指男女间的性爱。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交往”这个概念论证的问题看，它包含了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之间的物质交换和精神传递。因而，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性概念。所以马恩把“电报的使用”列入“交通手段”之内，这说明他们意识中的交往，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恩格斯1894年再度使用“Verkehrsmittel”这个概念时写道：“……依靠了现代的交往手段[Verkehrsmittel]，即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sup>①②</sup>其中“Verkehrsmittel”的内涵，就包含了后面讲的五项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电报尚在试验应用，他们就已经将“轮船的行驶，

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并列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了。这样的认识，很早就被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到，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思想的要点之一。将物质传播与精神交往作为同一个宏观的“大传播”概念进行研究，思想认识高人一筹。

《共产党宣言》还最早论及传播时间对空间距离的影响。陈望道的第一个译本虽然用词现在读起来颇为蹩脚，但马恩的原意翻译还是准确的：“劳动者底团结继续扩大。这种团结，很受了近代产业所造成进步的交通机关许多辅助。因为有了这样交通机关，远方的劳动者也互相接触了。集合同性质的许多地方斗争，团成全国一大阶级的斗争，正有这种接触底需要。但每次阶级斗争，都是政治上的斗争。这样团体，如果教交通不便的中世市民来团结，绝非几世纪不行；多谢铁路与人方便，近代的无产者，只消几年便成就了。”<sup>①③</sup>（现在的最新译文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sup>①④</sup>）对应“交通机关”（现在翻译为“交通工具”）的德文原词，是具有“Kommunikation”词根的“Kommunikationsmittel”。在《共产党宣言》里，“Kommunikationsmittel”与“Verkehrsmittel”是通用的，陈望道那时翻译为“交通机关”，人们可能会将电报包括进去，但当代翻译为“交通工具”，人们不可能把电报、报刊等精神交往的媒介列入其中。

目前我国最新的译文仍这样翻译。例如《资本论》第2卷的最新译文有一段话被译为：“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sup>①⑤</sup>其中“交通工业”的对应德文是“Kommunikationsindustrie”。当

①译文根据德文原文有改动。



代人无论如何不会把“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视为“交通工业”，这个译法无法涵盖后面的全部内容。当代宜将“Kommunikationsindustrie”这个有“Kommunikation”词根的概念翻译为“交通通讯工具”，才符合马恩的原意。

这段《共产党宣言》里话，是马恩关于传播时空关系的最早论证。1855年，马克思谈到电报作用时说：“电报已把这个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交易所。”<sup>[13]</sup>这个关于传播时间对空间的关系，喻证得十分恰当。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提出了“用时间去消灭空间”，<sup>[14]</sup>完善了他和恩格斯对传播时空关系的认识。

《共产党宣言》第三章，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保守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写道：“单人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真实的结论。”<sup>[15]</sup>他们从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七次谈到单人牢房制度的残酷，均从违背人的社会本性角度进行谴责，包括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指出：“在众议院本届会议讨论单人牢房制的问题时，甚至拥护这种制度的官方人士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迟早会使囚犯发疯的。”恩格斯也指出：“单独监禁，即通过孤独生活使人兽化……单独监禁会把人逼疯；伦敦模范监狱在成立三个月之后就已经不得不把三个疯子交给疯人院”。<sup>[16]</sup>他们的批判基于这样的认识：人天生具有社会交往的本能，用强力扼杀这种本能，对个人来说一种致命的毁灭；用阻力隔绝一个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则造成几代人的精神愚昧。但很可惜，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将这句话译为：“讲监狱改良。这是资本家社会主义最后的话语，亦是唯一真实的话语。”<sup>[17]</sup>没有将马恩反对单独监禁的思想呈现出来。但马克思《资本论》中多处论证了人的社会性对精神交往的需求，这个意思翻译出来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已经接触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宏观传播观，并运用于革命斗争中。例如，1922年9月13日创刊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家正式机关报《向导周报》，其发刊词（作者陈独秀）写道：“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

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国的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陈独秀显然活学活用了《共产党宣言》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思想。而这一点，关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

#### 四、《资本论》中传播思想的早期介绍与运用

马克思《资本论》中表达了不少马克思的传播观，主要是关于人的社会性。《资本论》第1卷论证商品背后的人的关系时，把人的自然本质引入了社会本质的范畴。人总是社会的人，人进入了社会仍然是二重存在物，社会又要比自然复杂得多。这里以1930年第一个《资本论》译本（陈启修译）和1938年第一个《资本论》三卷全译本（郭大力、王亚楠译）来考察。

陈启修译本最早展示了马克思一段经典的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论述：“从某种关系来看，这样的事对于人类也和对于商品是一样的。因为人类并不是携带着镜子生到世上的，也不是当做一个斐希特[Fichte]派哲学家，口里说着‘我就是我。’而生到世上的；所以人类先在别人的当中去照自己的像。人类彼得只有靠着他和一个当做同等的东西看的人类保罗发生关系的缘故，才可以和那个当做一个人类看待自己，发生关系。这样一来时，那个有皮有发的保罗，就会用他那种保罗式的肉体，当做人类的现象形态，对于彼得妥适有效。”<sup>[18]</sup>（现在的最新译文是：“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就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

式。”<sup>[19]</sup>这实际上是在论证人类最早自我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起点。彼得通过保罗认识到自己是人，反之也一样。这是由于双方处于社会之中，处于复杂的由一定关系联结的整体之中。人始终处在交往中，观察新事物，寻求与周围社会关系的保证和指引，同时向别人证实自己与对方的同一性和对其关系的了解。

由于社会政治原因所发生的交往和认可也是如此，陈启修的译本里马克思关于国王与臣民的互认是这样写的：“某一个人本是因为别的人们对他采取着臣民的态度缘故，才是一个国王；但是，他们却反过来，以为只因为他是一个国王的缘故，他们才是臣民。”<sup>[20]</sup>（现在的最新译文是：“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sup>[21]</sup>）马克思在这里生动地论证了一个社会学（也是传播学）观点：具体的社会环境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从1843年至1881年，马克思七次提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政治动物），包括他在《资本论》第1卷里那句名言。这句话再次引出了他对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关于这句话，1938年最早的《资本论》全译本的译文是：“人即不如亚里士多德说天然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是社会的动物。”<sup>[22]</sup>（现在的最新译文是：“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sup>[23]</sup>）现代大众传播的发生和发展、当代社会的信息化，即基于人类转变为“社会动物”这一事实。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传播观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观点，得以阐释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必须有传播，才可以生存和发展。马克思《资本论》里这方面的论述，随着这部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较早地领悟并加以阐发。这一传播观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系列论著中，例如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在1938年第一个全译本《资本论》第1卷里，马克思还论证了人的思维与蜜蜂思维的差异，原

译文是：“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建造师惭愧。使最劣的建造师，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造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脑筋中把它构成。”<sup>[24]</sup>（现在最新的译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造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sup>[25]</sup>）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的自我传播。

《资本论》的基本概念“商品”“货币”，马克思把它们视为一种中介（原词动词是 *vermitteln*，名词是 *Vermittlung*。2001年以前的译文均译为“媒介”）。例如马克思谈到货币和商品时，郭、王译本有这样一段话：“前一形态，以货币为全过程的媒介；后一形态，则以商品。”<sup>[26]</sup>（现在的最新译文是：“在整个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货币，在后一形式则是商品。”<sup>[27]</sup>）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3卷第20章专门论证了商人作为生产的“中介”问题，他不同意将此概念绝对化，当时郭、王译本写道：商人“只是生产者相互间的生产物交换的媒介者。他们不过是交换的居间人。在许多情形下，交换的进行，并没有这种人居其间。”因而他反对“媒介这个名辞，可以把一切决定了”。<sup>[28]</sup>（现在的最新译文是：商人“是这些生产者互相进行产品交换的中介，只是一种交换的中间人，在成千成万的场合，这种交换没有这种中间人也在进行。”因而他反对“中介这个词决定一切”。<sup>[29]</sup>）虽然《资本论》里的“中介”不是现在传播学的“media”，但含义是接近的。马克思对“介质”概念的使用和认知，早已掌握。

另外，在谈论生产者的关系如何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关系时，马克思谈到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就像光对人眼的刺激一样。陈启修译本的行文是：“一个物件对于视神经所给的光的印象，不当作视神经的主观的刺戟表示出来，倒当做一个在眼睛外部的物件的对象形态，表现出来一样。但是，在视觉的动作里面，光那个东西，是现实的由一个物件即由一个外界的对象物，向着另一个物件即眼睛，被投着的。”<sup>[30]</sup>（现在的最新译文是：“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



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sup>[31]</sup>）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视觉传播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并将其运用到经济分析中去。

马克思在论及不同的货币名称时说，物的名称和物本身是没有关系的。陈启修译本的行文是：“一个物件的名称是和那个物件的性质完全无关系的。纵然我知道一个人叫雅科布斯[Jacohus]，我对于那个人也永远没有知道一点什么东西。”“他们虽然没有意识着那个事，但是，他们却行着那件事。所以，价值这种东西的额上并没有写着字说明他是什么东西。宁肯说是，价值这东西把一切劳动生产物变化为一种社会的象形文字。到了后来，人们才努力去推求这种象形文字的意义，去探索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生产物的秘密；因为当作价值看的诸使用对象物的规定，完全和言语一样，是他们的社会的生产物。”<sup>[32]</sup>（现在的最新译文是：“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sup>[33]</sup>）这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内容十分丰富，也包含着符号学的内容，并对符号与意义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资本论》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是深刻的。毛泽东四次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次阅读的是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毛泽东对第1卷第1-12章大部分内容（包括注释）用铅笔进行了圈画和标注；用铅笔、蓝铅笔对第三卷的第13-20章、第37-39章的一些段落划了圈。纠正了原书的错别字和不妥当的标点，将漏字一个

一个添加上去。第二次阅读的是解放社1939年出版的何锡麟翻译的恩格斯著《〈资本论〉提纲》，毛泽东在第70、72、74-78页用红铅笔作划了圈。第三次阅读是在1954年，毛泽东在另一套《资本论》（仍然是1938年版，每卷都盖有“毛泽东”印章）上，用铅笔、红蓝铅笔在书中的第1、2、11-22章用曲线、单横线、单横线加曲线、双横线、中括号、问号逐字逐句圈画和标注。第四次阅读的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16开大字本的《资本论》，对《资本论》序言和第23-25、27、29页的有关内容做了圈画。<sup>[34]</sup>①他阅读《资本论》时留下了这么读书标记，反映了对某个观点的欣赏、赞同、怀疑、反对、不解或深思，显然毛泽东阅读《资本论》下了功夫。

毛泽东在各种场合至少6次谈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或内容，向党内推荐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中包含马克思的传播观。

本文提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涉及的传播观，大部分是在第1卷前11章之内。毛泽东四度阅读《资本论》，都读到了这些马克思传播观的论述，留下了大量阅读标识，他受到马克思传播观影响是肯定的。

例如他在1939年版恩格斯著《〈资本论〉提纲》（现在最新译名为《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要》）“在C-M-C中，货币为媒介物，商品为始点及终点；而在M-C-M中，则商品为媒介物，以货币为始点及终点”<sup>[35]</sup>（现在最新译文是：“在W-G-W中，货币是中介，商品是起点和终点；而在G-W-G中，商品是中介，货币是起点和终点。”<sup>[36]</sup>）处，用红笔作了圈画。恩格斯的这段话讲述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四章第一节第10段内容。毛泽东对《资本论》使用“媒介”概念很早就加以注意了。他用铅笔、蓝铅笔对《资本论》第3卷13-20章作了圈画，估计第20章里注46（现在最新译本为注45）里有一句“因为是媒介的缘故”<sup>[37]</sup>（现在译为“这个中介”<sup>[38]</sup>）他注意到了，此处是马克思对过分看重商人中介作用的批评。很可能由于他对此的关注，引发他找来第

①其中一处页数71，根据原版对应内容，页数应为70。已改。

20章的一段话,为此拟了一个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意在批评重商主义。1958年3月成都会议时,他印发给会议与会人员。<sup>[39]</sup>这段话现在的最新译文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sup>[40]</sup>

1941年在他写的文章《驳第三次“左”倾路线》里,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有中国革命的图样。”<sup>[41]</sup>他引用的就是《资本论》里马克思关于人和蜜蜂思维差异的论述。习近平在2007年的小言论《既重务实,又善务虚》里,引用过马克思的这句话,他说:“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这个设计‘图样’的过程,也就是务虚的过程。”<sup>[42]</sup>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着他们博大而深刻的传播思想,并在一个较高的维度阐发他们的传播观,既有世界交往的观念,又涉及自我传播、人际传播、视觉传播、符号学的内容,不仅是对报刊、宣传工作的论述。百年来他们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伴随着他们传播思想的传入。以往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忽略,藉此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回顾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思想是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这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习近平说:“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sup>[43]</sup>研究马新观的前提,是要知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如何走过了10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和新闻思想是如何传播到中国的,如何呈现的,党如何将马恩的传播观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如果连“来时的

路”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不忘初心”便无从谈起。本文做的工作,便是呈现这段“来时的路”。

## 参考文献

- [1]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第一集《举旗定向》中习近平的讲话视频。
- [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3.
- [3]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47.
- [4]毛泽东.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N].长沙大公报,1920-11-10.
- [5][6]郭伟伟.不应遗忘的《资本论》翻译者[N].北京日报,2012-5-14.
- [7]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J].新青年,1919,6(5).
- [8][11][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55;409;430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2:537-538.
- [10][17]马格斯,安格斯.共产党宣言[M].陈望道,译.北京: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16;48.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5;64.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4;30.
-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21.
-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581.
- [18][20][30][32]马克思.资本论[M].陈启修,译.北京:上海:昆仑书局,1930,1(1):39;49;79;138、82-83.
- [19][21][23][25][27][31][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4:67;72;379;208;173;89;121、91.
- [20]马克思.资本论[M].陈启修,译.上海:昆仑书局,1930,1(1):49.
- [22][24][26]马克思.资本论[M].郭大力,王亚楠,译.北京:读书生活书店1938,1:259;127-128;101.
- [28][37]马克思.资本论[M].郭大力,王亚楠,译.北京:读书生活,1938,3:253.
- [29][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6:361.
- [34]王占仁.毛泽东读《资本论》相关史实考证[N].光明日报,2011-11-30.
- [35]恩格斯.《资本论》提纲[M].延安:解放社,1939:70.
-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1:386.
- [39]纪国伟,王淑芳.毛泽东与《资本论》[J].湘潮,2006(11).
-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6:375-376.
- [41]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44.
- [42]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69.
- [4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84.



**The early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Marx and Engels' works and communication views in China**  
——Commemorating the centenni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en Lidan Wang Min

**Abstract:**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spread of Marx and Engels' works in China is accompani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ir communication views.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ni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Das Kapital* in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cuses on what their communication views are contained in these two works, how their communication views affec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n have an impact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t is of great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to deepen the study of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remise of studying Marxist view is to know how the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me into being. If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the way to come" is like, "don't forge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i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work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this "road to time".

**Key words:**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Das Kapital*; communication views of Marx and Engels

**Authors:** Chen Lidan, Sichan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Scial Develope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ang Min, School of Jo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用红船精神厚植“马新观”

徐玲英 童兵

**摘要** 2005 年 6 月 21 日习近平在《光明日报》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并阐释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的三个深刻内涵。红船精神的提出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弥补了建党精神的空白。“马新观”中国化历程是与中国革命同频共振的，因此，红船精神的提出使“马新观”中国化源头的研究能超越实践层面，置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进行理论观照与思想升华。用红船精神厚植“马新观”：可以厘清“马新观”中国化实践的初心；明晰“马新观”中国化的创新动力；为新时代“马新观”注入“源头活水”；从“马新观”当代实践而言，“红船”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具有丰富阐释性的传播新意象。

**关键词** 党史教育；红船精神；培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徐玲英，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上海 201620；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下简称“马新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信息生产流通消费及其规律的观点与思想总汇。”<sup>①</sup>这个庞大而多元的思想理论体系，从传入中国始，就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历经百年而逐步发展成熟；红船精神诞生于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上承 20 世纪初一批先进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消化、吸收与实践，下接井冈山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总纲，也是党的先进性的基因与源头。<sup>②</sup>“马新观”的中国化历程，既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同频共振，也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密切相联，以往的学术研究，已将“马新观”的中国化历程置放进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史相对照，形成了中国特色“马新观”在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阐述与实践总结。但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由于建党初期，党的规模较小、影响偏弱，革命活动存在地域不集中、主体较分散、活动复杂多样等原因，“马新观”的中国化源头研究一直局限于新闻实践层面，未能从革命精神史角度进行理论观照与思想升华。随着党内对建党精神的思索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在实践序列上一致性的要求日渐迫切，<sup>③</sup>2005 年 6 月 21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文章，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源头精神，指出“红船精神”包含了三个深刻内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红船精神的提出，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从理论的高度概念化了建党初期的革命实践。同样，与中国革命同频的“马新观”的中国化历程，因为红



船精神的提出而得以在如下四个维度得到发展：从实践史的角度，红船精神厘清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分散而复杂的新闻实践；从学术史的角度，能从源头处把握“马新观”中国化的创新动力；从思想史的角度，红船精神能为新时代“马新观”注入“源头活水”。同时，从传播实践的角度，以“红船”意象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象征，因其巨大的承载能力与丰富的阐释性，更能在全球传播格局中讲好中国故事，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 一、从实践史的角度，红船精神厘清了“马新观”的实践初心

红船精神概括了建党初期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sup>[4]</sup>，伟大的革命实践需要革命志士们的一致初心：找到一个“救中国”的真理。红船精神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从红船精神入手，可以将复杂而散乱的早期中国革命的新闻活动以“救中国”这个实践初心进行梳理辨析。

#### （一）“救中国”的问题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是将西方各种各样的“主义”引入中国。从康德、柏格森的先验主义到孔德、马赫的经验主义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救中国”的答案之一，这些主义与思想成为建党前后各类报刊辩论的主题，包括社会主义名号下也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费边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等。<sup>[5]</sup>尽管这些思想与主义相去甚远，但对于急切为中国寻找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而言，来自更先进、发达地域的理论主张都是富有吸引力的“救中国”答案，而事实上，这些“主义”虽然最后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竞争中未能成为“救中国”的终极答案，但也从不同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如实验主义影响了中国学术、教育思想和方法，尼采超人哲学呼唤英雄意识，鼓励那时的青年冲破旧礼教的束缚。<sup>[6]</sup>

这种“救中国”的问题意识贯穿了建党前后革命者的办报实践。1921年8月，从南湖回到湖南的毛泽东、李达等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湖南革命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于1923年创办了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在发刊词中提到，“因此本刊出世的使命实在是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倘能借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改造事业和研究，那是同人所十二分盼望的。”<sup>[7]</sup>这份发刊词中尽见办刊者的“问题意识”，而这些问题无论表述角度如何，归纳而言皆是“救中国”的问题意识。

因此，“马新观”中国化的实践初心就是找到“救中国”的答案，这个初心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是一致的，初心的一致性，既使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主义”的争论中获得胜出，又让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救中国”真理。同时，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它明确表明中国特色的“马新观”并非是单一的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述，它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深厚的家国情怀、天下兴亡的责任感密切相关，同时新文化运动中引入的各类主义对中国社会不同层面的影响与改造，也应视作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化的源头之一，其丰富而多元的理论源头应从初心实践中去寻找。

#### （二）工具理性的实践

革命的世界观激发了革命的报刊，革命的报刊孕育了革命的组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既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参与到“救中国”真理的竞争中，又是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实践成为重要的革命手段来推进、组织革命。

首先，革命报刊承担了早期革命组织者的角色。正如列宁所言，“革命的报刊，当我们还没有争取到政治自由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一切。”在中国共产党筹建的过程中，《新青年》甚至部分发挥了党组织机关的作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就经常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共产国际代

表也在社内经常就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在此讨论。<sup>[8]</sup>上海党小组也是依托改组后的杂志社成立的，这也意味着《新青年》作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开始履行组织者和宣传者的职责。<sup>[9]</sup>由于《新青年》刊载的内容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杂志社亦在此基础上团结了大量青年学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李达曾在回忆中提到，有不少脱离家庭、离开学校的青年人，到杂志社投奔组织。<sup>[10]</sup>

其次，革命报刊是早期革命队伍拓展的重要手段。笔者在建党90周年时，曾远赴湖南、湖北等地采访一大代表的故乡，发现当时内陆城市革命活动的形势，与该城市和上海、北京等地革命报刊的互动程度密切与否相关，而这种互动又与当地是否有革命的“意见领袖”密切相关。以湖南长沙为例，因为有毛泽东、蔡和森、李达、何叔衡等革命的“意见领袖”，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的许多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史》《列宁的历史》《劳动农制度的研究》等，均由毛泽东等译介转发至长沙的《大公报》，<sup>[11]</sup>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再局限于革命组织内部和革命报刊上传播，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有效地激发湖南省的革命形势，对于湖南省党组织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革命的理论提升了革命者的传播效果。中国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考虑到当时民众的识字率及知识素养，广大民众对于能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天然具有信任感，因此能读报办刊的早期革命者，不仅自己借助革命报刊获得了革命的思想武器，更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为报刊这一传播形式获得了传播的武器。毛泽东早年有一段参加革命新军的经历，当时毛泽东作为一名普通列兵，“将剩余饷银订了省内外几种报纸，每天仔仔细细读完。”因此，他不但能将报上的新闻讲给大多数不识字的士兵听，还能将报刊册子上点滴社会主义介绍作为救人救世的最好道理讲给士兵们听。<sup>[12]</sup>从这个细节可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与早期革命者能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身份密切相关，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信任，来自报刊的马克思主义与知识分子的人际传播相结合，

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具有天然的科学性与合法性，较易成为“救中国”的科学真理被接受，因此，从科学传播的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类似于传统的科普模式，下层民众因无法识文断字导致的知识素养的“缺失”，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借助于二级传播模式获得了绝佳的效果，成为革命火种在下层民众中引燃的重要原因。

### （三）城市革命传播与动员机制的现实所需

“百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些角色结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sup>[13]</sup>这种传统与红船精神“救中国”的实践初心相结合，从源头上决定了革命报刊的实践风格，即配合革命传播及动员的现实所需。譬如《新青年》是大型的政论型刊物，后来为弥补《新青年》时效性问题而办的《每周评论》同样也是政论见长，这种办报传统与当时革命活动主要以大城市为核心展开有关，革命最初的力量主要来源于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革命组织拓展的目标也是这两个群体，因此，热血澎湃的时政文章、逻辑严密的政论文章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号召更多有志青年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者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等在内，大部分都既是革命知识分子，又是活跃的报人，求学及生活主要在城市，在看中国的同时也在睁眼看世界，是一批具有世界视野的报人。李大钊早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就开始在校内刊物上发表文章，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痴迷于《新青年》杂志后深受影响而开始投稿报刊发表政见，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创办了《新青年》，并期望通过这本杂志能够让中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sup>[14]</sup>正是这种放眼世界、着眼启蒙的办报理念，使马克思新闻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文人论政的办报风格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红船时期独具特色的革命报刊体系，即以政论见长的城市报



刊为核心，理论与思辨色彩俱备。

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后，共产党的新闻实践方向也有了较为彻底的转换，以适应农村革命所需。因此，从实践史角度，中国特色“马新观”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需求相适应的一部实践创新史，在这个动态转换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红船时期党报形成的政论报刊体系的作用，研究它在城市革命中的传播与动员机制，同时也要看到革命转换后，这种政论报刊体系如何通过实践转换以适应乡村革命的传播与动员机制。

## 二、从学术史的角度，红船精神是“马新观”创新的动力

童兵认为，中国特色“马新观”有四个来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五千年形成和积累的传统文化成果继承光大、合理借鉴国外新闻观研究成果、新闻科学研究对新闻实践经验的理论抽象。<sup>[15]</sup>由此可见，其学术谱系是一个复杂多元的体系，不仅体现在理论来源、实践主体、文化背景、学术源头的多元化，也体现出理论跨越了巨大的时空纬度，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只有上溯自该理论形成初期的源头，找到创新的动力，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马新观”为何能超越历史局限，成为一个常用常新的理论体系。

（一）理论创新的动力：“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首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在实践中创新，同时又善于从实践中总结出创新理论，从而丰富和活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精神，这种首创精神也指导了“马新观”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新观”的一些核心理念，如党性与人民性、舆论引导、新闻真实与客观性原则等，这些社无不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首创精神的新闻实践相关。

中国早期革命报刊实践既是一个“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之举，也奠定了中国特色“马新观”的创新动力。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报实践与新闻理念都是在19世纪的欧洲工业社会中形成的，但面对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情况，即便是列宁的办报理念也不可能平移至中

国早期的革命斗争中来，因此，唯有“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才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实践的成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取得成功。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为一个具有首创精神的创新理论概念。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核心，成熟于延安时期，但创新实践却可上溯至建党初期。在毛泽东早年的新闻实践中，创办《湘江评论》是最为突出的一段的历史，而之所以要创办这份刊物，其最初的宗旨也是组织与发展群众，“他（指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巩固其革命热情，革命运动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热闹过后，还是会没有结果。因此就非常迫切地需要出版一个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sup>[16]</sup>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明确提出：“现在世界的革命潮流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政治作斗争。《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研究传播的推行当前世界的革命新思潮。”<sup>[17]</sup>可见，即便是在城市党报发展时期，毛泽东等革命者就已认识到群众的力量，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唤起民众。

1924年毛泽东发表的《两年来宣传工作的回顾》一文中，他总结了党的宣传工作的不足，着重指出党的宣传存在“偏于市民、缺于图画”等问题，而在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更是进一步强调要采取实际宣传和口头宣传等手段，弥补群众知识素养缺乏的客观实际。<sup>[18]</sup>从红船时期革命报刊以政论见长，到井冈山时期转向浅显易懂的油印小册，到长征途中沿途标语口号宣传，直至到了延安，党在成熟时期提出了完整的党报理论体系，坚持办报的群众路线始终贯穿其中。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根本标志，也是“马新观”的核心要义；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始于红船精神的优良传统，也是党性与人民性归于统一的历史渊源。习近平同志在红船精神的科学论述中，多次引用“水舟之喻”来阐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红船精

神’昭示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好比舟和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sup>[19]</sup>，从源头处把握“水舟”之喻，才能理解党性与人民性理论的根本要义，也更易于理解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中强调的，《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sup>[20]</sup>

红船精神从源头上厘清了中国共产党与当时其他政治团体的根本不同，即这是一个“基于‘主义的结合’而非个人感情结合而走到一起的，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为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群体”<sup>[21]</sup>。因此，这个群体具有的首创精神才能超越马克思新闻思想历史局限，超越同时代知识分子同仁办报的局限，为革命不同阶段的需求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二）实践创新的动力：“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红船精神是一系列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践活动的总称，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早期的新闻实践，这些新闻实践既是“马新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人一系列的新闻创新实践。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很多都是报人，其新闻实践就是革命实践。但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期，这些实践有些还显得比较幼稚，不够成熟，但体现出来的奋斗精神，却成为中国特色“马新观”实践创新的持续动力，从建党初期革命报刊作为组织者与传播者的角色到当下数字化时代的“四有媒体”、融媒体体的实践创新，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历史发展。

梳理建党前后革命刊物的出版情况，可以发现这些刊物虽都在城市出版，但地域分散且主体多元；刊物的来源很复杂且出版周期都较短，但刊物定位明确，传播迅速且有效。这些办报办刊特点既与革命初期的复杂形势有关，也与当时革命者的实践创新思路相关。

在早期革命报刊中，《湘江评论》的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且作为在内陆城市——长沙出版的一份革命报刊，对于将革命思想从北京、上

海、广州三个革命中心传播至中国更广大的内陆地区，意义非凡。这在革命者的切身感受中也能得到印证，“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sup>[22]</sup>而在《湘江评论》第二号的第二则《本报申明》中也提到了这份刊物的传播效果：“本报创刊号两千份，即日销尽，今特重印两千份。”但是仍不能满足外地读者的需要，故从第二号起，每期改印五千份，这个发行数，在当时是很可观。<sup>[23]</sup>但实际上，从1919年7月14日以湖南学联名义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到8月4日第四号出版，该刊总共仅出刊四期及临时增刊一期，第五号在即将发行之时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但是这样一份短期存在的革命刊物上，由毛泽东亲自主笔的文章多达41篇，其中连载于二、三、四号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被誉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还被北京《晨报》《又新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报刊转载，《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等也都积极在报刊上进行了推荐。这篇长文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在中国革命初期的体现，“对于后来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促成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sup>[24]</sup>

早期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奠定了“马新观”在中国的实践创新基因，因此，即便是在革命最困难或低潮时期，共产党人始终用各种创新实践来推动党的新闻事业进而推动革命。中央苏区时期，克服各种物资局限，据统计各类报刊达到了312种。在这些报刊之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斗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等4种报刊。当时各报刊的重要社论，大都由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自撰写。<sup>[25]</sup>

（三）制度创新的动力：“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从革命年代的“谁来办报”“为谁办报”“依靠谁办”到执政后强调“人民性与党性的高度统一”，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双重属性的确立，中国特色新闻体制的创新动力，来自于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



献精神，立党为公和忠诚为民两个层面决定了中国新闻体制创新的变与不变。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就党的宣传工作做出原则性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由党员经办和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sup>[26]</sup>从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就规定了党与党的出版物关系，也明确了我党要走全党办报的基本路线，这与1942年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的《党与党报》的社论中提出的如何使党报成为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按照党的意志办事；另一方面，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的工作。<sup>[27]</sup>两者一脉相承，这是中国新闻体制创新的不变层面。

“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是毛泽东在战争时期的重要舆论观。<sup>[28]</sup>但革命年代确立的新闻宣传制度适应的是革命的需求，和平时期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新闻事业需要匹配新时代的需求，在此形势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就舆论引导、媒体融合、对外传播、互联网发展等重大的问题，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与时间都发表过重要的论述，这些论述既有继承的一面，更有创新的一面。譬如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深入开展“马新观”教育。但同时，他又强调，舆论引导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体现出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性。中国特色“马新观”如何创新体制，为培育新型主流媒体、新型媒体集团，实现融媒体的战略目标成为新闻体制创新的着力点。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我们要尊重互联网规律、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 and 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sup>[29]</sup>

中国特色“马新观”之所以能超越历史的局限，在百年后的今天依旧葆有鲜活的生命力，与它的创新动力密不可分。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初心与源头，同样也是中国特色“马新观”先进性的初心与源头。

### 三、从思想史的角度，红船精神为“马新观”注入“源头活水”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理论，是如何在20世纪初成为一批先进中国人在各种主义与理论中的自觉选择？早期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才逐步确立坚定信仰？个体的精神史是如何与一个政党的精神史合而为一，最终形成终其一生、矢志不渝的信仰？红船精神通过回答“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实现了对历史现象解释，是在解答近代中国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困境、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认可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基础上产生的，<sup>[30]</sup>因此，红船精神既是理解早期革命者的个体精神史的路径，也为中国特色“马新观”注入“源头活水”。

（一）早期革命者的新闻实践是精神史的“活水”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地域分散，主体繁多，活动多样且复杂，早期革命者的思想历程及转变，革命挫折时期革命者的分化甚至分裂更是难以得到清晰完整的梳理。得益于早期革命者中很多都参与甚至主办过报刊，留下了大量的报刊史料，正如毛泽东在回忆自己早年的革命经历与革命世界观的形成时总结的：“从1911年到1927年，在我没有走上井冈山以前，我对于北平、上海和湖南的各种日报，从未中断阅读。”<sup>[31]</sup>因此，梳理这些报刊史料，能清晰勾勒出一代伟人的思想心路历程：毛泽东最初进步的政治观念来自于改良派的书报，因为很喜欢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佩服康梁变法维新的主张，所以给自己取了一个‘子任’的别号（梁启超号任公）。<sup>[32]</sup>而对他思想转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新青年》杂志，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学时几近痴迷地阅读《新青年》，“使他急切的想找出一种办法，寻求一条道路，来

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使全中国全世界被压迫受痛苦的人民得到拯救”<sup>[33]</sup>。受《新青年》的影响，毛泽东相继创办《湘江评论》、主编《新湖南》周刊，期间去北大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是其第一次从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并主编《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成立“文化书社”并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化书社缘起》；建党后，和李达一起回湖南创办自修大学并创办《新时代》月刊，主编1925年创刊的《政治周报》等。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历程只有通过同时期的新闻实践才能得到完整而真实的展现；同时，新闻实践活动不仅清晰再现了湖南地方组织成立的过程，也能通过毛泽东两次北上、与全国各地进步报刊的互动，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路径，正如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毛泽东给自己的革命思想历程作了清晰的界定：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此，他从未改变过自己的信仰。

## （二）中国特色“马新观”需要“源头”

中国特色“马新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史与实践史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红船精神的提出让“马新观”的中国化历史显得更为厚重，是中国特色“马新观”的思想“源头”。

因此，在溯源中国特色“马新观”时，蕴含了两个研究纬度，其一是中国特色“马新观”的思想源头应置入中国共产党精神史中，从根本上厘清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是如何打败其他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其二，“马新观”中国化的实践源头，应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相结合，才能勾连起较为清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路径。就前者而言，以往我们都以唯物史观的“历史的必然”一笔带过，但历史的细微之处在于“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统一的，1919年至1921年发生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三次论战，只有从中国共产党精神史中去考察，才能为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证据，正如蔡和森文集中提到的，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把各国

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同时“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漠克拉西加番研究”，“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才认定“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不外此”。<sup>[34]</sup>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酝酿期即是在建党初期，当时因革命形势所需进行新闻实践创新，即可视作新闻思想史的源头。譬如关于报刊舆论引导的作用，早在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及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活动中，毛泽东就认为，一个运动兴起，首先要“造舆论”，因此，他接连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十篇评论湖南自治运动的文章。<sup>[35]</sup>而在随后更为重要的革命活动中——安源大罢工、湖南水口山工人大罢工以及长沙的泥木工作、铅印工人的罢工等，毛泽东都十分重视运用舆论的力量来促进革命活动，“检查一下当时长沙的报纸，每一次罢工的有关消息和宣言文件，差不多都连续刊登，工会方面还常向记者发表谈话。罢工前后，毛泽东同志总是动员党的干部或自己动手以读者名义向报纸投稿，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所以每次罢工时，无不造成一种有利于工人的舆论。”<sup>[36]</sup>在中国共产党后来的革命实践中，这作为一条实践真理被贯彻了下来，譬如在江西永新的三湾整编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在长征途中，“长征标语口号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党和红军扭转不利局面、重构社会秩序和传播进步观念的重要手段。”<sup>[37]</sup>

## 四、从传播实践角度，“红船”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中国共产党精神史的命名一般遵循两个原则，主要是以发生地命名，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或者以事件为命名原则，如长征精神、改革精神等；但由于建党时期活动的特殊性，很难用以上两种常用的命名方式，导致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史与精神史不一致，建党初期的精神史一直处于空白。2005年习近平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创新性地用“红船”这个融合了主客观、多元结构的意象概念作为建党精



神的总称，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精神史的谱系。2018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sup>[38]</sup>明确指出“马新观”当代实践的核心内容就讲好中国故事。

意象 (Image) 是肯尼思·博丁 (Kenneth Boulding) 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人们主观价值和知识的凝结，对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个体和外界环境沟通的工具。<sup>[39]</sup>约翰·克兰普顿 (John L Crompton) 随后将这个概念丰富为四个层面，即意象是人们对某一物体、行为和时间所持有的信念 (beliefs)、印象 (impressions)、观念 (ideas) 与感知 (perception) 的总和。意象不只是客观的资料或细节，而是由各种侧面构成的多元结构。<sup>[40]</sup>中国故事理应包含中国共产党的创业史和精神史，“红船”作为这两史的重要载体，为中国故事的传播提供了多重象征意义的传播新意象。

#### (一) 共情传播：初心故事

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应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故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庆祝活动的开展，如何用更符合数字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去讲好初心故事，既是个顶层设计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操作问题。红船精神因其独特地位，可以提供具有共情力的初心故事。

有学者认为，基于人的自私本性，强者对弱者的剥夺以及强者之间的争夺（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符号与话语空间）等现实，要破解全球传播中“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人类首先要建立一种与他者共在的理念，并努力发展共情的关爱。<sup>[41]</sup>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应有共情传播的理念。共情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一个主体与对象情感同化的过程，共情将个体同他人之间的情感体验产生普遍的联系，经过情感，某些重要的心理内容被投射

到对象之中，“共情”活动往往是在无意识的前提下进行的，投射活动把无意识的情感转移到了对象之中。”<sup>[42]</sup>“初心”即本心、真心，是人人原本具有的“良知”之心。细究任何人做任何事无不具初心，因此，基于红船精神的初心故事具有先天的共情力。

“红船”这艘全长16米，宽仅3米的“红船”，作为一个物化的意象，历经百年承载着众多生动故事：既有从8个共产主义小组、58名党员的零星组织发展到一个执政大党的创业故事；也有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人为革命奉献生命的信仰故事；还包含了一代又一代“红船”守护人的平凡故事，更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来到“红船”的追寻故事。同时，“红船”作为一个具有延展性的象征符号，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产生关联后，可以生产出无比丰富的意义体系，获得互联网时代全新的互动传播内容。

“一大”建党先驱们的初心故事与“十九大”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呼应，是红船故事共情力的来源。建党先驱们都是百年前激情的年轻人、先进的知识分子，但仔细剖析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人生轨迹，有信念坚定、百折不挠、成就伟业的毛泽东、董必武，有献身理想、光荣牺牲、英名永存的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有挚爱理论、负气退党、终获公论的李达、李汉俊，有难经考验、高开低走、人生失败的刘仁静、包惠僧，有追逐私欲、叛党卖国、身败名裂的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sup>[43]</sup>身处历史巨变时代中的他们，“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sup>[44]</sup>。这些一大代表们“一样的出发，不一样的结局”的信仰故事，把理想信念本属于较空泛的词汇，通过这些共情力的初心故事，终使中国共产党的创业史和精神史穿透历史的隔阂，实现对当下受众的共情传播。

#### (二) 回到“现场”：传播的仪式感

碧波荡漾的南湖烟雨楼前，一艘江南画舫泊

于水岸边，来自五湖四海的党员群众回到历史现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上海石库门出发，沿着沪杭铁路的历史轨迹，重走“一大”路，重温1921年出发的起点，这种仪式感，是互联网时代最能获得认同感的传播方式。正如习近平指出：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将有助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

我们以往对“马新观”的传播更多注重于知识的传递，而鲜少涉及“传播的仪式观”的考虑，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认为相比于把信息传递给他人的这种源于地理和运输层面的传统定义（传播的传递观），仪式观视域内的传播更强调分享、参与、联合、团体及拥有共同的信仰，其功能更在于对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维系。<sup>[45]</sup>红船精神第一次将建党前后的实践活动及建党精神凝聚成一个理论体系，使初心故事有了具象化的依托，特别适宜于数字时代信息传播对于信仰共同体的构建，回到历史的现场，通过类似“六个一”的传播仪式，可以一扫当下弥漫的历史虚无感、精神空心化。因此，回到历史现场的传播仪式构建，对于活化中国共产党创业史、精神史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提炼红船精神的符号表达，能使传播更具认同感。人类的传播活动具有仪式的意涵，而这种仪式化的传播是人类传播现象的一个隐喻层面的问题，正如维克多·特纳所言：“隐喻能有助于激发我们的思想，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并使我们兴致盎然。隐含的意义、暗示、价值观念同它们的字面意义交织在一起使我们以一种全新方式去发现了一个主观的事件。”<sup>[46]</sup>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sup>[47]</sup>习近平将“红船”比喻为“母亲船”，也将“红船”与传统的“水舟之喻”相连接，更从“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层面隐喻共产党的创业史，当红船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在传播中重复时，这个传播新意象就会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载体。

## 五、结语

红船精神虽然在实践形态上已经存在近百年，但在理论形态上的正式提炼迄今只有十余年。<sup>[48]</sup>历史语境中的红船精神是超越了具体地域范畴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但在现实语境中，红船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其他精神相比，则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其中既有理论的完善还需要时间的客观因素，也有对散落、复杂的早期革命活动及建党精神的统筹，需要有一个体系化的阐述及传播框架。因此，本文虽是围绕着红船精神厚植“马新观”这个主题展开，但要从根本上提升红船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影响力与地位，还应与“马新观”的当代实践相结合，弥补这个新生理论体系的不足，呈现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与先进性源头，这个理论体系应有的魅力与厚重。

## 参考文献

- [1][15] 童兵.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组成和来源——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作[J]. 当代传播, 2021(02):4-7+30.
- [2][3][21] 杨晓伟. 基于意象思维的“红船精神”命名中共建党精神的合理性[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7, 34(06):23-33.
- [4][19] 习近平. 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N]. 光明日报, 2005-06-21(5).
- [5][6] 陈水林. 红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相结合的产物[J]. 党史文苑, 2012(06):67-70.
- [7][11][12][16][17][23][24][31][32][35][36] 华祝考. 毛泽东同志早期报刊活动——从学生时代到主编《政治周报》[J]. 新闻研究资料, 1984(Z2):1-35.
- [8] 李达.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G].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9] 程曼丽, 赵晓航.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新闻思想的形成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46(05): 26-32.
- [10]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393.
- [13] 李金铨. 《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C].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一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18] 毛泽东. 毛泽东论新闻宣传[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58-63.
- [20] 江苏佳, 赵云泽. 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社论《致读者》[J]. 新闻界, 2013(15):79-80.
- [22] 吴平, 李文邦. 青年毛泽东这样办“最有分量”的报纸



- [N]. 学习时报. 2020-03-10.
- [25] 傅柒生. 红色记忆 革命典藏[N]. 天津日报. 2011-7-11 (10).
- [26]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EB/OL]. (2012-11-05)[2021.6.23]. <http://www.scio.gov.cn/m/ztkt/dtzt/88/13/document/1237696/1237696.htm>.
- [27] 贾梦梦, 周光明. 作为话语的“完全党报”: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解读[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05): 153-175.
- [28] 丁柏铨.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舆论观的演变发展[J]. 新闻与写作, 2021(01): 60-70.
- [29] 杜尚泽.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 人民日报, 2016-02-20(1).
- [30] 高凡夫. “红船精神”提出的考察与认识[J]. 浙江学刊, 2018(04): 33-38.
- [31] 周世钊. 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J]. 新观察. 1951.2(2).
- [32]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56, 33, 56.
- [33] 许加彪, 张宇然. 宣传·组织·指路: 长征标语口号的产制、修辞和社会动员[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12): 86-91.
- [34] 张洋.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 人民日报. 2018-08-23(1).
- [35] Boulding K E. The Image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10-11.
- [36] John L. Crompton. An Assessment of the Image of Mexico as a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Upon That Image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79, 17(4).
- [37] 吴飞. 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6(05): 59-76+127.
- [38] 卡尔·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 马川, 苏克,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221.
- [39] 张志松. 为有牺牲多壮志 中共“一大”代表人生轨迹与理想信念教育[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87-170.
- [40] 鲁迅. 鲁迅全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348.
- [41] 詹姆斯·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 “媒介社会”论文集[M]. 丁未,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3-7.
- [42] 维克多·特纳. 戏剧、场景及隐喻: 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M]. 刘珩, 石毅, 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21.
- [43] 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 邢培明, 陈圣生,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204.
- [44] 彭世杰. 红船精神理想信念教育价值的内在逻辑、历史语境和实践路径[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7, 34(04): 90-96.

## Nourishing Marxist Concept of News with Red Boat Spirit

Xu Lingying, Tong Bing

**Abstract:** On June 21, 2005, Xi Jinping's article "Fostering the Red Boat Spirit of and Advanc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was printed in the Guangming Daily. Red Boat Spirit was first proposed in the article. The article described the meaning of thre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Red Boat Spirit as the spiritual origin of the CPC. The Red Boat Spirit not only perfected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PC, but also filled the gaps in the spirit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Marxist Concept of New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progress moved in the same rhythm. So, the Red Boat Spirit is not limited to make the research in the sourc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rxist Concept of News surpass practice phase, but enhance and sublima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PC. By nourishing the Marxist Concept of News with the Red Boat Spirit can clarify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the Marxist Concept of New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practice, set forth the power of innovation of the Marxist Concept of News, and enrich the Marxist Concept of News of a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the Marxist Concept of News, Red boat contributed rich explanation and new intention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spread of Chinese stories.

**Keywords:**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Red Boat Spirit; cultivation; Marxism; Concept of News

**Authors:** Xu ling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Donghua University. Tong B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 数字新闻学的情感转向：迈向新的研究议程<sup>1)</sup>

凯伦·沃尔-乔根森 田浩

**摘要** 本文以新闻学研究的“情感转向”为核心，围绕着这一核心，学者们已经在情感介入新闻生产、新闻文本和受众参与等领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闻生产层面，情感始终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之中发挥作用，它作为核心要素形塑着新闻叙事与呈现的策略；但是，冷峻独立的客观性理念始终要求新闻记者隐匿新闻生产中的情感劳动。在新闻文本层面，即使传统的严肃新闻也必然受到情感的影响。在受众参与层面，倘若新闻内容与受众自身密切相关，受众会更易被唤醒情感并采取行动。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可供性显著地提升了情感的重要性。立足于此，普通民众日益提升的参与机会有助于我们反思新闻受众和新闻生产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并进一步推动着多种情感表达形式的产生。

**关键词** 情感；新闻学；新闻受众；客观性；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凯伦·沃尔-乔根森 (Karin Wahl-Jorgensen)，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媒体与文化学院教授，CF14 3BA, Cardiff

**译者** 田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 一、引言：情感作为新闻学的认识论盲点

尽管新闻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内蓬勃发展，但针对新闻情感的研究却依然进展缓慢。本文试图阐明学界缘何忽视情感这一要素，梳理近些年来学界对于新闻生产、新闻文本和受众参与等环节中的情感要素的研究前沿，最终尝试指出新闻学中情感研究的发展方向。

新闻学对于情感的忽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闻业忠诚于客观性。客观性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价值，一种在新闻叙事中摒除情感倾向的价值。<sup>[1]</sup>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客观性原则所构建的是一种孤立的“乌有乡消息”，这种新闻形式掩藏了新闻记者这一叙事主体。倘若新闻变得情感化起来，这必将威胁固有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叙事。<sup>[2]</sup>

新闻学中是否存在一种情感转向吗？尽管情感这一因素在新闻学中被长期忽略，但是学者们已经逐渐开始关注情感的问题，这与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情感转向”息息相关。<sup>[3]</sup>就新闻学中的情感转向来说，我着意使用 emotion 这一表述，而非更常见的 affect。<sup>[4]</sup>布莱恩·马苏米 (Brian Massumi) 认为，这两个“情感”概念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affect 应当被理解为个体的身体感觉，这是一种对刺激的反应，我们可以用强度 (intensity) 衡量这种身体情感，但这种情感并没有一种有意识的方向，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命名与分类；与之相反，emotion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20&ZD31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媒体时代的新闻学理论创新路径研究”(GD20CXW01)的阶段性成果。



是一种主观内容，是一种用以衡量个人体验的社会基准。情感是强度与符号的结合点，是强度与叙事结构的结合点，也是强度与功能和意义的结合点。也就是说，情感是一种可以被识别的强度。<sup>[5]</sup>尽管马苏米首先将情感视作一种个体的基本要素，但他对两种情感的区分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集体行为的重要理论资源。他的论述既将 emotion 视作对 affect（身体情感）的解释与说明，也将其视作 affect 在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作用形态。从而，emotion 是对于 affect 的一种潜在的政治化，也是对 affect 的一种政治化解释。这种 affect 在媒介话语中能够被转译为 emotion。

因而，我发现对这两种情感进行区分，并将情感定义为一种对于身体情感体验的关系性解释，是大有裨益的。<sup>[6]</sup>通过这种区分，情感借助命名、表达、流通等环节，就可以变成一种公共的社会要素。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看待情感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遵循一些隐含的理论内涵。首先，对于情感的定义与社会学范式紧密相连。社会学的思路为情感赋予了一种基础的关系性特征，认为情感源自个体与文化以及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sup>[7]</sup>这并不是将情感彻底视作一种纯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并据此认为不存在脱离话语结构的情感。<sup>[8]</sup>这种研究路径是在启示我们，去探索什么样的情感在公共空间内更受欢迎，以及与这种现状相关的原因和结果，是非常有趣且有价值的。这种路径还要求我们明确区分情感究竟是个体身体之间的“流”，还是媒介文本中的话语结构。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将这种“中介性情感”（mediated emotion）视作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sup>[9]</sup>学者们认为，这种中介性的情感表达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被精心设计的，这种情感表达往往是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基础驱动力。<sup>[10]</sup>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情感的话，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探析新闻生产、新闻文本与观众接受等环节中的情感表达方式，也可以将复杂的情感视作政治表达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使用“新闻学的情感转向”这一术语时，我们的核心目标并不是发起一项彻底的范式转向运动，或推动新闻领域内基础研究议题的变化。

我们所主张的是，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在新闻学研究议题日益碎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新闻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会为我们带来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领域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议程，并与数字新闻学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sup>[11]</sup>如果我们承认，情感在长期的历史阶段中都是新闻学的“认识论盲点”或“房间里的大象”的话<sup>[12][13]</sup>，那么情感转向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情感在新闻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研究受益于蓬勃发展的跨学科研究实践，从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和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内获得启发。“跨学科”并非是新闻情感研究的独特之处，实际上，整个新闻学的学术研究都具有跨学科的特征。由于“本土理论”（native theories）的缺乏，数字新闻学这一新兴学科倾向于采纳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内多种研究进路开展研究。<sup>[14]</sup>

情感在新闻的全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数字时代提升了普通民众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推动了情感化、具象化的个人媒体的兴起，为人们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叙述故事带来了一种新闻进路（journalistic approaches）。不断勃兴的变化与发展呼唤着围绕着情感生产出一整套知识体系，这要求我们重思已有的知识和方法，并发展出新的新闻学研究议程。

## 二、情感与新闻生产

学者们针对新闻生产环节中的情感和情感劳动已经开展了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情感始终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克里斯·彼得斯（Chris Peters）所言，因为新闻生产的核心目标在于“创造一种参与式体验”，这导致客观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遮蔽了新闻的情感性特征。<sup>[15]</sup>这一点也见于施密特（T. R. Schmidt）的研究。<sup>[16]</sup>情感对于新闻生产的重要作用，以及新闻记者对情感的认识，始终是新闻生产研究中的重要主题。<sup>[17]</sup>梅尔维·潘蒂（Mervi Pantti）是最早探索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她通过研究芬兰的广播新闻记者对于报道中的情感要素的态度，一方面表达了她对“情感新闻”的高度怀疑；另一方面也说

明了,新闻记者们已经广泛地认识到,情感化的叙事有助于促进观众理解新闻内容。<sup>[18]</sup>

记者们对于情感化叙事的认识决定着他们呈现新闻文本的方式。例如,居尔塞尔(Z. D. Gürsel)曾对美国一家新闻杂志的新闻摄影进行民族志研究,发现新闻记者对于观众情感反应的预期将会影响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各项事务。<sup>[19]</sup>与之相似,格吕克(A. Gluck)在英国和印度对新闻记者开展了一系列的访谈,发现对于受众和信源的共情(empathy)日益成为新闻记者一项核心技能。这种技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情感劳动,有助于促进新闻文本的生产。<sup>[20]</sup>斯坦克(A. J. Steinke)和贝莱尔·加农(Belair-Gagnon)也对报道社会正义新闻的记者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专业的新闻记者将情感和情感劳动视作工作的核心。<sup>[21]</sup>这些案例都说明,虽然这一领域尚未被充分考察,但学者们已经日益关注新闻记者的情感劳动。<sup>[22]</sup>

新闻中的情感劳动似乎与学术界对新闻业的认识背道而驰。新闻业忠诚于客观性,这意味着从历史上看,新闻工作者一直被视为超然而脱身事外的观察者。这使得人们难以理解情感对新闻工作的影响。<sup>[23][24][25]</sup>因而在新闻业中,即使情感劳动是新闻业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新闻业并未对情感所带来的影响给予充分的关注。理查兹(B. Richards)和里斯(G. Rees)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新闻记者在遭受巨大心理创伤的情况下进行情感劳动,那么我们会发现,新闻专业话语中的客观性和情感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本质的矛盾。同时,我们对于新闻记者对观众所造成的情感影响也知之甚少。<sup>[26]</sup>尤克斯(S. Jukes)在采访了25位报道创伤事件的新闻记者之后也得出结论:“情感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新闻记者们应对报道现场紧张局势的复杂系统。一方面,记者们需要保持作为专业新闻记者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能够深入人心地、善解人意地开展报道也日渐成为新闻的本质维度。”<sup>[27]</sup>尽管学界长期忽略了情感对新闻的影响,但其实在创伤新闻或灾难新闻中,与情感相关的话题层出不穷。诸如对丧亲<sup>[28][29]</sup>、交通事故<sup>[30]</sup>、战争、恐怖主义、疾病<sup>[31]</sup>的报道都是如此。例如,科蒂索娃(J. Kotisova)对于比利时记者报道当地恐

怖袭击的经历进行研究,说明了这些恐怖事件如何对记者产生重大的情感影响。<sup>[32]</sup>这种影响模糊了个人生活和新闻专业实践之间的界限,并挑战了新闻客观性原则。科蒂索娃在另一项研究中,对捷克记者针对2015年难民危机和巴黎恐怖袭击的报道进行分析,认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种犬儒主义式“情感文化”(emotional culture),这种情感文化能够使记者在恐怖事件中保持理性和客观。<sup>[33]</sup>尤克斯(Jukes)也研究了记者对于危机报道的反思,认为新闻记者们通过发展出一整套与新闻客观性相关的实践规则,以保证他们能够免受情感影响的困扰。<sup>[34]</sup>

同时我们也要理解,新闻业是一种被积极情感所深度影响的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之处在于,新闻记者往往将他们的工作视作一种“使命”(calling)。<sup>[35]</sup>他们被某种一致的理念所激励,共享某种相近的价值:他们将新闻业视作一种公共服务,一种崇高的职业。记者在情感上忠诚于他们所服务的机构,忠诚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忠诚于他们为公众提供新闻的理念。但是,新闻从业者的情感忠诚实际上是不稳定的,并常常根据社会、经济和内容环境而发生变化。<sup>[36]</sup>莫里尼(C. Morini)等人认为,新闻工作的定例化和自主性的缺失会导致新闻记者降低工作乐趣,这将会导致新闻工作者的情感背离,进而放弃新闻工作。<sup>[37]</sup>

也有一些学者明确地将新闻业的危机与新闻从业者的心理健康联系起来。斯科特·雷纳迪(Scott Reinardy)对在报业衰退过程中新闻记者的体验进行了研究,他对报业的人员失业、报纸关停等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并将其归纳为一种心理上的“报业萧条”(newspaper depression)。<sup>[38]</sup>此外,也有针对新闻业离职现象的研究表明,许多新闻从业者离职的原因在于他们遭受了“精神创伤”,并经历了诸多“愤怒与焦虑”。<sup>[39]</sup>

这些研究都一致地指出了理解日常工作中情感压力的重要性,以及情感压力如何在工作过程中累积并发生质变。这些情感压力包括持续性的裁员、临时解聘、以及无所不在的工作不安全感所带来的压力<sup>[40]</sup>,也包括适应持续不断的技术迭代的压力<sup>[41]</sup>,也包括对毁谤的担忧,以及对工作中的



竞争的疲惫。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 三、新闻文本中的情感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数字时代的技术变革引发了不同的新闻实践变化，这为新闻的情感化转向提供了合法性，但我们其实需要在更长期的历史阶段内分析这种变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带来了更为主观化、情感化和自白式的新闻形态，但是这种将情感纳入新闻叙事的风格实际上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轨迹。<sup>[42]</sup>

针对早期的商业报道如何采纳情感性和亲密性因素，新闻史研究已经出产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主流的学术观点仍然坚持20世纪内严肃、优质的新闻是在客观性原则下生产出来的。<sup>[43]</sup>近些年的研究显示，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例如有研究表明，情感实际上在优质的新闻叙事中（如荣获普利策奖的一些报道中）也占据着核心地位。<sup>[44]</sup>在这些报道中，情感是通过一种更为精妙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情感性策略原则”（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这种情感性的原则与客观性的原则并驾齐驱，将轶事、个人叙事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引介至新闻叙事之中。通过精巧地设计信源的情感呈现方式，那些屡获殊荣的优质新闻将情感“外包”给了信源，这就使得这些新闻也符合“客观新闻”的要求。同时，通过聚焦重大社会事件新闻中的个人故事，也可以推动从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出发进行的重大事件叙事。有学者对比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危机新闻的情感性使用策略，认为尽管这两个国家的记者都将情感化的叙事策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但他们的实践方式迥然相异。<sup>[45]</sup>澳大利亚的新闻叙事焦点往往集中在普通民众的情感上，而中国的新闻叙事焦点则往往与社会精英保持一致。虽然实践方式不同，但这两个国家的记者的行动都有助于构建社会团结。这也说明了，尽管情感性原则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中，但其表现形式则由更广泛的国情和政治语境所决定。

罗沙（O. V. Rosas）曾对西班牙在线记者进行研究。他的研究既将情感视作一种策略性资源，也将其视作一种记者的专业挑战，充分说明了这

一领域的复杂性。<sup>[46]</sup>一方面，他的研究表明了记者往往策略性地使用情感，将其作为一种提升受众参与度的方式。但另一方面，他的访谈对象也表示，许多记者尝试采用回避情感的策略，以实现对客观性原则的坚守。

沿着类似的思路，近些年兴起了一个学术研究群体，他们尝试检视新闻中的“亲密关系”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以新闻中的个人观点和自我披露为代表。许多学者尝试考察新闻中的亲密关系<sup>[47]</sup>、主观新闻或亲密新闻<sup>[48]</sup>。这些学者们已经观察到，这种转变也逐渐渗透进严肃新闻之中，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中无处不在。其中一项佐证就是一些音频叙事形态的兴起，例如播客。这一更为亲密的叙事形态有力地拓展了记者们自传式叙事的空间。<sup>[49]</sup>使用这种亲密的叙事方式往往能够提升叙事者角色的真实性，进而促使新闻记者及新闻内容更加可信。<sup>[50]</sup>

上述研究凸显了新闻记者作为主观行动者的角色。通过这种角色，新闻记者们能够准确地表达他们的情感和经历。这也说明了一点，记者往往不应当冷峻地旁观社会事件，而应当将自己作为置身于社会事件之内的“编年史家”。

### 四、新闻受众与情感

也有一些学者立足于情感框架，坚持在全球语境之中开展针对媒介灾难事件的受众研究。鉴于新闻学与情感研究都较为重视新闻生产和新闻文本，而相对忽略受众研究，这些研究的意义更为重大。<sup>[51]</sup>基利亚基多（M. Kyriakidou）针对希腊的新闻受众进行了一系列的焦点小组研究。正如她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世界主义话语虽然在新闻中很突出，也呈现出多种形态，但其使用语境较为局限。<sup>[52]</sup>基利亚基多在她后来的研究中也进一步探索了见证的多种类型。她的研究区分了四种不同的见证类型：情感见证、激情见证、政治见证与他者见证。情感见证的主要特征是对痛苦的强烈共情；激情见证为即时的经历所塑造；政治见证由政治权利和社会关系所决定；而他者见证则将他人的苦难视作一种遥远的、与观察者的日常生活无关的对象。<sup>[53]</sup>乔纳森·科珀斯·翁（Jonathan

Corpus Ong) 也对菲律宾的受众群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sup>[54]</sup>正如他所论证的,大多数关于世界主义的研究都将西方精英群体视作一种“受众”,这种假设往往被视作不言自明的,许多研究都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想象西方精英群体对遥远的灾难的反应。他的研究表明,我们不能以一种普遍的观点分析受众对所有苦难的反应。取而代之,基于对菲律宾受众的分析,我们既需要考虑人们对远方的苦难的反应,也需要考虑人们对身边的苦难的反应。这些研究都表明了,我们不能无视受众对新闻文本的反应,孤立地考察新闻中的情感作用。

在过去的十来年间,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新闻的“受众转向”<sup>[55]</sup>,这种转向实际上也反映了学者们对于情感问题的重视。事实上,新媒体的消费者也习惯于质疑传统新闻机构的独立性,批判这些机构隐含的价值立场,转而寻求更充满情感色彩的新闻内容。<sup>[56]</sup>

数字媒体生态的发展为学者们运用大数据的方法开展新闻受众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这与学者们对于受众情感的重视遥相呼应。例如,社交媒体的兴起推动了基于数据的情感分析蓬勃发展。这些方法被应用于大规模的情感评估之中,例如对政治领域的分析,美容产品的推广,乃至对新闻内容的个性化推荐之中。<sup>[57]</sup>这些蓬勃发展的方法实际上建基于一个隐含的认知上,即情感与个体的态度、价值与决策是不可分割的。这种认知实际上颠覆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理性和情感二元对立的看法。

从更根本上来说,数字媒体生态实际上已经极大地挑战了新闻受众这个概念本身。数字媒体生态打破了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决然地区隔,这种论断在诸如对产用 (produsage)<sup>[58]</sup>,或者用户主导的内容生产等等概念的讨论中也有所表现。

## 五、技术变革、受众参与与情感

这些技术发展促进新闻以更情感化的方式存在,推动了主流媒体的内容转型,形塑了在剧烈变化的媒体生态中专业记者的行为。公民记者往往是业余记者,他们只是碰巧出现在了突发新闻的现场,或者就像有些学者所说的,他们是“临

时记者”(accidental journalists)<sup>[59]</sup>。这些临时记者并没有接受过客观新闻报道的培训。他们的镜头是猛烈出击的,他们的叙事方式往往以第一人称作为视角,他们的信息往往是情感化的,这些都大大突破了专业记者的准则。<sup>[60]</sup>从2004年的亚洲海啸,到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等等,诸多事件最早流出的片段都是由普通民众用便携式相机或手机拍摄的。

普通民众的公民见证行动并不由主流新闻的议程和价值所决定,而是由民众本身的日常生活经验所决定。<sup>[61]</sup>情感化的个人账号能够表现出真实性,这实际上是在重塑新闻的认识论,或重塑我们认识新闻的方式。

社交媒体的兴起加速了这种转变,并进而影响了专业新闻记者的实践。贝克特 (C. Beckett) 和杜兹 (M. Deuze) 发现,在网络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将会愈加移动化、个性化和情感化。<sup>[62]</sup>新闻记者更倾向于在 Twitter 上分享他们的个人观点和个人生活细节。<sup>[63][64][65]</sup>这种分享行为与新闻生产实践的社会学转型相呼应,为我们研究新闻记者的情感表达开拓了新的空间。<sup>[66]</sup>

研究社会运动中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学者们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的焦点在于平台的可供性如何促进公众的情感表达,这种方式与平台可供性形塑新闻报道相一致。例如,帕帕克瑞斯 (Zizi Papacharissi) 特别关注社交运动中民众对 Twitter 标签的使用,并据此提出了“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 的概念。<sup>[67]</sup>她认为,通过使用标签,不同个体能够整合诸多主观体验、观点和情感,社会运动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整体上构建他们自身的“情感信息流”(affective news streams)。这种情感信息流可能在明确个人体验和构建身份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公众网络中不断发酵,最终影响主流媒体。

在社交媒体上,观众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任何对于这种参与的乌托邦式幻想都需要审慎一些,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实践的多样性。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表明,经常在网络上参与讨论的人表露的都是负面情感,包括愤怒、恐惧和仇恨等等,这助长了一种“消极参与”的



氛围。<sup>[68][69]</sup>公开言论的极化也愈加推动了新闻记者与新闻机构成为仇恨言论的攻击对象。<sup>[70][71][72]</sup>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都说明了新的媒介生态不仅改变了情感表达的方式，也同时重塑了我们对公共生活的理解与我们的公共实践。我们很难简单地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 六、结论：迈向新的研究议程

本文追溯了新闻学中的“情感转向”，这一转向与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转型密切相关。尽管在新闻学的历史上情感曾长期被忽略，但情感研究在新闻生产、新闻文本与受众参与等方面在过去十来年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针对新闻生产的研究表明，新闻始终将情感视作核心原则，并以此为依据塑造了新闻叙事方式。但是，将新闻记者视作独立的、冷峻的观察者的观点长期以来隐匿了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情感劳动。针对新闻文本中的情感研究凸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是传统的严肃新闻，也都由情感的力量参与塑造。情感这一要素通过“情感性的策略原则”被纳入新闻实践之中。正如对新闻受众和情感的研究表明的那样，情感化的新闻实践通过个性化的叙事方式，能够极大地影响受众的参与行动：当新闻内容与自身更为相关时，受众更容易被唤醒情感并参与行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新闻时代实际上推动了情感的角色转变。在更本质的层面上，新的媒介生态通过有效提升普通民众塑造新闻的权力，对受众与消费者等概念提出质疑。公民新闻和用户生产内容的兴起推动了对新闻事件的个性化叙事，形成了新的认知方式。其次，社交媒体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情感信息流的产生。这些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了专业新闻记者的实践，这些记者也在不同的平台上以更个性化和更情感化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都为我们开启一项新的研究议程铺平了道路。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会启发我们研究那些支撑新闻学的基础规范性理论。情感在新闻中的作用更加细致精妙，这实际上具有多重含义。首先，这将引导我们关注数字时代

新闻工作者对情感劳动的新要求，以及以更多个人化和情感方式讲故事的新形态。其次，这要求我们将情感化的新闻叙事原则融入我们对平台可供性的分析之中。再次，这提示我们需要深入探索一种新的参与方式和生产方式如何重塑新闻认识论和拓宽新闻边界。最后，我们需要明白，一旦开始尝试在新闻的生产、文本和受众参与等环节探寻情感的话，那么我们将发现情感实际上无处不在。因此，理解情感在新闻中的作用这一伟大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 参考文献

- [1]Maras, S.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M].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13.
- [2]Pantti, M. The value of emotion: An examination of television journalists' notions on emotionality[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0, 25(2): 168-181.
- [3]Clough, P. T. & Halley, J., eds.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Ross, A. G. Mixed emotions: Beyond fear and hatred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20.
- [5]Masumi, B.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8.
- [6]Davidson, J., Milligan, C. Embodying emotion sensing space: introducing emotional geographies[J]. 2004, 5(4): 523-532.
- [7]Burkitt, I. Emo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M]. London: Sage, 2014.
- [8]Flam, H. Emotion's map: a research agenda[M].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19-40.
- [9]Wahl-Jørgensen, K. Towards a typology of mediated anger: Routine coverage of protest and political emo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12: 2071-2087.
- [10]Wettergren, Å. Mobilization and the moral shock: Ad-busters Media Foundation [M]//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7, p.109-128.
- [11]Wahl-Jørgensen, K., & Hanitzsch, T. Introduction [M]. In: K. Wahl-Jørgensen & T. Hanitzsch (Eds),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0.
- [12]Wahl-Jørgensen, K. Emotions, media and politics [M].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19.
- [13]Kotikova, J. The elephant in the newsroom: Current research on journalism and emotion [J]. Sociology Compass, 2019, 13(5): e12677.
- [14]Ahva, L., Steensen, S. Theory in Journalism Studies [J].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2020: 71-103.
- [15]Peters, C. Emotion aside or emotional side? Crafting an

- 'experience of involvement' in the news[J]. *Journalism*, 2011, 12(3): 297–316.
- [16]Schmidt, T. R. 'It's OK to feel': The emotionality norm and its evolution in US print journalism[J]. *Journalism*, 2020, 1464884920985722.
- [17]Wahl-Jorgensen, K., Schmidt, T. R. News and storytelling [M]//*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9: 261–276.
- [18]Gürsel, Z. D. US newsworld: The rule of text and everyday practices of editing the world [M]. In: S. E. Bird, (Ed.), *The anthropology of news & journalism*.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5–53.
- [19]Glück, A. What makes a good journalist? Empathy as a central resource in journalistic work practice [J]. *Journalism studies*, 2016, 17(7): 893–903.
- [20]Steinke, A. J., Belair-Gagnon V.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Constructing Emotion and Emotional Labor in Social Justice News[J].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20, 23(5): 608–627.
- [21]Hochschild, A. R. *The managed he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22]Hopper, K. M., Huxford J. Emotion instruction in journalism courses: An analysis of introductory news writing textbooks[J].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2017, 66(1): 90–108.
- [23]Hopper, K. M., Huxford J E. Gathering emotion: examining newspaper journalists' engagement in emotional labor [J]. *Journal of Media Practice*, 2015, 16(1): 25–41.
- [24][33]Jukes, S. *Journalism and Emotion*[M]. Thousand Oaks: SAGE, 2020.
- [25]Richards, B., Rees, G. The management of emotion in British journalism[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1, 33(6): 851–867.
- [26]Jukes, S. *Journalism and Emotion* [M]. Thousand Oaks: SAGE, 2020, p.4.
- [27]Duncan, S. Sadly missed: The death knock news story as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grief [J]. *Journalism*, 2012, 13 (5): 589–603.
- [28]Duncan, S., Newton J. How do you feel? Preparing novice reporters for the death knock [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0, 4(4): 439–453.
- [29]Barnes, M. L. *Journalism and everyday trauma: A grounded theory of the impact from death-knocks and court reporting*[D].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6.
- [30]Pantti, M., Wahl-Jorgensen, K. & Cottle, S. *Disasters and the 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 Peter Lang, 2012.
- [31]Kotisova, J. When the crisis comes home: Emotions, professionalism, and reporting on 22 March in Belgian journalists' narratives[J]. *Journalism*, 2020, 21(11): 1710–1726.
- [32]Kotišová, J. Cynicism ex machina: The emotionality of reporting the 'refugee crisis' and Paris terrorist attacks in Czech Televis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32(3): 242–256.
- [34]Weaver, D. H., Beam, R. A., Brownlee, B.J., Voakes, P. S. & Wilhoit, G.C.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US news people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58.
- [35]O'Donnell, P., Zion, L., Sherwood, M. Where do journalists go after newsroom job cuts? [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6, 10(1): 35–51.
- [36]Morini, C., Carls, K., Armano, E. Precarious passion or passionate precariousness? Narratives from co-research in journalism and editing[J]. *Recherchessociologiques et anthropologiques*, 2014, 45(45–2): 61–83.
- [37]Reinardy, S. *Journalism's lost generation: The un-doing of US newspaper newsroom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8.
- [38]O'Donnell, P., Zion, L., Sherwood, M.. Where do journalists go after newsroom job cuts? [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6, 10(1): 35–51.
- [39]Ekdale, B., Tully, M., Harmsen, S., et al. Newsworld within a culture of job insecurity: Producing news amidst organizational and industry uncertainty [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5, 9(3): 383–398.
- [40]Mitchelstein, E, Boczkowski, P. J. Between tradition and change: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online news production[J]. *Journalism*, 2009, 10(5): 562–586.
- [41][47]Coward, R. *Speaking personally: The rise of subjective and confessional journalism* [M]. London: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3.
- [42]Schudson, M.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 [43]Wahl-Jorgensen, K. The 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 A case study of Pulitzer Prize-winning articles[J]. *Journalism*, 2013, 14(1): 129–145.
- [44]Huan, C. The 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 i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hard news: a corpus-based study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17, 14(5): 461–479.
- [45]Rosas, O. V. Strategic Avoidance and Strategic Use: A Look into Spanish Online Journalists' Attitudes Toward Emotions in Repor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328036), 2018, 12:2114–2132.
- [46]Steenen, S. The intimization of journalism[J].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2016: 113–127.
- [48]Lindgren, M. Autoethnographic journalism: subjectivity and emotionality in audio storytelling[M]//*Reconstructing Identity*. New York: Springe: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2017, p.183–206.
- [49]Enli, G. *Mediated authenticity. How the media constructs reality*. New York: Peter Lang, 2015.
- [50]Lecheler, S. The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Needs to Be about Audience Perceptions: Commentary–Virtual Special Issue on the Emotional Turn[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8(2): 287–291.
- [51]Kyriakidou, M. Imagining ourselves beyond the nation? Exploring cosmopolitanism in relation to media coverage of distant suffering [J].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2009, 9(3): 481–496.
- [52]Kyriakidou, M. Media witnessing: Exploring the audience of distant suffering [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5, 37(2): 215–231.



- [53] Ong, J. C. *The poverty of television: The mediation of suffering in class-divided Philippines*. London: Anthem Press, 2015.
- [54] Loosen, W., Schmidt, J. H. (Re-) discovering the audi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urnalism and audience in networked digital media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6): 867-887.
- [55] Meijer, I. C. Valuable journalism: A search for quality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 user [J]. *Journalism*, 2013, 14(6): 754-770.
- [56] Montoyo, A., Martínez-Barco, P., Balahur, A. Subjectivity and sentiment analysis: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area and envisaged developments[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2, 53(4): 675-679.
- [57] Bruns, A.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 [58] Allan, S. *Citizen witnessing*. Cambridge: Polity, 2013.
- [59] Blaagaard, B. B. Situated, embodied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s of citizen journalism[J]. *Journalism Studies*, 2013, 14(2): 187-200.
- [60] Chouliaraki, L. Ordinary witnessing in post-television news: Towards a new moral imagination [M]//Self-Medi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121-136.
- [61] Beckett, C., Deuze, M. On the role of emotion i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16, 2(3): 2056305116662395.
- [62] Lasorsa, D. L., Lewis, S. C., Holton, A. E. Normalizing Twitter: Journalism practice in an emerging communication space[J]. *Journalism studies*, 2012, 13(1): 19-36.
- [63] Ojala, M., Pantti M., Kangas J. Professional role enactment amid information warfare: War correspondents tweeting on the Ukraine conflict[J]. *Journalism*, 2018, 19(3): 297-313.
- [64] Pantti, M. The personalisation of conflict reporting: Visual coverage of the Ukraine crisis on Twitter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9, 7(1): 124-145.
- [65] Wahl-Jorgensen, K. *Emotion and journalism* [J].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2016: 128-143.
- [66] Papacharissi, Z.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67] Quandt, T. Dark participation[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18, 6(4): 36-48.
- [68] Orgeret, K. S. Discussing emotions in digital journalism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8(2): 292-297.
- [69] Ihlebæk, K. A., Holter C R. Hostile emotion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r-right online commenters and their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news media[J]. *Journalism*, 2021, 22(5): 1207-1222.
- [70] Shin, W., Kim, C., Joo, J. Hating journalism: Anti-press discourse and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 journalism in Korea [J]. *Journalism*, 2021, 22(5): 1239-1255.
- [71] Waisbord, S. Mob censorship: Online harassment of US journalists in times of digital hate and populism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8(8): 1030-1046.

## Considering the Emotional Turn in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Towards New Research Agendas

Karin Wahl-Jorgensen, Tian H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velops the idea of 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studies, which has led to an increasingly nuanced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emotion in the production, texts and audience engagement with journalism. Research on news production has shown that journalistic work has always taken emotion into consideration, shaping approaches to storytelling and presentation. However, the view of journalists as detached observers has rendered the emotional labor associated with news production invisible. Research on emotion in journalistic texts has highlighted the fact that even conventional “hard news genres” are shaped by an engagement with emotion. As studies on news audiences and emotions have shown, audienc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emotionally engaged, recall information and take action when news stories are relatable. The affordances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social media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pace for emotion. The expanded opportunities for participation have contributed to questioning traditional distinctions between news audiences and producers and have ushered in new and more form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that have spilled over into practices of news production.

**Keywords:** affect; journalism studies; news audiences; objectivity; social media

**Author:** Karin Wahl-Jorgensen, School of Journalism, media and culture, Cardiff University.

**Translator:** Tian Ha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 虚拟可导航空间与情感体验：可视化作为数字新闻核心叙事的中国经验与理论前瞻<sup>1)</sup>

李梦颖 陆晔

**摘要** 数字新闻创新性的重要变化之一，在于可视化从过往新闻文本的文字内容点缀逐渐成为数字新闻产品的核心叙事。在系统梳理这一变化的技术文化背景基础上，本研究重点分析了可视化作为数字新闻核心叙事的中国经验，归纳出九大类数字新闻可视化实践，以及如何通过滑屏和感官沉浸凸显出可视化新闻叙事的情感体验，并对可视化新闻叙事生成的“虚拟可导航空间”的特征和理论价值进行了前瞻性讨论。

**关键词** 可视化；数字新闻；新闻叙事；虚拟可导航空间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李梦颖，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博士后，上海 200433；陆晔，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 一、研究背景

信息与传播技术（ICT）革命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迅速发展，极大地冲击了大众媒介时代新闻编辑部的专业理念和工作常规，数据新闻、黑客、开源代码进入过往以编辑记者为核心的新闻编辑部<sup>[1]</sup>，传统新闻业正日益成为初创公司，围绕新闻生产流程再造、新闻产品创新、新闻触达渠道方式与算法、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软件创新结合的一系列新闻创新，成为机构化、组织化新闻生产面对数字环境必须做出的回应<sup>[2]</sup>，可视化从过往新闻文本的文字内容点缀逐渐成为数字新闻产品的核心叙事，便是数字新闻创新性的重要变化之一。

2020年3月，《华盛顿邮报》一篇关于新冠疫情的可视化报道<sup>[3]</sup>，以动画模拟解释病毒的传播模式及保持社交距离对于“压平增长曲线”的作用，被业界公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新冠病毒传播过程最清晰易懂的解释，真正影响和改变了公众对于病毒传播速度以及保持社交距离重要性的理解。该文后来被翻译成12种语言，并成为《华盛顿邮报》历史上点击量最高的新闻报道，图表记者 Harry Stevens 凭借该报道斩获了2020年的霍华德卓越创新新闻奖。事实上，近年的国际新闻大奖常见可视化报道位列其中，包括2017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2018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都颁给了基于数据可视化的新闻作品<sup>[4]</sup>。2021年5月，第42届世界新闻设计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澎湃新闻可视化作品《虹镇老街：上海市区最大棚户区华丽转身》<sup>[5]</sup>获原创插画应用类优秀设计奖，旗下英文媒体 Six Tone

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移动时代的都市民众媒介行为与地理空间”（17JJD860001）的阶段性成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支持。



的可视化作品《The Telescope at the end of the universe（世界尽头的望远镜）》<sup>[9]</sup>获环境科学类故事页面设计优秀设计奖。前者是历时三年完成、有关上海市区最大棚户区改造的大型新媒体交互产品，采取手机移动端竖屏优先的设计，以人物口述为主线，以插画结合航拍视频、现场视频、卫星地图、历史资料照片等素材，复原和呈现了上海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典型社区样本的历史变迁。后者则是通过手机端H5设计，融合动画、图表、现场照片等元素，首次独家披露了位于贵州的全世界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电射望远镜“中国天眼”的运作和日常维护，生动地向全球受众展示了中国天文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与进步。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传播的优秀数字新闻作品都包含或多或少的可视化元素，已有研究通过系统梳理近年获奖的数据新闻发现，大部分获奖作品都运用了可视化技术——Adegboyega Ojo 和 Bahareh Heravi 通过对包括全球编辑网络（GEN）数据新闻奖在内的44个获奖数据新闻的分析，发现近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包含了图表或动态地图<sup>[7]</sup>；在 Mary Young 等搜集的26个获奖的加拿大数据新闻样本里，只有1个没有可视化交互设计<sup>[8]</sup>。可以说，可视化作为成功的数字新闻创新实践，已成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优质新闻产品的重要特点。不仅如此，新冠疫情再次驱动了新闻业对于可视化的探索，路透社最新发布的《2021年新闻、媒体技术发展趋势和预测》<sup>[10]</sup>认为，疫情让新闻业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可视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媒体在面对这场极端复杂和重要的公共危机时，为公众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专业的解释，他们预测，未来新闻机构将更加重视可视化的应用和创新。也就是说，可视化不仅普遍进入当下数字新闻核心叙事，更是对数字新闻生产理念和实践策略产生深刻影响。

## 二、可视化：从点缀文字到核心叙事

在数字新闻场景下，可视化通常是指“用图形符号展示数据以传递明确的信息”<sup>[10]</sup>，常见的形式包括折线图、饼图等静态的图表，以及动态地图、模拟动画、360度全景视频、虚拟现实等交互

度更高的叙事样态<sup>[11]</sup>。

一方面，可视化起源于启蒙运动倡导的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认知<sup>[12]</sup>，无论是图表还是地图，都试图提供一种从上往下俯瞰的、上帝般的视角<sup>[13]</sup>，希望对事物形成一种全面客观科学的把握。类似观点在关于量化的讨论中也很常见，量化被认为“是一种距离的技术”<sup>[14]</sup>，通过将人与物转化成数字，让人们同观察的对象保持距离，从而形成一种客观的理解<sup>[15]</sup>。可视化的二维视角、干净布局、对几何形状和线条的运用，以及标明数据来源等惯例，都帮助其营造了一种客观性、真实感，让可视化可以承担一种有说服力的修辞工作，成为易被公众接受的、解释复杂社会现象的重要方式<sup>[16]</sup>。

另一方面，数据图形、图表并不一定会让人产生距离感，降低人的同理心，相反，可视化可以消解量化数据所产生的距离感，人们通过可视化将数字又“转化回了人”，从而可以理解和想象身处远方苦难中的其他人——“数据可视化使人们有可能感受到数字、度量、统计数据，从而可以以情感的方式理解数字，而不仅仅是从认知和理性的角度出发”<sup>[17]</sup>。也因此，有学者说，人不仅是阅读一个可视化设计，更是去感受它<sup>[18]</sup>——可视化的形式、颜色、排列都会以特定的方式刺激人们的感官，激发人们的情感回应，引发社会参与<sup>[19]</sup>。

由此，可视化结合了两种力量，一种是基于数据的客观感和科学性，另一种则是诉诸于情感的、体验式的、能够激发共鸣的能力，这构成了其之于新闻叙事的特殊价值。业界自十余年前就开始尝试在报道中融入可视化元素，希望借此提升新闻的可信度、增强用户的参与感，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不过，近年最重要的变化是，可视化从过去主要服务于文字的装饰性元素，已经发展成为新闻故事的核心要素，它不再只是呈现数据的技术工具或者可有可无的视觉点缀，而是一种独立的新闻叙事，甚至可以说，在一些报道领域，比如解释性的数据新闻和历史性的事件报道，可视化正在取代文字成为数字新闻的核心叙事。这也是可视化同过往信息图（infographics）的最大区别<sup>[20]</sup>。

这种变化的发生有三个重要背景。第一，随

着日常生活的加速数据化,数据于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得益于开源运动<sup>[21]</sup>,媒体可以获得公开数据,数据新闻应运而生<sup>[22]</sup>,可视化不只是在视觉意义上将原本“不可见的”的数据、数据的关系和规律呈现给公众<sup>[23]</sup>,对于日常生活中不会直接接触到数据的大多数人来说,数据几乎只有通过可视化才变得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才在社会意义上存在<sup>[24]</sup>。

第二,数字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处理、分析和呈现可视化产品的电脑软件和硬件的普及,让编辑室在日常的新闻生产中运用可视化技术成为可能<sup>[25]</sup>。包括 Tableau、Flourish、Carto、Highcharts 等可视化和数据分析工具已经成为编辑室新闻生产常规的一部分<sup>[26]</sup>,即便对于那些没有资源组建专门可视化团队的媒体,依然可以利用这些现成的、操作简单的工具,制作可视化新闻<sup>[27]</sup>。

第三,社交媒介时代视觉文化崛起,而且伴随数字图像和成像的巨额增长,这个新的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是被计算机创造出来的,这些巨量视觉信息构成了当今观看世界的主要方式<sup>[28]</sup>,视觉元素随之在新闻报道中占据核心位置。早在 2015 年,牛津路透研究所就曾提出,全球的新闻业都在经历两项根本性的变革,一是移动端用户的迅速增长,二是社交媒介成为用户浏览新闻的主要渠道,这都意味着,新闻业需要适应大众信息消费习惯的转变,找到吸引读者的方式<sup>[29]</sup>。于是,在社交媒介上分享可视化设计,成为新闻生产流程中的重要环节,媒体会专门调整图表的样式、生成竖屏 GIF 动画,以适应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介传播,为的是引起读者兴趣,提高新闻故事的可见性<sup>[30]</sup>。

随着可视化成为数字时代新闻讲故事的新型样态,传统新闻生产的流程和方式、编辑室的结构和文化都面临挑战,并最终指向机构内部对于新闻操作理念和原则的不同理解。多项研究表明,在可视化新闻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时间<sup>[31]</sup>:好的可视化表达往往是非标准化的,需要花时间反复调适以找到最好的呈现方式,这与要求快速产出的日常新闻生产相冲突<sup>[32]</sup>。不仅如此,对于习惯了用文字进行思考的记者和编辑来

说,他们不只需要学习新的工具和技能,还要转换思维方式,从视觉的角度构思报道。同时,当越来越多的视觉设计师、程序员等来自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开始进入编辑室,他们对于新闻价值、新闻与用户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如何找到有效的合作方式,并重新明确新闻操作的原则,是许多机构媒体面临的问题<sup>[33]</sup>。基于对记者的访谈和对编辑室日常工作的观察,有研究发现在德国和瑞士,记者依然主导编辑室,设计师和程序员等主要是技术服务提供方,负责实现记者的想法;而在《纽约时报》等,无论是程序员、视觉设计师还是数据分析专家,都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新闻工作者,并且操作理念基本一致,比如是数据的准确性重要还是视觉的吸引力优先,可视化的作用是辅助说明还是核心叙事,Wibke Weber 和 Hannes Rall 认为,只有当机构内部对于这些问题有了清晰的共识,才可能形成顺畅有效的工作模式<sup>[34]</sup>。Florian Stalph<sup>[35]</sup>、Murray Dick<sup>[36]</sup>等同样提出,编辑室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组织架构和生产流程的改变,更是关于专业新闻理念的探讨和再定义。如何从当下的数字新闻实践出发,厘清可视化究竟在哪些维度改变了新闻的含义,重新定义新闻的价值以及新闻与公众关系,对于理解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新闻生产的发展趋势有重要价值。

### 三、可视化作为数字新闻核心叙事：中国经验

在实践层面,数字新闻的可视化大量采纳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用户界面和人机交互技术,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驱动新闻(VR 新闻)、实时交互视频新闻(如在线新闻发布会、互动游戏)、可穿戴设备新闻(如新闻生产者的主观视角和生物信息作为新闻产品的一部分呈现)极大地将数字新闻产品拓展到传统新闻文本未能涉足或难以企及的领地<sup>[37]</sup>,2016 年《卫报》在里约奥运会报道中大量采集运动员的身体数据对比赛进行展示,便是一例。澎湃新闻 2018 年推出的全媒体专题《海拔 4000 米之上》<sup>[38]</sup>以实景 VR 结合 360 度全景影像、视频短片等对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深入报道,并为受众提供了电脑端和移动端两个不同版本的交互产品,在 2019 年中国新闻奖评选中



获得一等奖，这是中国新闻奖历史上第一次VR作品获奖，不仅体现了可视化越来越成为传递新闻信息的有效手段，更展现出可视化作为数字新闻叙事（storytelling）如何为用户形成个人化叙述的广阔前景。

尽管学者们提出了针对可视化叙事结构、特点和策略的分析框架——有的从排序、互动性和信息三个维度区分不同的叙事结构<sup>[39]</sup>；有的从讲述者、顺序、时间、可读性四个方面讨论叙事的特点<sup>[40]</sup>；还有的关注视觉叙事的策略，比如对进度条、颜色、过渡元素、导航图标的使用展开分析<sup>[41]</sup>；但从新闻叙事着手，将可视化视为数字新闻的一种全新实践，相关讨论仍显不足。

根据近几年可视化作为核心新闻叙事的中国经验，这些新闻产品大致可分为以下九大类。

其一是结构化数据的可视化新闻。如上观新闻2020年2月29日发布的《552篇新冠肺炎中文论文详解》<sup>[42]</sup>，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对新发表的552篇新冠相关中文论文进行编码，并构建语义网络。通过可视化，文章以图文呈现中西医研究之间的区别和互动，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这是可视化新闻较为传统的呈现方式。为更加适应手机端的传播，结构化数据的可视化往往越来越多地以短视频代替图文里的静态条形图，如上观新闻《让数据动起来！1990-2019浦东与主要二十城GDP比较》<sup>[43]</sup>以视频表达动态条形图，直观显示30年来的城市GDP发展，与静态条形图相比，动态的条形图更能营造时间变化和“你追我赶”的情绪氛围，而且短视频更适合社交平台传播。

其二是非结构化数据的可视化新闻。如上观新闻2018年的《上海相亲角调查》<sup>[44]</sup>，通过半年调研，收集了1023张相亲帖，进行数据编码，将相亲群体画像、择偶标准数据可视化，从数据角度解读相亲角文化，最终以移动端呈现。与此类似的还有上观新闻《上海春菜图鉴：最受欢迎的居然是平平无奇的它》<sup>[45]</sup>，从“美团买菜”平台获取了上海居民的买菜数据，用手绘漫画结合数据图的形式绘出了一副极具地域民俗特色春菜图谱。

其三是提取视觉元素的可视化。如上观新闻

《图说结婚证书花样变迁，中国人的爱和浪漫都在细节里》<sup>[46]</sup>，分解自清朝以来800多份婚书，将不同年代婚书中的视觉元素提取、归类整理，采用静态和动态（GIF）信息图，以手机端图文呈现；同时还选取了具有年代代表性的6份婚书，制作了小游戏“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婚书”。

其四是新闻事件相关的互动游戏。人民日报客户端2017年8月1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推出的互动H5《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应该是最为著名的实例，除此之外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产品“看看新闻（Knews）”2017年关于上海洋山港全自动化改造的互动游戏《来，和世界冠军比赛“抓娃娃”》、两会报道互动游戏《两会必答题》等也曾风靡用户。2020年上观新闻推出移动端互动游戏《守护上海堡垒的居然是ta！》<sup>[47]</sup>，用新闻游戏将9个人物故事融入游戏角色：90后白衣天使、街道工作人员，海关值机处团队，快递小哥，共享单车保洁员，城管执法人员，引导用户闯关“返沪复工”旅程，表达对抗疫一线各行各业工作人员的敬意。

其五是LSB型新闻应用程序。如上观新闻《查离你家最近的24小时药店在哪里》<sup>[48]</sup>，通过建立起关于24小时药店包括地址、是否可使用医保、特色等要素在内的小型数据库，一一匹配百度地址，并依托这一数据库，制作移动端H5应用程序，可通过读取用户地理位置，推荐附近3公里内最近的24小时药店。

其六是3D建模。如上观新闻《外滩百年变迁之徐汇滨江》<sup>[49]</sup>这一电脑端可视化产品，用老照片、老影像视频、旧报纸版面、历史地图、规划效果图等历史资料讲述历史地点，用CAD效果图、3D建模等技术来模拟滨江改造后的场景，用户可点击地图不同分区查看改造情况，还可以左右滑动按钮同屏对比改造前后同一区域的变化。

其七，最为盛行的一个大类是移动端竖屏下拉式长幅动画，如澎湃新闻获2018年中国新闻奖融媒界面项目一等奖的H5新闻作品《天渠》<sup>[50]</sup>，该作品为下拉式长幅互动连环画，结合了渐进式动画、360度全景照片、图集、音频、视频、交互式体验等，讲述贵州遵义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原

党支部书记黄大发 36 年修水渠的脱贫攻坚故事。在此之前澎湃新闻《致敬！好人耀仔：一位宁德村支书的 45 岁人生》<sup>[51]</sup>也类似，以下拉式竖屏漫画结合视频音频，报道 2016 年第 14 号强台风“莫兰蒂”登陆福建、为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牺牲的宁德市古田县卓洋乡庄里村支书周炳耀的感人事迹，上线一周点击量超过 147 万。澎湃新闻《虹镇老街：上海市区最大棚户区华丽转身》这一集纳了图文、视频、谷歌地图、历史照片等的 H5 作品，同样也使用了竖屏下拉式漫画和动画。

其八，近期机构媒体热衷为新闻报道设计带二维码的手机竖版海报也可被视为一类，其最大好处是非常适合在社交媒体一次发布“九宫格”。

其九，微信公众号 SVG 交互图文也很受欢迎。如 2020 年 4 月 7 日，因新冠疫情“封城”的武汉“解封”当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出交互产品《今天，发条微信一起点亮武汉》<sup>[52]</sup>，用户点击黑白图片后渐变成彩色照片，让读者在互动中感受“重启”——通常微信公众号文章以静态排版为主，该作品创新地修改微信编辑器 css 中 svg 元素，使动画支持鼠标点击，让透明图的透明度由 0 变为 1，罩住底层灰白色的照片，从而实现“点亮”效果。

上述九个大类的可视化新闻的叙事特征，就像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与传统新闻文本的“作者主导”不同，它们都力图在“作者主导”和“读者主导”这两种叙事（narrative）之间寻求平衡——如果说前三类结构化数据可视化、非结构化数据可视化和视觉元素提取的可视化在叙事导向上仍然较为传统地主要由“作者主导”，后几类，尤其是互动游戏、LSB 新闻应用、3D 建模结合左右滑屏、下拉式长幅动画、SVG 交互图文，则无不为“读者主导”或者更准确地称之为“用户主导”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综合起来看，可视化新闻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兼顾了两方面的灵活性，“在结构化叙述的背景下又为交互性提供了一定空间”<sup>[53]</sup>。所谓“作者主导”是指严格设定好用户观看可视化的路径，并借由标题、图释等向读者传递明确的消息，而“读者主导”或“用户主导”叙事，指的是用户可以自己控制或选

择探索可视化的路径，以形成各自独特的故事线。大部分可视化新闻叙事介于这两者之间，或是这两种叙事的组合——比如著名的“Martini-Glass”结构<sup>[54]</sup>。也有学者用“线性”和“非线性”的混合，或者“讲述”和“展演”的交叉<sup>[55]</sup>来突出可视化新闻的这种叙事特点。

#### 四、滑屏和感官沉浸：可视化新闻叙事的情感体验

无论《天渠》还是《虹镇老街》，在叙事上最突出的特质都是所谓的“滚动故事（scrollytelling）”<sup>[56]</sup>，即“scroll”滚动（屏幕）和“storytelling”讲故事的组合——故事随着用户滚屏的动作而展开。此处，“滚屏”代表的是在台式或移动设备上阅读时最自然的操作手势，用户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交互设计，控制可视化展开的顺序，建立自己的观看路径。过去，基于文字的传统新闻叙事强调“文本块”之间要有清晰的逻辑关系，可以形成连贯的叙述，即便叙述偶尔偏离主线，也不会太久。<sup>[57]</sup>可视化叙事则不同，既没有明确的开头、主干和结尾，不同类型的视觉元素之间也没有不能打破的逻辑链条，他们“更像一组堆叠的叙事块一样交织互嵌”<sup>[58]</sup>，读者可以连续滚动屏幕也可以停留在某一处、专注于其中一个元素，还可以从一个动画跳到下一个图表，构建个人化的叙事路径，这种对交互性的超强包容度是可视化叙事的重要特征。

在许多情况下，用户的滚屏动作控制的是新闻故事的时间线。比如《华盛顿邮报》关于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游行的报道<sup>[59]</sup>，以时间轴的方式呈现 149 个集会现场拍摄的短视频，用户自己可以控制故事展开的节奏，滚动网页即可看到不同时间段的现场视频的静态帧，停止滚屏则鼠标箭头对应的视频会开始播放。《外滩百年变迁之徐汇滨江》也有类似处理。而且，在上述案例里，滚屏不仅和时间挂钩，还融合了颜色、数字、速度等不同元素，一起制造一种情感体验，比如《天渠》《虹镇老街》，历史故事部分的黑白手绘动画和现场彩色视频形成的反差。又如，去年疫情期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新冠疫情击垮美国



商业的那个月》<sup>[60]</sup>，回顾了2020年3月美国疫情如何急转直下——从月初的30例确诊变成月底的18万8千例，给美国的企业带来了巨大打击。这篇文章做了这样一个可视化设计：当读者下滑鼠标时，页面右侧的日期和左侧代表累计确诊病例的数字同时开始滚动，一片红色从页面底部加速涌出，直到布满整个屏幕。视觉编辑Hanna Sender解释，“设计这样由数据驱动的下滑效果是为了重现一种氛围：被吞没的感觉，扑面而来飙升的确诊案例，锅里的青蛙”<sup>[61]</sup>。可以发现，提供交互空间与传递明确的信息并不冲突，庞大的数据和复杂的线索被编织成相互关联的元素，而把不同的元素连接起来，设计出多条“从一个元素到另一个元素的轨迹，这就构成了叙述”<sup>[62]</sup>，读者可以在不同的轨迹中选择和创造，从而与新闻产生特殊的连接。如今，这种融合了简单交互的滚屏故事已成为全球数字新闻可视化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中国数字新闻实践的特殊性在于，移动端用户占绝对比例，受此影响，基于手机触屏的竖向滑屏式可视化新闻最为流行。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的Nic Newman曾说过，当新闻业迈入21世纪的第3个十年，所有报道都是为移动设备制作的<sup>[63]</sup>，这句话用来描述我国的数字新闻生产现状毫不夸张。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为9.89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7%，使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网的比例则继续下降，分别为32.8%和28.2%；网络新闻用户规模共7.43亿，其中手机用户达7.41亿。<sup>[64]</sup>移动设备的流行首先意味着用户新闻阅读习惯的改变：相较于过去在少数的几个时间段集中地阅读新闻，人们如今在大量碎片化的时间里浏览新闻<sup>[65]</sup>，并且新闻接触行为往往同微信等社交媒介的使用交织在一起，这也导致传统的线性文字叙事不再符合当下用户的阅读习惯。同时，对新闻机构而言，数字新闻生产需要适应手机屏幕大小的限制（比如超过四列的图表可能就不适合在手机竖屏展示），还要能够在移动网络下顺畅运行（高清的360度全景新闻往往会提示用户电脑端效果更好），并且符合手机用户的使用习惯（点击按钮通常设计在屏

幕底端以方便单手操作）。于是，媒体从早期追求精细炫目的可视化效果，逐步转向青睐设计简洁、交互方式简单的可视化新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了手机滑屏设计、方便微信传播的H5下拉式动画成了目前国内最常见的可视化设计。

尽管移动设备的流行往往被描述成是一种挑战，比如手机小屏幕的限制等，但它给数字新闻可视化也带来新的机遇。当人们端坐在电脑前以一种“前倾的姿态”浏览新闻时，往往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追求快速高效地获取信息，而手机的使用则穿插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里，人们更可能以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互动<sup>[66]</sup>。同时，依托手机触屏，可视化变成了交互界面，可以调动用户的多重感官，发挥出强大的情感动员力量。如马诺维奇所说的，新媒体不是“像照相现实主义一样”逼真地模拟真实场景，而是“在多种维度中创建现实效果，视觉逼真仅是其中一个维度——这些新的维度包括：身体对于虚拟世界主动参与、视觉以外其他感官的参与”。<sup>[67]</sup>以《天渠》为例，读者可以通过滑动、点触、放大屏幕的方式，主动探索过去36年间的多个修渠场景，背景声中鸟鸣、当地的歌谣和开渠炸石的爆炸声，都一同营造了真实感和现场感，在视觉、触觉和听觉多重感官的参与下，用户得以“进入”报道、产生共情、同他人建立连接，这种情感体验是可视化新闻生成意义、激发公共参与的重要动因之一。

## 五、讨论：可视化、“虚拟可导航空间”与数字新闻理论前瞻

一图是否真的胜千言？学界关于可视化新闻的效果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通常认为，相较于传统的文字报道，新闻可视化可以让复杂的社会问题变得更加容易理解<sup>[68]</sup>，让一些庞大繁杂的数据变得更透明和开放。同时，在假新闻满天飞的背景下，对客观数据的使用和呈现，有利于增强报道的可信度，提升受众对于新闻机构的信任感。此外，同其他视觉元素一样，可视化表达更容易吸引用户的注意力<sup>[69]</sup>，有研究用眼动仪追踪用户阅读新闻时的视线位置，他们发现无论是阅读纸质媒

体还是在平板或电脑网页上浏览新闻,超过 90% 的人会注意到图表,有的甚至略过文字,只看图表<sup>[70]</sup>。不仅如此,如前所述,可视化新闻的互动性及其带来的参与感是线性文字难以提供的。读者可以通过搜索、放大缩小、滚动屏幕、点击超链接等操作,主动探寻新闻故事的发展,更深入地理解相关议题<sup>[71]</sup>。

然而,也有学者质疑,可视化并不一定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信息,读者可能需要对数学统计和不同的图表类型有基本了解才能读懂,换言之,可视化对于读者的前期知识储备和技能有更高要求——是谓“可视化素养”,因而对于一些受众来说,可视化的广泛应用恰恰让他们更难读懂新闻<sup>[72]</sup>。其次,可视化并不能直接增强报道的可信度或提升读者的参与感,它的传播效果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通过实验和焦点小组的方法发现,新闻的主题、数据来源、人们原本的知识、观点和情绪等都可能影响受众对于可视化新闻的感受。<sup>[73][74]</sup>再,尽管可视化元素更能吸引读者的目光,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的视线平均只会停留三四秒,只有少部分的人会仔细读图,花在阅读文字上的时间则显著更长,也就是说,可以吸引注意力并不意味着可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sup>[75]</sup>。最后,互动性也可能是种“假象”<sup>[76]</sup>,尽管可视化新闻看上去提供了更多的互动空间,但通常用户只能进行有限的操作,真正能让用户输入内容、生成个性化叙事的设计仍比较少。

如何理解这些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 引用 Andrew Duffy 和 Peng Hwa Ang 的批评,数字新闻研究总是以新闻为先,讨论数字化能否为新闻业带来新的机遇,而研究者应该换一个思路,从数字技术的原理出发,来理解新闻业的变化<sup>[77]</sup>。已有的讨论中,无论是对可视化新闻的效果持乐观还是怀疑态度,都是在用老的尺度去衡量其影响。如果可视化的力量来自于它是一种视觉表达,那它同图片、视频新闻、以及纸质媒体时代就有的信息图有什么区别? 又如 Helen Kennedy 等<sup>[78]</sup>提出,一个好的可视化应该是突出新的事实还是可以激发人们的兴趣、让他们愿意花更多时间更深入地了解一个议题;重要的是唤起人们对于数据所示对

象的同情,还是说提供空间让读者自己探索数据,抑或是提供一种审美体验? 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能在传统衡量新闻效果的框架内探讨可视化的影响——当可视化成为新的核心新闻叙事,其指向的是对新闻含义、新闻价值以及新闻与公众关系的重新定义。

通过对当下中国数字新闻实践典型个案的归纳和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数字新闻核心叙事的可视化,对传统新闻生产理念和实践策略的根本挑战在于,将传统新闻报道变成了全新的“虚拟可导航空间”,这一点,在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交互界面上表现得尤为显著——马诺维奇将卡巴科夫剧场设计的概念用来解释新媒体创造的空间——“通过将一个装置的总体空间分成两个或多个互相联系的空间,他精心设计一条穿越空间的路径,这既不影响观众自行探索,又可以有效防止观众在空间中迷路或者感到无聊”<sup>[79]</sup>。对于可视化数字新闻生产者而言,他们是在“设计观众在时空中的经验”,通过将滑动、放大缩小、点击等最自然的交互设计,设置为新的动画、视频、文本等等不同元素展开的方式,引导用户的注意力;对于用户来说,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读者、听众和观众,而是“在别人设计的空间中创建自己特定的导航路线”的积极用户,这样的“可导航空间是一个主观化的空间,其结构呼应着主体的运动和情感”<sup>[80]</sup>。可视化作为数字新闻的核心叙事,绝不是对传统新闻文本的补充或迭代,而是一种全新的观看世界的方式,这种经由“虚拟可导航空间”展开的实践,不止是阅读、观看、理解,更“是全身参与的一套复杂的感觉反馈系统”,“我们的身体就像数据网络的延展部分”<sup>[81]</sup>,而且,这个既关乎我们身处其中的外部世界又关乎我们内在情感的“虚拟可导航空间”,不仅存在于手机屏幕的方寸之间,我们还将之随身携带,即时交互,在虚实之间穿梭往复。

至于经由数字新闻核心叙事的可视化而生成的数字新闻“虚拟可导航空间”,其之于传统新闻理念和实践策略的深刻影响,尚未全部显现,但至少可以看到在以下两个方面呈现的端倪。

其一,可视化新闻叙事所生成的“虚拟可导



航空间”，体现了一种更为明确的“用户主导”和以用户为中心的思路，其设想的是更加主动、积极的公众，共同参与到新闻故事的构建之中<sup>[82]</sup>，而且，这种参与，是通过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便携式智能设备随时随地交互而展开的持续实践，这种认识论层面的根本差异，才是数字新闻生产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与传统新闻理念和实践策略的最大区别<sup>[83]</sup>。

其二，这种由“虚拟可导航空间”所激发的用户新闻实践和情感体验，成为理解当下生活世界的重要维度，重新定义了新闻作为公共知识的价值。过去传统新闻业将用户参与理解作为一种公共参与，是同公众形成对话的前提<sup>[84]</sup>；移动终端的普及带来了公民新闻的崛起和更积极的社会参与，用户可以通过手机随时记录和分享信息<sup>[85]</sup>。而可视化新闻叙事生成的“虚拟可导航空间”的公共参与，和上述两类参与皆不相同——它通过身体和感官沉浸<sup>[86]</sup>，让传统新闻的读者或受众变身玩家，原本仅供阅读、收听、观看的新闻报道文本变成了类似电子游戏的沉浸式新闻场景，这个“虚拟可导航空间”里的用户如同游戏玩家，仿若置身新闻现场，像游戏打通关一样主动探寻新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用滑屏、点击等身体动作建构起自己有关这一新闻事件的故事线，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一系列互联网行为表达情感、彰显自身的价值立场，且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同新闻事件当中的人物、同其他用户产生情感连接和思想共鸣<sup>[87]</sup>。多位学者已着力探讨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提出重视情感在新闻生产以及用户参与中的重要角色，情感本质上是关系的、具有公共性，体验他人的境遇、产生共情，是激发公众进行公共参与和社会行动的重要因素。<sup>[88][89]</sup>而对于“虚拟可导航空间”的进一步关注和深入讨论，则是洞察这些新的变化“不仅是观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方法，而且是我们创造变化的积极途径”<sup>[90]</sup>的有益开端。本研究只是第一步。

（作者衷心感谢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数据新闻中心总监尤蕊洁、记者肖书瑶在案例收集、分析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 参考文献

- [1]Usher, N. Interactive Journalism: Hackers, Data, and Code [M].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
- [2]Usher, N. Marking News at The New York Times [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4.
- [3]Why outbreaks like coronavirus spread exponentially, and how to “flatten the curve” [EB/OL]. the Washington Post. (2020-03-14)[2021-05-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20/world/corona-simulator/>.
- [4]Risam, R. Beyond the migrant “problem”: Visualizing global migration [J].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19, 20 (6): 568.
- [5]澎湃新闻.虹镇老街:上海市区最大棚户区华丽转身 [EB/OL]. (2020-10-14)[2021-05-17]. [https://h5.thepaper.cn/html/interactive/2020/10/hong\\_zhen\\_lao\\_jie/index.html](https://h5.thepaper.cn/html/interactive/2020/10/hong_zhen_lao_jie/index.html).
- [6]The Telescope at the end of the universe [EB/OL]. Six Tone. (2020-10-01)[2021-05-17]. <https://interaction.sixtone.com/feature/2020/telescope/>.
- [7][26]Ojo, A., Heravi, B. Patterns in award winning data storytelling: Story types, enabling tools and competences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8, 6(6): 693-718.
- [8]Young, M. L., Hermida, A., Fulda, J. What makes for great data journalism? A content analysis of data journalism awards finalists 2012 - 2015 [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8, 12 (1): 115-135.
- [9]Newman, N. 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21 [EB/OL]. (2021-01-07)[2021-05-17].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journalism-media-and-technology-trends-and-predictions-2021>.
- [10][20][72]Kennedy, H., Hill, R. L., Aiello, G., Allen, W. The work that visualisation conventions do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6, 19(6): 715-735.
- [11][39][53][54][57]Segel, E., Heer, J. Narrative visualization: Telling stories with data [J].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2010, 16(6): 1139-1148.
- [12]Friendly, M. A brief history of data visualization [M]//? Chen, C. Handbook of data visualization.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8: 15-56.
- [13]Kress, G.,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2020: 146.
- [14]Porter, T. M.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xi.
- [15][17]Kennedy, H., Hill, R. L. The feeling of numbers: Emotions in everyday engagements with data and their visualisation [J]. Sociology, 2018, 52(4): 830-848.
- [16]Kennedy, H., Hill, R. L., Aiello, G., & Allen, W. The work that visualisation conventions do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6, 19(6): 715-735.
- [18]Kirk, A. Data visualisation: A handbook for data driven design [M]. London: Sage, 2016: 76.
- [19]Kennedy, H., Engebretsen, M. Introduct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aphs, charts, maps, meanings, feelings, engagements [M]//M. Engebretsen, H. Kennedy. Data visual-

- ization in societ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0: 19-32.
- [21][83]Coddington, M. Clarifying journalism's quantitative turn: A typology for evaluating data journalism, comput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J]. Digital journalism, 2015, 3(3): 331-348.
- [22]Loosen, W., Reimer, J., De Silva-Schmidt, F. Data-driven reporting: An on-going (r) evolution? An analysis of projects nominated for the Data Journalism Awards 2013-2016[J]. Journalism, 2020, 21(9): 1246-1263.
- [23][58]PéWeber, W. Exploring narrativity in data rez-Montoro, M., Veira-González, X.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n digital news media [M]//Interaction in Digital News Media.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36.
- [24][40][56]visualization in journalism [M]//Engebretsen, M., Kennedy, H. Data Visualization in Societ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0: 295-311.
- [25]Manovich, L. What is visualisation? [J]. Visual Studies, 2011: 26(1), 36-49.
- [27]Kennedy, H., Weber, W., Engebretsen, M. Data visualization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news [M]//Engebretsen, M., Kennedy, H. Data Visualization in Societ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0: 164.
- [28][81][90]尼古拉斯·米尔佐夫. 如何观看世界 [M]. 徐达艳,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前言 15; 前言 15; 前言 16.
- [29]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5 [EB/OL]. [2021-05-17].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our-research/digital-news-report-2015-0>.
- [30][55]Weber, W., Engebretsen, M., Kennedy, H. Data stories: Rethinking journalistic storytelling in the context of data journalism [J].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2018(1): 191-206.
- [31]Fink, K., Anderson, C. W. Data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Beyond the "usual suspects" [J]. Journalism Studies, 2015, 16(4): 467-481.
- [32]Smit, G., de Haan, Y., Buijs, L. Working with or next to each other? Boundary crossing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visualisation [J]. 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2014, 1(2): 36-51.
- [33]Appelgren, E., Nygren, G. Data Journalism in Sweden: Introducing new methods and genres of journalism into "old" organizations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4, 2(3): 394-405.
- [34]Weber, W., Rall, H. Data visualization in online journ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 [J].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Visualisation. IEEE, 2012: 349-356.
- [35]Stalph, F. Evolving data teams: Tensions between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professional subculture [J]. Big Data & Society, 2020, 7(1): 1-13.
- [36]Dick, M. Interactive infographics and news values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4, 2(4): 490-506.
- [37]全晓艳, 常江. 2015: 西方新闻可视化发展的新趋势及其解读 [J]. 中国记者, 2016, 001: 115-117.
- [38]澎湃新闻. 海拔四千米之上——三江源国家公园 [EB/OL]. (2018-11-19) [2021-05-29]. <https://h5.thepaper.cn/html/zt/2018/11/sanjiangyuan/index.html>.
- [41]McKenna, S., Henry Riche, N., Lee, B., Boy, J., Meyer, M. Visual narrative flow: Exploring factors shaping data visualization story reading experiences [J]. In Computer Graphics Forum, 2017, 36(3): 377-387.
- [42]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552 篇新冠肺炎中文论文详解: 总量超过英文论文, 中医视角占 24.4% [EB/OL]. (2020-02-29) [2021-05-29]. <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217686>.
- [43]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让数据动起来! 1990-2019 浦东与主要二十城 GDP 比较 [EB/OL]. (2020-11-12) [2021-05-29]. <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310434>.
- [44]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上海相亲角调查 [EB/OL]. (2018-11-11) [2021-05-29]. [https://web.shobserver.com/thirdParty/2019/xiangqinjiao\\_v2/index.html](https://web.shobserver.com/thirdParty/2019/xiangqinjiao_v2/index.html).
- [45]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上海春菜图鉴: 最受欢迎的居然是平平无奇的它 [EB/OL]. (2021-03-26) [2021-05-29]. <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352737>.
- [46]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图说结婚证书花样变迁, 中国人的爱和浪漫都在细节里 [EB/OL]. (2020-08-25) [2021-05-29]. <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282773>.
- [47]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互动游戏: 守护上海堡垒的居然是 ta! [EB/OL]. (2020-09-28) [2021-05-29]. [https://web.shobserver.com/thirdParty/2020/shouhush\\_v3/index.html](https://web.shobserver.com/thirdParty/2020/shouhush_v3/index.html).
- [48]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查查离你家最近的 24 小时药店在哪里 [EB/OL]. [2021-05-29] <http://static.juyingtech.com/placesearch/index.html>.
- [49]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外滩百年变迁之徐汇滨江 [EB/OL]. (2018-01-24) [2021-05-29]. <https://web.shobserver.com/thirdParty/westbund/index.html?ver=2.0>.
- [50]澎湃新闻. 天渠 [EB/OL]. (2017-04-23) [2021-05-29]. <https://h5.thepaper.cn/html/zt/2017/04/tianqu/index.html>.
- [51]澎湃新闻. 致敬|好人耀仔: 一位宁德村支书的 45 岁人生 [EB/OL]. (2016-10-17) [2021-05-29]. <https://h5.thepaper.cn/html/zt/2016/10/gutian/index.html>.
- [52]人民日报. 今天, 发条微信一起点亮武汉 [EB/OL]. (2020-04-07) [2021-05-29]. <https://mp.weixin.qq.com/s/AKy-WRfScIK-HU67ObSuRQ>.
- [59]Reconstructing seven days of protests in Minneapolis after George Floyd's death [EB/OL]. the Washington Post. (2020-10-09) [2021-05-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20/national/live-stream-george-floyd-protests/?itid=lk\\_inline\\_manual\\_4](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20/national/live-stream-george-floyd-protests/?itid=lk_inline_manual_4).
- [60]The Month Coronavirus Felled American Business [EB/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04-04) [2021-05-17]. <https://www.wsj.com/graphics/march-changed-everything/>.
- [61]The year in graphics [EB/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12-31) [2021-05-17]. <https://www.wsj.com/graphics/year-in-graphics-2020/>.
- [62]列夫·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 [M]. 车琳,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 235.
- [63]Newman, N. 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19 [EB/OL]. [2021-05-30]. <https://>



- 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19-01/Newman\_Predictions\_2019\_FINAL\_0.pdf.
- [64]CNNIC. 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1-02-03) [2021-05-17]. [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 [65]Molyneux, L. Mobile news consumption: A habit of snacking[J]. *Digital Journalism*, 2018,6(5):634-650.
- [66]Hernandez, R. K., Rue, J. (2015). *The principles of multimedia journalism: Packaging digital new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169.
- [67]列夫·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M]. 车琳,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184.
- [68]Few, S., Edge, P. What ordinary people need most from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oday [J]. *Perceptual Edge: Visual Business Intelligence Newsletter*, 2008: 1-7.
- [69]Bucher, H. J., Schumacher, P. The relevance of attention for selecting news content. An eye-tracking study on attention patterns in the reception of print and online media[J]. *Communications*, 2006,31(3): 347-368.
- [70][75]De Haan, Y., Kruikemeier, S., Lecheler, S., Smit, G., Van der Nat, R. When does an infographic say more than a thousand words? Audience evaluations of news visualizations [J]. *Journalism Studies*, 2018,19(9): 1293-1312.
- [71][73]Lee, E. J., Kim, Y. W. Effects of infographics on news elaboration, acquisition, and evaluation: Prior knowledge and issue involvement as moderators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6,18(8): 1579-1598.
- [74]Link, E., Henke, J., M?hring, W. Credibility and Enjoyment through Data? Effects of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Data Visualizations on Message Credibility and Reading Experience[J]. *Journalism Studies*, 2021,22(5): 575-594.
- [76]Appelgren, E. An illusion of interactivity: The paternalistic side of data journalism[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8,12(3): 308-325.
- [77]Duffy, A., Ang, P. H. Digital journalism: Defined, refined, or re-defined[J]. *Digital Journalism*, 2019,7(3): 378-385.
- [78]Kennedy, H., Engebretsen, M., Hill, R. L., Kirk, A., Weber, W. Data visualisations: Newsroom trends and everyday engagements[M]// *The Data Journalism Handbook: Towards a Critical Data Practice*, 2021:173.
- [79][80]列夫·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M]. 车琳,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269;271-272.
- [82]Parasie, S., Dagiral, E. Data-driven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good: "Computer-assisted-reporters" and "programmer-journalists" in Chicago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3,15(6): 853-871.
- [84]Ferrer-Conill, R., Tandoc Jr, E. C. The audience-oriented editor: Making sense of the audience in the newsroom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8,6(4):436-453.
- [85]Westlund, O. Mobile news: A review and model of journalism in an age of mobile media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3,1(1):6-26.
- [86]De la Pe?a, N. Immersive journalism: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for the first-person experience of news [J]. *Presence*, 2010,19(4): 291-301.
- [87]Constine, J. Virtual reality, the empathy machine [EB/OL]. (2015-02-02) [2021-05-30]. <http://techcrunch.com/2015/02/01/what-it-feels-like/>.
- [88]常江, 田浩. 介入与建设: "情感转向"与数字新闻话语革新[J]. *中国出版*, 2021(10).
- [89]陆晔, 赖楚谣. 创造新公共社区: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情感维度[J]. *中国出版*, 2021(10).

## Creating Virtual Navigable Space and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Visualization as the Core Storytelling Mode for Digital News in China and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LI Mengying, LU Ye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s in digital journalism innovation is regarding the shifting role of visualization in news stories, from being supportive to texts to at the core of storytelling.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techno-cultural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such transformations took pla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incorporation of visualization in news stories in China, identifying nine types of data visualization in digital journalistic practices and highlighting how visualization as the core storytelling mode in news appeals to emotion through involving the acts of screen scrolling and creating multi-sensory immersive experienc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the feature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virtual navigable space' generated by data visualization news.

**Keywords:** visualization; digital journalism; news storytelling; virtual navigable space

**Authors:** Li Mengy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Lu Ye,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 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业共识以何达成？<sup>1)</sup>

——基于《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19) 的考察

朱春阳 钱威丞

**摘要** 媒介融合时代，不同媒介形态的融合带来媒体行业内部的碰撞与冲突，而社会整体也由于互联网的作用而使得分化的阶层共处同一信息平台 and 系统。媒体行业面临内部整合与整合社会的双向挑战，消除内部分歧，弥合社会分歧，成为媒体行业的时代责任。在这一时代坐标上，《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被寄予了厚望。2019 版《准则》立足现代传播体系下新型主流媒体从业者的时代使命，以塑造共识、推进专业共同体为目标，回应了时代问题。

**关键词** 新闻业；道德准则；共识；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朱春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钱威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 一、引子：寻找融合时代新闻业伦理的新价值

如果要寻找过去 20 年引发中国乃至全球变革的最大变量，非互联网莫属了。“互联网+”的结果是消除了区域与行业的壁垒，使得原本隔离的行业与组织忽然共存于同一个新闻信息流动的场域，面对面的短兵相接在所难免，但这是便利沟通、寻求共识、共谋发展的良机，还是直接碰撞、冲突加剧的遭遇战？这就要看各自的选择了。从社会群体的关系来看，媒介融合表面上看是传播技术手段的聚合，实则是背后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的碰撞。以 1998 年为分水岭，中国由短缺经济正式转向过剩经济，社会分层逐步细化，各阶层特征也日益强化、突出。但互联网强行把不同社会群体装进一个瓶子里，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群体共享同一个信息流通体系的时刻，也是互相镜鉴和惊诧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新闻传播场景中，作为专业的机构传播者，尤其是主流媒体工作者，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才能维护社会关系的良性运行，并以独特的价值为所在的行业与个人赢得社会尊重？这一角色又是如何才能得以达成呢？从既有研究来看，职业已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中，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每个个体都必须进入职业生活，而个体在职业中所受到的职业规范的约束和规训，构成个体社会化的主要机制。在功能上，各种职业组织构成“真实的社会群体”(real social grouping)。在此基础上，作为职业组织所应遵守的道德要求和行动规范，职业伦理既是对个体的道德教化，也是职业组织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承担团结功能的依据。<sup>[1]</sup>按照涂尔干的观点，职业道德越发达，它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sup>[2]</sup>以此

1) 基金项目：复旦大学上海新媒体中心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321)。

来关照中国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作为个体在职业中所受到的职业规范程度如何，决定着个体社会化的成效如何，而作为中国新闻传播业“真实的社会群体”的行业组织——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记协），所描画的职业道德规范越“逼真”，也就越能够引导新闻业从业者有效地实现自身的社会化，成为联结行业内部与行业外部社会关系的理性建设力量。本文拟以此作为逻辑起点来探讨中国记协2019年发布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伦理准则》（后文以《准则》来简称）在媒介融合时代的创新意义与时代价值。

## 二、《准则》：中国新闻业共识演进的标识文本

职业伦理是从业者对他从事的工作和服务的对象所承担的责任，维系着一个行业的道德尊严。新闻工作作为一项职业（occupation），主要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和传播，新闻伦理、职业道德与规范是新闻从业者应该明了的职业知识。<sup>[3]</sup>大众传播职业道德是大众传播工作者和媒介机构自身，遵循体现普遍性的社会公德（工作观）和体现特殊性的专业标准（专业规范），对职业行为进行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sup>[4]</sup>从这一意义上说，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是一种新闻自律的机制，一种不同于政治、经济、法律控制的非制度性、非强制性的内化规范。规范的内容展现新闻业所认同的价值和原则，以此增进每个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良知，同时也成为社会舆论监督媒体从业人员职业行为的标准。1981年，中宣部新闻局和中央新闻单位共同制定并颁布了《记者守则（试行草案）》；1987年，中国记协公布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草案）》；1991年1月，中国记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颁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该《准则》自1991年颁布以来，“为适应新形势新变化”，1994年、1997年、2009年、2019年经过四次修订，形成五个《准则》版本。其中，2019年新修订的《准则》共7条31款，相比2009年版的7条28款，内容更加丰富细化，突出指导性、强调实践性、体现时代性。职业组织对个体的职业伦理要求，蕴含着个体社会化的功能指向，它既充分容

纳了职业共同体的集体意志，又在一定程度上注入国家意志以限制职业恣意行为，形成一种将个体、社会和国家联结起来的机制。<sup>[5]</sup>相关研究认为，五版《准则》的修订与近30年中国新闻业的变迁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系统结构，二者具有同构、同理的关系，由社会规制、媒介生态和受众需求三个影响因素共同构建了对职业道德和新闻业“同框”阐释的坐标。<sup>[6]</sup>例如，1991版《准则》开宗明义地指明了中国新闻业的地位和新闻从业者的角色——“中国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行业政治定位和宣传角色定位一直沿袭至今，贯彻了中国新闻业作为意识形态核心部分的政治属性，也是中国新闻业区别于其他国家新闻业的核心意识形态标志。2019年新修订的《准则》进一步将这一属性具体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做政治坚定、引领时代、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这是中国新闻从业者处理职业道德与政治关系的基本框架，也是新闻从业者职业行动合法性来源的核心资源保障。

职业伦理作为现代社会有机团结的道德资源，被认为是独立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之外的第三种力量。<sup>[7]</sup>因此，《准则》在整合职业共识方面被寄予了厚望。新修订的《准则》于2019年12月15日发布，距上次修订已有十年，而这个十年也是中国新闻业变动最剧烈的十年。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目标框架来看，新型主流媒体的核心功能是对话沟通能力的建设，即通过对话沟通，消除误解、弥合分歧，推动社会在更高程度上形成共识，从而降低执政党执政蓝图实现过程中的摩擦力，提高社会发展进步的效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新闻业肩负社会沟通与共识达成的时代使命时，首当其冲的是要率先在行业内部达成有效的共识。从这一点来看，《准则》历经多次修订，形成五个版本，其实都是试图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聚合行业内部的共识，尤其是行业内部的共识。中国记协发布《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至

2019年底,报纸从业人员总人数为16.2万人,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有99.44万人,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从业人员不到1.5万,合计超过117万人;其中,有23万余名记者持有有效的新闻记者证。持证记者中,本科学历从业者有近17万,占72.74%,硕士及以上学历有2.3万人,占比9.84%,另有16.01%从业者为专科学历;从媒体分布看,报纸81,988人,期刊6,365人,通讯社2,798人,电台、电视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140,150人,新闻网站1,529人。从媒介融合的角度来看,上述不同媒介形态存在不同的行业规范和文化传统,当融合成为主导性趋势后,不同背景的新闻人聚合在同一个平台,需要有明确的职业规范来凝聚共识,形成共同体意识,促进融合的顺利进行。

### 三、共同体与流动性:当代新闻业伦理面临的深层冲突

社会学家鲍曼曾经形象描绘了共同体对于一个专业的重要性: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相互依赖……它就像是一个屋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sup>[8]</sup>而按照滕尼斯的观点,“共同体也是一种集体身份,它是一种对‘我们’是什么人的定义”,<sup>[9]</sup>一种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应该作为一种“默认的一致”(consensus),成为共同体的意志。<sup>[10]</sup>如何才能有效形成一个专业的共同体呢?杜威认为:“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志趣相投。”<sup>[11]</sup>不过,就当代社会而言,共同体的达成正面临新的挑战。鲍曼也使用“流动的现代性”概括了当代社会关系结构的新特征,即维持人们正常生活秩序的各种规范、规则、惯例等互动模式不断地“在流动”<sup>[12]</sup>。处在这一新型社会关系结构中,既有的规则与标准都正快速液化,不再存有稳固的单一权威;结构性失业及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使工作渐趋不稳定,引发工作者的焦虑与不安。<sup>[13]</sup>“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的到来

改变了人类的状况,自我认同的不稳定性成为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基于职业组织在社会团结中的功能认知,职业共同体的建设被认为是目前整合处于危机中的社会最好的路径。<sup>[14]</sup>因此,在这样的冲突当中,作为职业共识而存在的《准则》的价值更加弥足珍贵,《准则》的不断修订,也是适应流动性社会的职业新共识的不断达成与自我修正;同时,道德共同体作为精神共同体的一个维度,扮演着重要的职业角色整合功能,作为职业道德共识达成的标志物,新闻从业者需要《准则》给自己提供类似“壁炉”“屋顶”的温暖庇护。当然,这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或许正如鲍曼所设想的,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sup>[15]</sup>

### 四、新《准则》:推动融合时代新闻业共识达成的新尝试

2019版的新《准则》是如何回应上述媒介融合时代的行业共识与共同体的达成呢?从文本来看,新《准则》提供了一个新闻业共同体达成的中国式伦理方案,这一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依然坚持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在“信息茧房效应”的作用下,新传播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并非是让人们离真相更近,而是成就了一个“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业把真相作为职业安身立命的所在,为共识达成提供了可能性的基础,具有进步意义。2.以“人民”为中心构建职业信念。马克思说过:“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萎靡不振。”就中国语境而言,“勿忘人民”据说是穆青一生中写的最多、最钟爱的四个字。这四个字,是穆青一生新闻风骨的真实写照,也是党的新闻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具象的表达。这一行业典范的精神财富在行业道德准则中得到了有效的传承,会对行业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在新《准则》全文七条准则中,23次出现“人民”二字,比十年前的准则增加了10次;同时,增加了“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的表述。3.打造网

上网下同心圆。媒介融合时代,如何弥合分歧、促进共识达成?《准则》第五条第一款新增“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第二款“强化互联网思维,顺应全媒体发展要求……”;第三条第五款新增“坚持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把尺子、一条底线’”的内容。这是过去十年中国新闻业意识形态层面探索得到的最为核心的对话经验,也是当代中国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共同前进的一个典范。如果结合“1.25”讲话关于“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阐释,可以看到这是中央高层对新传播环境下新闻职业的全新要求,也是对之前长期困扰新闻从业者的行业问题的明确回应。这一准则对于新闻行业内部共识与外部社会共识的达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2015年12月正式成立的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是过去十年中涉及从业者道德准则裁决的一个重要机构。该机构主要是引导督促新闻机构及新闻从业人员遵守法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恪守职业道德。自从成立以来,该机构接受举报投诉、开展新闻评议、发出倡议引领、加强日常监测,对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治理突出问题、推动新闻事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看作是《准则》落地行业发挥作用的直接表现。这

对于提高新《准则》的可操作性带来了新契机。

### 参考文献

- [1][5]转引自:秦小建,朱俊亭.作为宪法整合机制的职业伦理[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2](法)爱弥尔·涂尔干.职业道德与公民道德[M].渠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
- [3]陈力丹,王辰瑶,季为民.艰难的新闻自律——我国新闻职业规范的田野观察/深度访谈/理论分析[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序言)2.
- [4]展江.媒介专业操守:能够建立理论框架吗?——基于伦理与道德分殊的一种尝试[J].南京社会科学,2010(1).
- [6]孙利军,高金萍.道德规约与行业变迁的同构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修订逻辑考察[J].现代传播,2021(3).
- [7]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0:3.
- [8](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
- [9][10](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85;71.
- [11](美)杜威.民主主义和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5.
- [12]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社会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13]华婉伶,臧国仁.液态新闻:新一代记者与当前媒介境况——以 Zygmunt Bauman“液态现代性”概念为理论基础[J].传播研究与实践(台湾),2011(1).
- [14]李强.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J].学术界,2006(3).
- [15](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

## How to Reach the Consensus in Journalism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Code of Ethics for Chinese Journalists (2019)

Zhu Chunyang, Qian Weicheng

**Abstract:**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the convergence of different media forms has brought about collisions and conflicts within the media industry, while the society as a whole has made the divided classes coexist on the same ICTs platform and system due to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The media industry is undertaking the two-way function of intern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eliminating internal differences and resolving social differences have becom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edia industry.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he Professional Code of Ethics for Chinese Journalists has been placed high hopes. Based on the mission of the new mainstream media practitioners under the modern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2019 version of the code offers answers to the issue of the era with the goal of shaping consensus and promoting a profess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Journalism; Ethics routine; Consensus; Community

**Authors:** Zhu Chunyang,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Fudan University; Qian Weicheng,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Fudan University

# 电视时间：1980–1990 年代电视流的驯化与时空秩序<sup>1)</sup>

方惠

**摘要** 本文以 1980–1990 年代的央视一套的电视流为研究对象，从“双重接合”与“驯化”的理论概念切入，考察中国的电视时间是如何开发并被嵌入日常生活的。研究发现，电视流的时间分配引导观众逐渐形成一套符合现代作息的生活节奏，而电视节目内容也将改革浪潮中的中国观众纳入到更为广泛的全球视野中，社会成员得以共享同一套感觉结构。当时间和空间因电视流而重组，一种与世界同步、全球视野、真实而立体的现代秩序也因而建立。

**关键词** 电视流；驯化；日常生活；双重接合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方惠，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体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暨南大学）讲师，广东广州 510632

如何评估电视的影响，一直是媒介研究的核心议题。对于中国而言，电视作为 1980–1990 年代最为重要的文化和政治现象之一，嵌入了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之中。如今电视抢占客厅的年代正在远去，新媒体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瓦解了电视观看的线性序列，使得观看体验变得非嵌入化（disembedding），观众不再被迫迁就一套固定的节目表，拥有了在任何时间与地点收看、下载和保存节目的自由。但是这种媒介技术的文化意义却很少得到认真审视。固定的节目播出时间意味着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它如何改变了电视观众的经验结构？理清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电视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以及新媒体是否能真正替代电视都有意义。

经典效果研究中对于电视影响的评估更关注显著现象与典型事件，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技术不显眼的无处不在”<sup>[1]</sup>。日常生活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则可以弥补“热点时刻”（hot moment）研究所造成的某种遮蔽。它要求将媒介技术与现代或后现代生活语境中的时空关系相勾连，处理过去与现在、公共与私人等关系的边界。本文以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的“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与“驯化”（domestication）概念为理论视角，考察 1980–1990 年代的中国电视是如何嵌入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最终形成观众“经验的一般性结构”的。通过日常生活视角挖掘媒介技术的文化意涵，进而提供一条思考电视、乃至其他媒介影响的路径。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949–1966）”（18ZDA314）。

## 一、电视技术的“双重接合”与“驯化”

西尔弗斯通从政治意义上将电视视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核心机制。电视得以进入家庭并占据一席之地源于“双重接合”效应：一方面，电视作为兼具审美与功能特性的物体被购买、放置于家庭的公共和私人场所中，以供集体或个人使用，它象征着家庭对于这种国内外传播网络的占用；另一方面，电视作为一种媒介，通过节目编排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公私领域的中介化，将家庭成员带入一个共享意义的公共领域中，同时也为私人化的家庭生活提供原料。<sup>[2]</sup>这一过程始于生产端，通过市场销售和广告得以延续，最终在消费中完成。消费者的能动参与，即驯化，既体现在通过掌控电视机在家庭中空间位置的摆放，也包含对电视节目内容的消费，将自然变成文化，使得电视合理存在且安全可靠。电视为观众提供了可预知的惯例，形塑了一个有秩序的意义世界，从而生产和维系家庭生活。

“双重接合”和“驯化”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考察媒介技术之文化内涵的视角。它转向日常生活中与媒介相关的一系列实践，突出了人与科技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物体、商品、意义之间的多重结构以及其中因情境而异的“必要张力”。在此之后的在大多数驯化研究中，家庭被作为分析的单元，在电视—电视流—家庭成员之间的协商与互动被摆在关键位置。<sup>[3]</sup>

在此过程中，“电视流”成为观众驯化电视科技、试图掌握主动权的重要方式。1974年，威廉斯引入“电视流”（flow）的概念取代静态的“分布”（distribution），强调电视节目的动态面向。他认为，这些有着固定播出时间的电视节目，并非时序上的随机组合，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节目拼凑，而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一方面电视频道费尽心机设计节目表以期留住观众；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文化价值与“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给予节目流程一种特定的一致性。<sup>[4]</sup>这种结构和关系的视角，让电视流既迎合电视台的组织需要，也成为观众唾手可得的一般生活经验。<sup>[5]</sup>

抽象的电视流往往附着于具体的电视节目时间表，后者顾名思义，即每周7天固定的节目安

排。“节目表的结构需要让观众熟悉，然后才能在熟悉的时间收看固定的节目。”<sup>[6]</sup>透过对特定电视节目长程、中程、近接三个层次的细致解剖，威廉斯试图说明看似有形的节目表背后无形的节目安排。电视流作为一种潜在的文本，从节目表上看来是电视频道为观众提供了一系列选择，而实质上则是对电视内容更精密的控制方式。通过电视流将迥然不同的节目加以编排整合，形成了“看电视”——这一独特的文化经验。<sup>[7]</sup>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98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流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从杂乱到常态的过程，其中尤以成立最早、覆盖范围最广的中央电视台最具代表性。它与中国社会的时代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电视的整体格局差不多在这一时期形成，其稳定形态也在1990年代得到了延续。<sup>[8]</sup>本文主要关注两个层面的内容：1.中国的电视流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如何发展与演变的；2.观众是如何将电视时间嵌入到日常生活之中的。

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爬梳央视的历年电视节目时间表得出，195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广播节目报》（1967年停刊），用于预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节目，1978年复刊更名为《广播电视节目报》后，增加介绍中央电视台的一周播出节目。1981年中央电视台出版《电视周报》（1986年更名为《中国电视报》），脱胎成为我国第一个专门宣传电视节目的报纸。<sup>[9]</sup>其创刊号宣称，人类已经进入一个电视化的时代，“电视是最近代化的宣传工具、教育工具、文化娱乐工具”<sup>[10]</sup>。垄断电视节目预告资源的《中国电视报》曾经在高峰时期发行量达到单期560万份。处于报纸和电视交汇点的电视节目报看起来像是一个奇特的产物。从声画构成的动态影像到由铅字拼凑的静态时间表，报纸营造的是封闭且固定的时空确定感和安全感。对于观众而言，如果没有电视节目时间表，电视就是一个黑匣子，什么时候播放、播放什么内容无从得知。一方面，电视节目时间表起着指南的作用，让观众得以“从中选择自己有兴趣的、有用的内容，可以把被动地接受转为主

动或半主动地欣赏与学习”<sup>[11]</sup>。另一方面,报纸节目时间表总是先于电视的播出进度,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节目则成为报纸的附属,观众已经预知电视节目将要播出的内容,电视台就必须按照节目时间表中规定的次序播出。

第二个问题则需要借助散落的碎片化史料。本文搜集了《当代电视》《中国电视报》等大量回忆与记述,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罗尔(James Lull)在1985年、1989年两次对于电视在中国家庭的影响的考察。<sup>[12]</sup>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记录下了近100个家庭观看电视的场景和言说,为后人回望80年代的家庭日常生活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史料。通过电视和观众的互动,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考察电视这一媒介技术的意义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中,电视是如何嵌入日常生活,最终形成观众“经验的一般性结构”<sup>[13]</sup>。

### 三、电视流:电视技术的文化形式

1958年,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形态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电视机产量的大幅提升<sup>[14]</sup>,至1976年,中国的电视台已发展到37座,电视转播台123座<sup>[15]</sup>,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达60万台,电视观众已增至数百万人<sup>[16]</sup>。电视节目编排的意识也在这一时间段逐渐萌芽。但总体而言,1990年代以前的电视资源稀缺,电视观众“尚无意识也不具备能力影响电视台的决策和意志”,“电视台的节目编排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观众的内容需要”。<sup>[17]</sup>1991年之后伴随着市场化进程推进的还有电视产业化的规模积累,1992年,全国电视覆盖率在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下由1976年的36%上升到80%,电视频道套数持续增长,中央电视台三个频道节目面向全国播出,四级办的超级电视网络在90年代初已然成形。<sup>[18]</sup>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过程迫使电视台增强编排意识和营销策略以吸引观众。国外的既有经验成为国内电视台效仿的对象。吊床式节目编排、捆绑战略、支撑战略、搭桥战略、反向节目安排等编排形式已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得到广泛运用,对于电视节目的精心编排也被认为“实现了由电

视台主导向观众主导的转变”<sup>[19]</sup>。

#### (一) 开发电视时间

1978年5月1日,为适应对外宣传的需要,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由于技术限制和内容匮乏,彼时全天的电视时间只有五个小时。1981年-1983年,央视的每日节目始于17:30,结束于22:30。1984年,每天第一档节目提前到10:15,但依然算不上“连续性的流通”,13:00-13:30、16:10-17:05两个时间段没有节目。直到1986年,央视的节目改为8:30-23:20左右不间断播出,才算是形成了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电视流,初步建构起了中国电视制度下的时间表和电视的规则。

但制度时间要发挥作用,还必须考虑到以文化为基础的时间结构(日、周、季)。不同当下电视以“日”为循环单位的结构化编排方式,1980年代初的电视流则显得杂乱无章,除了《新闻联播》作为权威的新闻发布节目在每日固定时间19:00播出之外,每个时间点上播出的节目都各不相同,罗尔就认为这种不规律的电视流很难让观众养成常规化的观看习惯<sup>[20]</sup>。不同于工作日的节目,80年代周六与周日节目内容更加丰富,节目时间也更长,“周末”观念被明确地表达着。此种方式清晰定义了工作和休闲交替的社会节奏,“星期制”这种舶来的时间在电视流中得以延续。而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高效与精确成为社会崇尚的价值观念,工作与休闲的循环周期变成了日复一日的白天与晚间,即上班时间与下班时间,以往只有在周末播放的综艺娱乐节目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工作日晚间。

在电视时间的开发中,最具典型、记述也最为详尽的莫过于《东方时空》。直到90年代初,央视一套的每日节目均始于早上8:30。7点被认为是听广播的时间,当时的主流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名牌栏目《新闻与报纸摘要》。<sup>[21]</sup>这也成为了电视改革的契机。1993年,在提请新的早间节目方案时,孙玉胜等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机的习惯”。这一动议直接来自于西方国家的刺激:“CNN24小时播出,美国ABC、CBS的早间直播节目都是从早上6:00开始,……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电视台居然没

有早间节目。”<sup>[23]</sup>西方的电视节目操作手法被视为典范，向 BBC、CNN 等象征着专业和权威的国际媒体看齐，这种心态至今还可以从中国媒体从业者身上看到。2001 年《东方时空》的时长从 2000 年的两个半小时缩为 40 分钟时，时任总制片人时间认为是对标准的违背，“缩回去意味着你拒绝国际化，你拒绝按照新闻的规律办事情”<sup>[24]</sup>。

在后来者的叙述中，1993 年 5 月 1 日《东方时空》的开播被视为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开端，它所携带的光环不仅是制片人制度、用人编制、新闻语态等方面的大胆创新，更是被视为中国电视黄金时代的序曲，象征着“锐气、智慧、创新、自由、平等、前卫的精神气质”<sup>[24]</sup>。继《东方时空》之后，早间新闻杂志的风潮很快席扫全国，凤凰卫视《凤凰早班车》（1998）、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2006）等节目陆续开播，已有的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1990）、广州电视台《城市话题》（1992）等社会时政类节目也纷纷转变为电视时事杂志。这种改革的浪潮中包含了对生活方式的改造和时代精神的引领，正如时任 NBC 总裁韦佛所言：“晨间节目不但要求人们刮胡子、吃饭、整装、准时上班，更要使得人们愉快、智慧、充满毅力。”<sup>[25]</sup>

## （二）扩充节目形态

当然，如威廉斯所说，如果要看清楚电视流的真正性质，就必须仔细地检视节目的实质内容说的是什么，放的是什么。<sup>[26]</sup>作为一种高度类型化的媒介，电视中的每种符码和模式都表征着一个时代的信念和价值观。<sup>[27]</sup>在 1980 年代的“文化热”中，电视成为了主要的学习阵地。1979 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立，其课程由央视承担录制和播放工作，面向社会播出，成为 80 年代教育节目的一大特点。<sup>[28]</sup>教育节目数量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达到巅峰，起初是《脉冲电路》《数学基础讲座》《计算机科学技术函授讲座》《经济统计学》等严肃的理论教学节目，随后渐渐出现《再就业之友》《美容化妆知识》《电脑实用 VCD 讲座》等实用主义的科普与日常知识节目。因多年教育停滞而导致的知识资源极度匮乏因这些节目而有所缓解，电大创办者洪生民认为电教节目在一定程度上挽

救了当时的教育<sup>[29]</sup>。而随着社会化教育的逐渐普及，电视的教育功能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逐渐退场，2012 年，《开讲啦》在央视播出，号称“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邀请青年榜样发表演讲，并与现场高校学生进行互动，这种形式的媒介化程度更高，与严肃授课的电大课程截然不同。

贯穿于严肃的学习节目之间的，是弥漫着全球视野的外语节目。伴随着改革开放，成立于 1979 年的央视译制组从美国、日本等国家引进并译制了《居里夫人》《大卫·科波菲尔》《娜拉》等大量国外故事片、纪录片和其他类型的影视剧。外语 / 外文节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固定播出的《法语入门》《学日语》《基础德语》等外语教学栏目，其中最多的是《电视英语》等英语教学节目，其中时长 30 分钟的《基础英语：跟我学》在五年内不断重播，成为当时电视台播出率最高的节目；此外还有介绍国外文化艺术的《外国文艺》，介绍外国民俗风情的小短片《世界各地》等。如今前一种节目类型已经从电视中销声匿迹，只有《国际艺苑》等少量文艺节目仍在荧幕中活跃。

在央视书写的发展史话语中，教育节目和外语节目是出使英国、日本等国借鉴而来的产物，力图配合对内生产、对外交流的需要，充当着“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功能。<sup>[30]</sup>其社会影响力的产生也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支持：广电部和劳动部号召所属部门职工收看电视讲座、国家教委投入设备和人员促使电视课程直接面向社会。相比之下，综艺娱乐类节目则始终不占主流，仅有录播的联欢晚会、颁奖晚会、棋牌技巧节目和传统的曲艺杂技。现代意义上的综艺节目伴随着 90 年代以后消费主义的兴起而得以发展，1990 年《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的先后开播算得上是标志，到如今发展为每周约有 20 档综艺节目，包括选秀类、音乐类、益智类等。

1996 年开始，电视的主要节目形态经历了较大整合，节目数量大幅减少，节目时长有所增加。节目形态从短小繁多整合为较长时段的模块，其中新闻节目的变化最为明显。与教育、外语节目一样，新闻节目的演变与改革时代的社会进程息息相关。它们不仅在数量上受技术逻辑的支

配——需要快速的流通和广泛的传播，在内容上也意味着要将社会现实纳入中国情境的视角之下——改革开放的市场化环境，更需要足够充分且自由流通的信息加以保障。<sup>[31]</sup>1982年，电视新闻被要求作为电视宣传改革的突破口，通过提升新闻节目比重、增加信息量以打造舆论阵地。<sup>[32]</sup>1992-1993年，中宣部再次要求媒体要增大信息量，增加新闻播出的次数，直接催生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其他新闻节目数量也于此后飙升，遥遥领先与其他节目类型，至1999年时，央视每日新闻节目已增至14个。作为现代性的典型文化形式，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让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成为可能。

#### 四、驯化电视流：日常生活中的时空秩序

##### （一）驯化时间：生活节奏的确立

在娱乐生活极度匮乏的80年代，电视的扩张毫无疑问带来了直接且惊奇的影响。在探讨媒介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关系时，理论家们常常用到“填充”（fill）的字眼<sup>[33]</sup>，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电视嵌入生活的过程。80年代以来，电视流与社会时间相互交融，形成被人们内化了的时间感，甚至成为社会时间的参考。有了电视，人们在晚饭之后很少出门，赌博、睡觉、读小说、听收音机的时间都被压缩用来看电视；对于一些办公室职员而言，为了不影响看电视，看报纸的时间也因而调整到上班期间。<sup>[34]</sup>邓友梅曾抱怨：“电视的出现，大大的改变了人们的时间分配。别的不说，看电视的时间多了，看小说的时间就少了，这对写小说找饭辙的人来说是个大威胁。”<sup>[35]</sup>如果电视节目不按时开始、临时更改，或是增加节目都会打乱观众的整个生活安排，因此常常惹得观众抱怨：“我们辛苦工作、赶公交车，挤来挤去，无非就是为了赶上想看的节目，结果呢，就只放广告和其他没用的节目。”<sup>[36]</sup>

观众对于电视流的捕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视节目表。《中国电视报》出版后，直接垄断了电视节目的预告资源。1987年，在《当代电视》杂志的“电视和我们”栏目中，萧乾这样写道：

拿到节目报，我就红蓝铅笔在手，选起一周想看的节目来。我把想看的都画上三角，特别想收看的画上双三角，有时候三个三角套起来——可惜这样的情况太少了。然后我还得看时间分配怎么样。我喜欢电视剧，可有时候接连几天都没有，碰上一天三个台都有，那就得选择了。选完，我在每日节目前，编出收看次序。例如，先北京，后中央二台，最后拨回中央一台。这样，晚上收看时就省事多了。<sup>[37]</sup>

在电视时代，类似的体验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语境中皆有共鸣。麦克卢汉传记作者马尔尚就曾记述：“每个星期，他（麦克卢汉）都事先在《电视周报》上划出他想看的节目，然后就死守这个计划。”<sup>[38]</sup>香港学者李立峯在一篇博文中也回忆道：

小时候看电视，无线早上10点左右播老人家喜欢的粤语长片，下午2时前后是妇女新姿，4点半是430穿梭机和卡通片，6点半新闻，然后进入以剧集为重心的黄金时间，9点半欢乐今宵。主持在11点节目完结时会唱晚安歌。这不只是电视节目表，这是一个特定时空里的社会生活节奏。<sup>[39]</sup>

同时，观众也积极参与到驯化电视时间的实践中。1980年代，《广播电视杂志》《大众电视》《观众来信汇编》等电视主题的刊物纷纷创办，和电视节目表的性质类似，它们为观众提供了大量电视节目内容和电视技术知识的介绍。更重要的是，它们创造了观众和电视台互动的机会。不乏观众写信批评央视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不定、电视结束时间很晚，而影响到正常生活<sup>[40]</sup>，呼吁“电视台编排节目应为基层农民想一想”，有选择地转播体育节目，增加文艺节目的播出<sup>[41]</sup>。有观众希望“在17点至18点的时间，能有适合中学生收看的节目，帮助他们了解社会，了解未来，了解自己，培养出自带真正的跨世纪的青年来”<sup>[42]</sup>。在数次电视内部会议中，观众的建议与反馈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987年，中央电视台联合各省市电视台组织了第一次全国电视观众调查，抽取了两万多样本调查了观众的基本情况、行为反映和心理感受，采集了大量完整数据资料。<sup>[43]</sup>很多观众的反馈意见被电视台所接纳，观众共同参与到对于

电视流的缔造之中。

电视对于生活节奏的定义在于，它逐渐形成了一种例行化的观看，以一套抽象的系统让生活得以被组织化。正是这种润物无形的日常习惯，给规律地循环着的“每日生活”赋予了意义。而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伴随着电视没落的，是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与生活景观。正如一位网友书写到的：“许多人的童年回忆里，星期二的下午是很难熬的。荧屏里是琢磨不透的静止彩色画面，荧屏里是琢磨不透的精致彩色画面，伴着涓涓流淌而又令人昏昏欲睡的轻音乐。”<sup>[44]</sup>

## （二）驯化空间：全球视野的形成

“看电视”的生活经验经历了从公共—私人的转变过程，与之相伴随着的是家庭生活和私人空间在80年代的崛起。罗尔根据空间将中国观众对于电视的接受划分为四个阶段：（1）在工作单位和公共场合里的常规观看；（2）有负担能力的家庭购买，与邻里一起观看；（3）城市家庭渐次能够在自家看上电视；（4）从黑白电视机过渡到彩色电视机。<sup>[45]</sup>越来越多的家庭空间设计开始有内外之别，客厅即是这种连接公共场合和私人生活之间的转换区域，兼具排斥和接受的功能。而客厅的空间形态、家具的类型与摆放方式、人们在客厅中的活动形态，一直在受着电视机的影响。<sup>[46]</sup>一位父亲记述了家庭观看电视的经历，从最早在邻居家观看时对于“能出图像的方盒子”的惊奇，到自家购买的象征着“现代化顶峰”的20英寸大彩电，儿子也从“兴奋不已，围着电视机转来转去”，到淡定地报告新彩电的工作情况。<sup>[47]</sup>通过能动的消费和空间的布局，人们将电视机的物质客体现驯化成为最自然的一部分，镶嵌在家庭生活中。

在八十年代相对自由而松动的改革环境中，电视引导观众从日常单调的世俗惯例中抽身出来，进入到一个由节目表与节目组成的神圣惯例中。<sup>[48]</sup>而这些节目或引领、或表征的各种社会思潮，在客观上却形成了莫利（David Morley）称为“他处的驯化”（domestication of elsewhere）的心理效应，大量外文译制片、影视剧和外语教学节目将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带到中国家庭面前，而不需要观众身临其境。<sup>[49]</sup>但同时这种空间感却又是充满张力

的，一方面，它是“八十年代很多人有个从废墟上出来四处张望寻找的过程，有意或无意地：向西方找，再加上寻根——断掉的那个民族传统的根”<sup>[50]</sup>。它是一个需要不断调试的心理过程，有观众即提出意见：“在每星期六和星期日收视率最高的时间里，大多放些外国电视连续剧，这有点刺伤中国观众的爱国心。”<sup>[51]</sup>

全球视野不仅仅来源于实实在在的节目内容，还有因此而培养起来的“感觉结构”。每天19:00的《新闻联播》堪称中国最具标志性的媒介时间。“只有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的人，才可能相信自己的确置身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sup>[52]</sup>在这方面，电视的功能比报纸更为突出，它呈现的是鲜活的动态画面，将以往存在于纸本中的世界带到眼前，冲击着人们对于外界的感知。叶君健曾记述道：“如果晚间七点钟的新闻因事没有看上，我就拨八频道九点四十分的新闻重播，如果这次重播也耽误了，我就拨十五频道十点十分的英文新闻广播。每晚看新闻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刻板规律。”<sup>[53]</sup>凭借符号创造的虚拟时空，新闻让人产生对于真实的体验感，将电视和真实世界连接起来。<sup>[54]</sup>

## 五、结论：电视时间与现代性

在现代性发展的制度性维度之中，作为符号权力的传播媒介被视为不可忽视的一环，它们既是嵌入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体现，也是这种趋势的助力。重要的是，它们以其抽象且专业的系统重组了时空。同时，每一种传播媒介在社会空间中都创造了新的行为和互动方式，促成了与他人和自我之间新型的社会关系。<sup>[55]</sup>本文从日常生活的视角，考察了电视流是如何被驯化并被嵌入日常生活，影响中国观众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了解世界的能力的。

在电视节目编排意识从无到有的过程中，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电视实践成为重要的参照对象。电视节目的时间分配引导观众逐渐形成一套符合现代作息的生活节奏，尤其是早间节目的崛起，更是包含了对于个人和家庭生活方式的改造。中国的电视节目内容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西

方——引进国外节目、进行本土化改造。通过对电视节目结构和内容的安排与调整,教育、外语、新闻等成为1980-1990年代电视主要的节目形态,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观众纳入到更为广泛的全球视野中;而90年代后新闻和综艺节目异军突起,其对现实生活的定调和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但整个现代时空秩序的确立也是一个观众对于电视的驯化过程。时间上,电视节目表是观众驯化电视流的重要手段,通过节目表,观众可以将何时何地收看电视的主动性转移到自身,并能够重新排列个人化的节目,使之嵌入日常生活中。这意味着变动不居的电视是可以被驾驭的。同时,观众与电视报、电视杂志的互动则进一步构建了符合生活节奏的电视流。空间上,电视在家庭中的出现伴随着私人领域的崛起,客厅这一介于公私之间的空间既是电视放置的场所,也是意义生产的空间,从集体观看到家庭观看,电视在中国是一个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退场过程。通过对教育、外语和新闻等电视节目的消费,观众的感觉结构因而改变,停滞与流动、现实与想象、连接与疏离等现代性的含混面交织出现。当时间和空间因电视流而重组,一种与世界同步、全球视野、真实而立体的现代秩序也因此建立。

## 参考文献

- [1] Bausinger, H. Media, technology and everyday life[J].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984, 6(4): 343-352.
- [2][48] Silverstone, R.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82-83.
- [3] Haddon, L. The contribution of domestication research to In-Home computing and media consumption[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6, 22 (3): 195-203.
- [4] Abercrombie, N. 电视的社会学分析[M]. 陈芸芸, 译. 台北: 韦伯文化, 2000: 15-16.
- [5][26] 雷蒙德·威廉斯. 电视: 科技与文化形式[M]. 冯建三, 译.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1992: 119-120; 145.
- [6] 理查德·佩特森. 合适的家庭收视节目表[M]//安德鲁·古德温, 加里·惠内尔. 电视的真相. 魏礼庆, 王丽丽,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09-210.
- [7] Fiske, J. Television Culture: Popular Pleasure and Politic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7: 99-101.
- [8] 常江.《新闻联播》简史: 中国电视新闻与政治的交互影响(1978-2003)[J]. 国际新闻界, 2014(5): 120-132.
- [9][16][30] 赵化勇. 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58-1997)[M]. 北

- 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 186; 121; 185-193.
- [10] 电视周报. 开头的话[N]. 电视周报, 1981-1-1(1).
- [11] 张肖虎. 电视我见[J]. 当代电视, 1988(5): 5-6.
- [12][20][34][36][45] Lull, J. 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M]. London: Routledge, 1991: 67; 63; 162; 62.
- [13] Silverstone, R. Why Study the Media?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9: 2.
- [14] 新华社. 努力办好广播, 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N]. 人民日报, 1973-08-17(4).
- [15] 新华社. 文化大革命推动我国电视事业蓬勃发展[N]. 人民日报, 1976-06-04(1).
- [17][19] 左瀚颖. 受众市场变迁与节目编播调整[M]//王兰柱. 中国电视节目创新与收视: CSM 收视研究文集(第一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51; 59.
- [18] 周翼虎. 中国超级传媒工厂的形成[M]. 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 2011: 231-236.
- [21][24] 张洁, 梁碧波. 点燃理想的日子: 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4; 322.
- [22] 孙玉胜. 十年: 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10-30.
- [23] 张英. “电视改革没走多远”: 专访原《东方时空》工作室首任总制片人时间[J]. 新民周刊, 2014(42): 39-40.
- [25] 转引自楼榕娇. 电视新闻研究[M].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 17.
- [27] 大卫·麦克奎恩. 理解电视: 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M]. 苗棣, 赵长军, 李黎丹,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28]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与变迁(1958-2003)[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78.
- [29] 转引自王润泽. 在服从宣传需要与尊重新闻规律之间——中国当代记者心态史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17(4): 117-136.
- [31] Chang, T., Wang, J. & Chen, C. News as soci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changing world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media[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4, 44(3): 52-69.
- [32] 赵玉明.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374-375.
- [33] 戴维·莫利.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 史安斌,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310.
- [35] 邓友梅. 电视乱弹[J]. 当代电视, 1991(1): 28-29.
- [37] 萧乾. 电视漫议[J]. 当代电视, 1987(4): 4-5.
- [38] 菲利普·马尔尚, 麦克卢汉: 媒介及信使[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111.
- [39] 李立峰. 谈电视节目表: 特定时空的社会生活节奏[EB/OL]. (2016-4-16)[2019-9-15]. <https://www.hk01.com>.
- [40] 中国电视报. 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调整电视播出结束时间[N]. 中国电视报, 1985-5-16(1).
- [41] 邱银生. 电视台编排节目应为农民想一想[J]. 大众电视, 1982(11): 30.
- [42] 中国电视报. 关心·爱护·期望——电视工作座谈会观众发言摘要[N]. 中国电视报, 1993-12-25(10).
- [43] 陈崇山. 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M]//王怡红, 胡翼青. 中国传播学三十年.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278.

- [44]天涯社区.那些年星期二下午的电视机怎么了? [EB/OL]. (2017-5-18) [2019-5-15]. <http://bbs.tianya.cn/post-780-115158-1.shtml>.
- [46]徐敏.电视的兴起——1980年之际中国内地电子媒介与日常生活[J].文艺研究,2014(12):103-115.
- [47]中国电视报.电视:联系父子的纽带[N].中国电视报,1995-7-24(3).
- [49]Morley, D. 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 Contradictory dynamics in the domest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dislocation of domesticity[M]// Berker, T. etc.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 2006: 21-39.
- [50]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85.
- [51]杨仲子.外国人谈中国电视[J].当代电视,1987(1):45.
- [52]童道明.我看电视[J].当代电视,1988(12):16.
- [53]叶君健.我生活的一部分[J].当代电视,1988(1):页码不明.
- [54]Hartley, J. Teleology: Studies in television[M]. London: Routledge,1992: 55.
- [55]Thompson, J. B.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4.

## Television Time: Domesticating television flow and the spatio-temporal order in 1980s-1990s China

Fang Hui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hinese television flow, CCTV sets to be specific, developed and embedded in everyday lif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by taking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double articulation and domestic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ime allocation of television programs led viewers to gradually develop a rhythm of life in line with modern routines, while the content of television programs brought Chinese viewers in the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into a broader global perspective, allowing members of society to share the same set of structure of feeling. As time and space were reorganized by the television flow, a modern spatio-temporal order was established that was synchronized with the world.

**Keywords:** television flow; domestication; daily life; double articulation

**Author:** Fang Hu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 记忆实践：传播学视域下集体记忆研究的路径转向<sup>1)</sup>

潘晓婷 陈莹

**摘要** 在传播学视野下展开的集体记忆研究，早期采用“叙事-话语”的建构主义分析路径，后来又出现了“媒介-技术”的技术分析路径。两种路径存在将集体记忆这一社会事实片面化的状况，未能解释集体记忆与社会层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实际联系和这种联系的发生机制。近年来，在“实践转向”下出现了一条“记忆实践”的研究取径，集体记忆的实践分析在最低限度上就是对人的各种记忆活动作一主客统一的分析。传播学视域下的记忆实践研究可以媒介实践为中心出发点，将互为表里的媒介实践、媒介化和媒介学作为理论基础，为集体记忆研究提供由行动者、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等维度展开的可能路径。这一基于“关系”的研究路径，或可达成对集体记忆各主客观要素的弥合性理解，并在不同的学科层面上进行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对话。

**关键词** 集体记忆；记忆实践；媒介实践；媒介化；媒介学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潘晓婷，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吉林长春 130000；陈莹，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吉林长春 130000

1925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开创性地使用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用来指代每一个“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群体”所拥有的记忆。<sup>[1]</sup>这一创造性的概念，以其跨学科的特征及普遍的阐释力成为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我国的集体记忆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发生在历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并在后来逐渐成为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传播学领域内开展的集体记忆研究，首先以“叙事-话语”的分析路径展开，后来在媒介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媒介-技术”分析路径<sup>[2]</sup>，近来在“实践转向”下又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集体记忆研究路径拓展的内在学术逻辑是怎样的？新近出现的“记忆实践”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研究路径？通达“记忆实践”研究的方法何在？本文对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并重点讨论新近出现的“记忆实践”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以期梳理传播学视域下的这一集体记忆研究新取径，解决当前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落差与裂隙。

## 一、“叙事-话语”分析：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记忆文本

哈布瓦赫最初即阐明了集体记忆“现在中心观”的特征，即“过去是一种社

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记忆的实践：东北老工业基地集体记忆研究”（20YJC860025）；2021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媒体环境下东北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人们对过去的各种记忆和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sup>[3]</sup>传播学者们将“现在中心观”和“语言学转向”相接合,以建构主义为认识论基底,福柯的话语分析为工具,从记忆文本中蕴藏的集体表征和符号权力出发,形成了“叙事-话语”的集体记忆分析路径。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大屠杀记忆、战争记忆、宗教记忆、国族记忆是这一路径下的主要研究对象。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对不同美国社会群体拥有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区分,发现每一代美国人“都会以令其满意的方式重构和表现大屠杀”,重构的原则是“我们对现实的感受而非现实本身”<sup>[4]</sup>;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围绕林肯的历史形象所展开的美国国家记忆研究也展现出了同样的集体记忆特点,即集体记忆的具体内容会随着社会和政治情境的变化而变动不居<sup>[5]</sup>;摩西·齐默尔曼(Moshe Zimmermann)认为以色列通过反复讲述一个民族被迫害的神话,将犹太人塑造成被排斥的“他者”,这种“自我他者化”强化了以色列的国族边界感<sup>[7]</sup>。

国内学者在这一研究路径下展开的集体记忆研究中,周海燕的研究较为有代表性。周海燕采用了福柯的话语分析,一方面对大生产运动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了社会史的梳理,考察与“大生产运动”相关的社会记忆是如何建构而成的;另一方面对《人民日报》上的“南泥湾精神”相关报道进行话语分析,发现“大生产运动”从起因到过程的讲述中,无不经过了权力的筛选、裁剪与建构,“南泥湾精神”成为至今还在不断被调用的政治财富。<sup>[8]</sup>此外,学界还常以代际、职业、趣缘等共同体为集体边界,剖析不同群体的记忆建构。

各类媒介记忆文本和口述记忆文本是“叙事-话语”研究的核心经验材料。在与历史事实和不同群体的记忆内容的比较中,集体记忆的建构性表现得十分明显。记忆叙述的变化、虚构甚至谬误都有着独特的作用,“遗忘和记错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它们“揭示出叙述者如何企图理解过去

并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一种形式”。<sup>[9]</sup>在贺萧的观点中,口述记忆文本中的谬误与善变正是记忆主体的建构实践的最佳体现。其他媒介记忆文本也同样如此——记忆的建构性是在“叙述”中,而不是在“见证”中,被凸显出来。

如此,集体记忆的建构性研究视角呈现出的是一幅多元化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后现代记忆图景。记忆研究的支持者最关心的是记忆的建构者如何以及为什么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构建一个记忆版本,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对过去的再现在历史事实上是否准确和可靠。<sup>[10]</sup>传播学视域下开展的早期集体记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建构研究,这就使得集体记忆研究对“叙事-话语”分析形成了路径依赖。<sup>[11]</sup>

## 二、“媒介-技术”分析:记忆媒介的技术分析

如同其他无形观念一样,集体记忆的存储与传播需要依赖具体的介质传递,没有媒介载体的记忆传递是不存在的。“如果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成后世的文化记忆”,“鲜活的记忆将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sup>[12]</sup>在文本以外,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将目光投向媒介,“媒介-技术”成为研究集体记忆的另一种视角。

“媒介-技术”分析路径主要探讨记忆媒介的技术特征如何影响和形塑了集体记忆的特征。阿莱达·阿斯曼较早注意到记忆与其承载媒介之间的关系——不同载体中的记忆存在特征冲突,并且不同的媒介技术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属性、存储和传播。<sup>[13]</sup>近年来,新媒体正在强势整合印刷、视听等其他传统媒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性元媒介。全新的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体现在集体记忆当中,因此,数字记忆成为集体记忆研究的新对象。在数字记忆的研究领域中,也有对记忆文本的阐释性分析,但其分析目的是为了讨论新媒体技术特征对集体记忆内容的影响。

全球化是国外学者讨论数字记忆时的重要背景<sup>[14]</sup>,数字记忆会导致全球性记忆的异质性还是同质性是这一议题的争论焦点。一些学者认为数字记忆的本质特征是多元化:Reading等认为互联网

用户可以同时管理多个身份，身份的多元性导致统一的宏大国家记忆发生了萎缩<sup>[15]</sup>；Elizabeth Bird认为新媒体的崛起导致了多元记忆的出现，并对传统媒体的叙事形成了“反记忆”<sup>[16]</sup>。与上述多元记忆的结论相反，Barbie Zelizer用“蚕食性记忆（Cannibalizing Memory）”这一概念描述了在数字时代全球新闻快速流动的背景下，地方记忆被转化成同一性符号和意义传播，从而被抹去的技术化特征。<sup>[17]</sup>

国内外的数字记忆研究还常常讨论新媒体的技术特征给集体记忆带来的种种影响。李明认为网络虚拟社区是一种线上强化与交流集体记忆的方式，而作为记忆术的搜索引擎正在成为对集体记忆的宰制<sup>[18]</sup>；胡百精认为互联网为集体记忆的书写和阐释带来了集体记忆的祛魅、族群记忆的认同断裂、社会记忆窄化为社会记录、公共舆论主导、常人社会消费和部落化等一系列挑战<sup>[19]</sup>；王润认为，新媒介为多种记忆话语的交汇与争鸣创造了技术条件，构建出多元话语的记忆阐释社群<sup>[20]</sup>；Anna Reading提出，数字时代的记忆场具有六个总体性动力特征：跨媒体性（Transmediality），传播速度（Velocity），扩散广度（Extensivity），载体形式（Modality），多重价值（Valency）和信息粘度（Viscosity）<sup>[21]</sup>。

总的来说，“媒介－技术”路径主要对记忆媒介和媒介记忆的技术特征进行分析，将集体记忆及其变化视为媒介技术的客观产物，遵循的是明确的技术逻辑导向。

### 三、问题意识与新的转向

以上路径构成了传播学领域中集体记忆研究的两大传统，但这两种路径与集体记忆的经验现象之间的落差逐渐暴露出现有分析框架的不足，集体记忆理论推进后继乏力。

首先，“叙事－话语”分析路径中隐含的记忆主体视角仅展现了集体记忆的一个侧面，即记忆的建构性。这一路径下的集体记忆研究变换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的程序却已经被预见。这类研究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事实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但对于集体记忆这一社会事实来说，它已经无法提供比“相互竞争的”“多元的”

“协商的”更为深入的理论解释了。多元的集体记忆除了可以被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究竟是如何互动的？记忆互动的过程如何？影响记忆互动结果的要素有哪些？以上问题在“叙事－话语”研究传统中被悬置，集体记忆理论的现实意义被削弱。

值得一提的是，有传播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采用传播学经典的“功能－实证”范式去检验媒体在公众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发挥“巨大影响”的理论假设，以此解决媒介记忆的效果问题。<sup>[22]</sup>然而，试图量化集体记忆的方法很可能会减少集体记忆的复杂性，因此，这种方法仅被看作是对深入的定性分析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在实证的层面上，要么无法证明媒介是影响集体记忆的主要因素，要么无法证明长期的宏观维度上的集体记忆效果。与当下的政治问题不同，集体记忆的认识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对过去的认识可能由通过大众媒体以外的其他记忆渠道施加影响，比如学校教育、博物馆陈列和节庆仪式等。当媒体介入记忆性的事件时，公民可能已经对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有了相对不变的固定看法。此外，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能带有感情色彩，并与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基本认同感联系在一起，这让他们早已形成的记忆更加具有韧性。<sup>[23]</sup>正因如此，媒介记忆效果的实证分析并未能解决集体记忆理论与经验之间的鸿沟，研究成果也不多。

其次，两大研究路径的内在逻辑中蕴含着不同的主、客二元认识论基础。“叙事－话语”分析侧重经验阐释，“媒介－技术”分析侧重客体分析。集体记忆在前者中被视为主观主义的建构产物，在后者中被视为媒介技术的物质性产物——在建构主义传统下，集体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记忆的公开表征上，将集体记忆的变迁因素归结为记忆社群的能动性选择和加工；在媒介技术分析传统下，集体记忆的变迁被归结为媒介可供性带来的技术影响。如何将主、客分析弥合在一起，搭建起集体记忆的运动机制，从而更接近集体记忆的动态化本质，是既有研究路径中浮现出的另一问题意识。

针对以上问题，阿龙·康菲诺（Alon Confino）

建议集体记忆结合心态史开展研究,他认为心态同集体记忆类似,两者都应是为体现实践性而非理论化的概念——它们都是人们用来建构历史感的方式——把集体记忆视为社会心态,将提供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观点,从而“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官方灌输和心灵习惯联系起来”。由此,多元的集体记忆之间将不再是隔离的,而是一种社会-文化性的行动模式,并在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视角下被理解。<sup>[24]</sup>

事实上,遵循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这一实践性的研究视角在哈布瓦赫最初的理论解释中并未缺位——不同的记忆以各种社会方式发生联系,其中介就是人们以各种方式结成的团体,科瑟称之为“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sup>[25]</sup>。后来的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延续了这一研究模式,指出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在社会记忆唤起和固化中的独特作用<sup>[26]</sup>;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之场”也呼唤着对集体心态、记忆行为和建构过程的关注,而非仅仅关注记忆的象征或媒介<sup>[27]</sup>。

国内学者的近期研究,也展现出了对这一路径的敏感体察,李红涛和黄顺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纹理研究即是一例,这一研究“并不流于对静态‘文本’和‘符号’的考察”,而是揭示了“创伤叙事的生产和再生产,媒介纪念空间的生成,以及媒介舞台上和记忆之所里的记忆实践”<sup>[28]</sup>;谢卓潇将春晚视为一种记忆实践,考察了媒介记忆被书写、承袭和消费的过程<sup>[29]</sup>;周海燕讨论了新媒体语境下个体记忆是如何与集体记忆进行联结从而实现代际传承的过程<sup>[30]</sup>。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示我们,集体记忆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一次尚未被命名的路径转向。

#### 四、路径之探:记忆如何实践?

实践中的集体记忆不仅仅存在于语言和赋意系统中,也不仅仅是被媒介物质简单支配的存在——产生社会功能的集体记忆,是一个与记忆主体、记忆媒介、社会结构有广泛联系的系统性

存在。对集体记忆经验和现象的重新审视使研究者对原有研究路径提出了疑问,并转向“实践”寻求突破。已有诸多论文以“实践”为关键词展开集体记忆的传播学分析,但何为记忆实践?记忆实践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其具体的研究立场、理论基础、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以上问题尚没有文献说得清楚。本文希望对相关文献与理论进行梳理,为集体记忆的实践研究梳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线索。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领域发生了一场“实践转向”,西奥多·夏兹金(Theodore R. Schatzki)解释其为“通过、或借助于、或依据某些实践的概念来思考人类的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机构与运转”<sup>[31]</sup>。理论家对实践的具体内涵存在认识分歧,但在最低限度上,实践被认为“是各种系列的活动”<sup>[32]</sup>。同时,所有实践理论都致力于去中心化、去二元化<sup>[33]</sup>和去普遍性<sup>[34]</sup>。从目的上看,实践分析可以打破在传统记忆研究中存在的二元化和静态化局限。下文将从实践理论的普遍特征与共同结构入手,解析传播学视域下集体记忆的实践分析这一研究路径的核心要素、研究取径与具体方法。

##### (一) 记忆实践分析的主客观核心要素

为了开展具体分析,夏兹金在实践形成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主客观元素进行集合分析,并主张在对组成元素主客互动的理解中达成对实践运行规范的理解。<sup>[35]</sup>对夏兹金所提到的实践因素进行归类,可将其大致分为行动者具身要素和行动中介要素两类。(表1)

表1 西奥多·夏兹金的实践分析要素的类型集合<sup>①</sup>

| 行动者具身要素              | 行动中介要素           |
|----------------------|------------------|
| 默会理解 (understanding) | 显性规则 (rules)     |
| 目的 (ends)            | 物质材料 (materials) |
| 信念 (beliefs)         | 技术 (technology)  |
| 计划 (projects)        | 组织 (institution) |
| 感情 (emotions)        |                  |
| 情绪 (moods)           |                  |
| 技能 (competence)      |                  |

如果将拥有某一集体记忆的每一个体看作是

①本表格依照顾洁论文《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框架、路径与启示》所归纳总结的主客观实践分析要素,进行了类型化的再归纳。

行动者,将进行集体记忆活动所依托的物看作是行动中介,就会得到记忆实践分析要素的类型集合。(表2)

表2 记忆实践分析要素的类型集合

| 行动者具身要素     | 行动中介要素  |
|-------------|---------|
| 默会记忆        | 记忆的显性规则 |
| 记忆的需求、动机与目的 | 记忆的物质媒介 |
| 记忆的计划       | 记忆的技术媒介 |
| 记忆的情感与情绪    | 记忆的实体组织 |
| 记忆技能        |         |

1.默会记忆:实践分析强调具身化的默会理解(understanding),这一默会理解有如海德格尔的“上手性”概念<sup>[36]</sup>。在记忆实践中存在的,无需理性观念的默会记忆可以来自于个人无意识,可以来自于集体无意识,也可以来自不被查觉的日常生活。在集体记忆实践中,人类共通的怀旧即是一种诱发了“旧日好时光”的集体无意识,其他源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母题也以“默会”的方式影响着集体记忆的框架选取与形成;重复刻写还可能使得集体记忆最终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sup>[37]</sup>已有的神经学研究也指出,程序性记忆和语义记忆是人类重要的隐性(默会)记忆机制,这一记忆的认知分类学能推进我们对集体记忆不同特性和机制的理解。<sup>[38]</sup>

2.记忆的需求、动机与目的:集体记忆的需求、动机、目的一般与认同联系在一起,哈布瓦赫<sup>[39]</sup>、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sup>[40]</sup>、弗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sup>[41]</sup>分别在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中谈及集体记忆的作用。

3.记忆的计划:随需求、动机和目的之后而来的还可能有集体记忆的计划。如2019年4月19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国家数字记忆”计划,将新浪微博作为第一家互联网基地,有选择、分步骤地将新浪新闻、微博博文纳入国家图书馆馆藏。家庭和个体自行整理、拥有的相簿也都属于有计划的集体记忆实践。

4.记忆的情感与情绪:同情、怨恨、感激等等人类的情感情绪也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们既能形塑集体记忆,也能被集体记忆形塑。记忆的情感与情绪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关联较为紧密。

5.记忆技能:记忆技能即“记忆术”,它与记

忆唤起息息相关。记忆术的核心来自于视觉联想和编码入位<sup>[42]</sup>,它“给予个人一定的方法,来对其记忆加以训练”,是个人借以“储备大量知识以供日后使用”的记忆技巧<sup>[43]</sup>。

6.记忆的显性规则:夏兹金将“成文法、经验法则、明确的规范性指令”界定为实践中的显性规则。<sup>[44]</sup>在集体记忆的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成文的、法则性的和明确的指令规则,例如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政策与文件会构成对“反记忆”的压制与规训、改造与收编。

7.记忆的物质媒介:典型的集体记忆的物质媒介包括但不限于地点、风景、纪念性物品、文字档案、日记、音乐、旗帜等,它是承载了集体记忆的自然物或人造物。

8.记忆的技术媒介:典型的集体记忆的技术媒介包括但不限于现代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它是承载了集体记忆的技术物。在技术哲学体系中,贝尔纳·斯蒂格勒<sup>[45]</sup>、许煜<sup>[46]</sup>等哲学家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传统,进一步论证了技术物体的主客观性,并认为技术趋势改变了(集体)记忆的本质<sup>[47]</sup>。

9.记忆的实体组织:指大众传媒机构、节日仪式、博物馆、协会、集团、党派等可以进行集体记忆实践的制度化、机构化实体组织。李红涛和黄顺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媒介记忆的研究,将重点放在“机构性媒介”及其记忆生产活动上,这些媒介就包括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大屠杀纪念馆以及新媒体赛博空间。<sup>[48]</sup>

集体记忆的实践研究就是围绕上述主客观要素,即行动者和行动中介展开;以传播学的学科属性切入研究,亦即围绕记忆主体和记忆媒介展开。由是,传播学视域下集体记忆的实践研究便可由传播学所熟悉的,也是其所独有的研究对象——媒介——入手,并结合其他主客观要素,形成记忆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取径。

## (二) 记忆实践的传播学理论基础与研究取径

媒介实践、媒介化与媒介学三者互为表里,进一步提供了由行动者、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等维度展开传播学领域集体记忆实践研究的可能路径。

1.以媒介实践固定记忆实践。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最早将实践理论引入传播学,他认为“媒介导向实践(media-oriented practice)是人们从事各种跟媒介有关的行为,因而要关注人们做些什么(实践)跟媒介有关的事情”。<sup>[49]</sup>Hirst 等认为,集体记忆具有突发性,意思是说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体记忆的总和,而是群体在交流过程中动态构建的,而且群体回忆的结果与个体单独记忆时是截然不同的。<sup>[50]</sup>与集体记忆传播有关的媒介实践如何固定了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如何在媒介实践中发生并获得意义结构的形成就是传播学研究的应有之义。<sup>[51]</sup>

在尼克·库尔德利的媒介实践理论体系中,媒介特指“一切制度化的、用于传播符号内容的结构、格式、形式和界面”<sup>[52]</sup>,这就排除了非制度化的个人媒介实践,走向了制度化的媒介实践分析。但集体记忆的情况要比大众传播或数字传播实践复杂,除了在制度化的界面上进行的集体记忆实践,基于家庭、人际等小型社群开展的集体记忆实践本身就是非制度性的,因此,在媒介实践的研究取径下,那些非制度性的媒介实践也是集体记忆实践研究的对象。

在媒介实践的研究路径下,集体记忆研究更加侧重记忆个体通过媒介手段对集体记忆的参与互动,经由媒介使用引发的集体记忆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实践。它并不始于记忆文本,而是始于和记忆的媒介使用相关的松散性、开放性事件。<sup>[53]</sup>媒介实践是开放性的,经由若干个体的媒介实践,集体记忆嵌入广阔的社会权力关系当中。<sup>[54]</sup>

2.媒介化社会中的集体记忆。媒介化的基本判断就在于,媒介已经内嵌到社会和文化中,成为当今社会与文化的一部分,并在最基本的制度层面上发挥影响作用。<sup>[55]</sup>集体记忆作为一个研究议题与社会、文化、媒介、意识形态等存在广泛关联,当代社会文化因媒介的嵌入和渗透而出现的结构性变迁也体现在集体记忆当中。换句话说,我们要在与政治、资本、文化的流动密切相关的媒介化社会中重新思考记忆问题,集体记忆是“媒介化”了的社会、文化中的制度产物。<sup>[56]</sup>

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媒介化的过程改变了集

体记忆的分配——记忆的分配出现了变化,权力的分配随之出现变化——在前现代媒体时代,集体记忆的分配有赖于社群传递,集体记忆的社群边界较为清晰;在大众媒体时代,传播技术被国家权力或资本所垄断,大范围的同一的集体记忆的灌输得以顺利完成;在新媒体时代,人人能传播,众声喧哗的新媒体将使集体记忆的争夺变得激烈。集体记忆为了适应不断变迁的媒介化社会并最终胜出,也越来越依赖于媒介化环境,并在形式、内容、组织和语境等方面被形塑。媒介化的制度视角使我们能够针对特定时空中的集体记忆展开互动式的社会分析,“不断增长的媒介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及文化机制与互动模式的改变”,为集体记忆与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制度领域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传播学视角的实践性分析框架。<sup>[57]</sup>

3.集体记忆研究的媒介学取向。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认为,传统上集中于文本的叙事理性分析,未能说明从观念到社会的关键性环节是如何发生的:从“说”到“做”需要通过实践才能产生传递效果,对历史时期中观念的媒介化的关注即媒介学对实践理性的关注。<sup>[58]</sup>媒介学提出,不能将一个观念或者思想活动同那些记录、传递和存储它们的技术条件分开,这就构成了媒介学的实践分析逻辑。<sup>[59]</sup>

媒介学的关键性核心概念“媒介域”(mediaspheres)就是技术与社会的中间环境。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概念,“域”不是一个场所,也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抛弃简单的二元论或决定论,从变动不居又相互勾连的关系出发进行思考的一个概念。媒介域中的媒介技术不能决定社会性质,但是可以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涉及时间性、压力感、知名度、支配力和等级制等”<sup>[60]</sup>。因此,与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不同的是,媒介学中的媒介“是一个兼具历史性和情境性的复数概念。媒介呈现出‘技术-文化’属性的一体两面性”<sup>[61]</sup>,它与观念、社会持续地发生动态耦合——媒介是需要考察的核心场域,但并非决定了其它场域的中心场域。每一时代独特的媒介域

构成格局解释了在现实世界中运行的各种象征性思想活动的出现、壮大或者灭亡,这为集体记忆的实践研究范式提供了一种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德布雷本人也经常使用“记忆”这一语词来突出附着在观念上的时间性特征。

当采用媒介学的研究视角去思考集体记忆的时候,也就是要将集体记忆当作一个媒介生态关系中的有机体看待。一个记忆内容要形成集体记忆,就是一个观念和信息扩散的过程,它的扩散要依赖一个个复杂程度各异的物质性记忆载体系统来进行。在一个生态系统中,没有有机体可以独立存在;在一个媒介生态系统中,作为观念的集体记忆也与周围的物质技术环境之间存在类似的依赖与互动关系。媒介学强调的实践就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可能串联起社会不同场域间的互动关系”<sup>[62]</sup>。媒介形式力量关系的博弈与记忆主体的角色博弈存在关系,这是在集体记忆研究中理解媒介学的基本出发点。<sup>[63]</sup>

## 五、总结:实践即“关系”

“叙事-话语”分析和“媒介-技术”是传播学领域中集体记忆研究的两大传统路径。当这两种路径与集体记忆的经验现象之间出现落差,研究后继乏力之时,集体记忆研究出现了实践的转向,即不仅聚焦谁记忆了什么问题,还聚焦用什么媒介、怎么记忆、产生了什么影响的问题。采用夏兹金的实践分析框架,对集体记忆所涉行动者具身要素和行动中介要素进行集合分析,则可由“媒介”出发构建起集体记忆实践研究的传播学分析框架。

媒介实践、媒介化和媒介学构成了传播学中的三大理论基础和研究取径,三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为表里。<sup>[64]</sup>媒介学建立的从“说”到“做”、从观念到社会的媒介实践历史哲学,契合了当下欧美传播学研究“媒介化”的普遍思潮。尼克·库尔德利的媒介技术实践研究取向与媒介学也存在共鸣,即不仅仅是把媒介当作对象、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在实践的语境里考察人用媒介做什么,社会中发生的什么事情与媒介有关系。<sup>[65]</sup>

总的来说,在实践理论的研究范式下,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不再纠缠于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从抽象的思辨中拉到具体的实践经验上来,更多地关注作为传递手段的媒介以及在其上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角度进去,提示我们在记忆实践中去把握媒介、社会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考察媒介透过怎样的集体记忆经验,如何编织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媒介的决定性力量在于它嵌入到不同层面关系的构成上,这些关系连结起的可能是新旧的观念与实践,也可能是中心与边缘的重整。<sup>[66]</sup>实际上,传播学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实践研究讨论的依然是权力关系问题,但出发点不再是文本或媒介本身,而是从媒介出发的集体记忆实践相关的种种要素。记忆实践的多元性在实践要素的集合分析中与权力的运行机制发生关系,而这种基于媒介嵌入的实践关系考察构成了对传统研究路径的拓展、补充与超越。在这种超越中,传播学从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出发,也搭建起了与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对话,这也是集体记忆这一理论最初的生命力所在。

## 参考文献

- [1][3][25][39]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40;45;43;43-45.
- [2][14] 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09):39-50+126-127.
- [4] 彼得·诺维克.大屠杀与集体记忆[M].王志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9.
- [5] Barry Schwartz.Abraham Lincoln and the Forge of National Memory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6] Barry Schwartz.Abraham Lincoln in the Post-Heroic Era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 [7] 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9-252.
- [8] 周海燕.记忆的政治[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 [9] 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M].张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Edgerton,Gary R.“Where the Past Comes Alive”: Television,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In: Wasko and Janet. A Companion to Television [M].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 [11] 陈全黎.中国记忆史研究的路径问题——以《记忆的政治》为中心[J].史学月刊,2015(10):24-32.

- [12][13][42]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174.
- [15]Reading,Anna and GardeHansen, eds. Save As... Digital Memories[M]. UK: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16]Bird S E.Reclaiming Asaba: Old Media, New 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mory.In Neiger M,Meyers O, eds. On Media Memory [M].UK:Palgrave Macmillan,2011: 88-103.
- [17]Zelizer B.Cannibalizing Memory in the Global Flow of News.In Neiger M,Meyers O,eds.On Media Memory [M]. UK:Palgrave Macmillan,2011:27-36.
- [18]李明.从“谷歌效应”透视互联网对记忆的影响[J].国际新闻界,2014,36(05):21-32.
- [19]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4(03):98-106+159.
- [20]王润.“记忆的微光”:“恢复高考”的自传式书写与新媒体记忆研究[J].新闻记者,2019(09):12-22.
- [21]Reading A .Memory and Digital Media: Six Dynamics of the Global Memory Field .In Neiger M,Meyers O,eds.On Media Memory[M].UK:Palgrave Macmillan,2011:241-252.
- [22][23]Kligler-Vilenchik N.Memory-Setting: Applying Agenda-Setting Theory to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Memory.In Neiger M, Meyers O ,eds.,On Media Memory[M].UK: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24][38]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M].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97-106;312-322.
- [26]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7]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28][47]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5;31.
- [29]谢卓潇.春晚作为记忆实践——媒介记忆的书写、承袭和消费[J].国际新闻界,2020,42(01):154-176.
- [30]周海燕,吴晓宁.作为媒介的时光博物馆:“连接性转向”中的记忆代际传承[J].新闻界,2019(08):15-20.
- [31][32][34][44]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诺尔·塞蒂纳,埃克·冯·萨维尼.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M].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2;10;58.
- [33]顾洁.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框架、路径与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06):13-32+126.
- [35]Schatzki T R . Social Practices: A Wittgensteinian Approach to Human Activity and the Social [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81.
- [37]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M].浙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72.
- [4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99.
- [41]Fred 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M].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79:31-34.
- [43]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21-22.
- [45][47]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9:128-147.
- [46]许煜.论数码物的存在[M].李婉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49]Couldry, Nick.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J]. Social Semiotics, 2004, 14(2):115-132.
- [50]Hirst W , Manier D , Apetroaia I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remembered self: family recounting. [J].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818 (Self Across Psychology The Self -Recognition Self -Awareness):163 - 188.
- [51]齐爱军.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J].山东社会科学,2017(01):151-155+192.
- [52][53][54]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1;41;8.
- [55]Hepp A , Hjarvard S , Lundby K . Mediatization - empirical perspectives[J]. Communications, 2010, 35(3):P.223-228.
- [56]Uchida, R. Memo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experience in modern Japan: rethinking the song ‘Home’ [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999, 21(2):205-219.
- [57]施蒂格·夏瓦.文化与媒介的社会化[M].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21-23.
- [58][64]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58.
- [59][63]陈卫星.媒介域的方法论意义[J].国际新闻界,2018,40(02):8-14.
- [60]陈卫星.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J].全球传媒学刊,2015,2(01):1-21.
- [61]黄典林.出版史研究的媒介学维度——《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的方法论意义[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02):72-76.
- [62]唐士哲.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J].新闻学研究, 2014(121):1-39.
- [63]Couldry, Nick.Media,Society,World: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M].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64]骆世查.数位时代的媒介史与作为关系的技术:评《制造时间》[J].新闻学研究, 2019(139):149-159.

## **Mnemonic Practice: the Path Turn of Collective Memor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Pan Xiaoting, Chen Ying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mem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the constructivist analysis path of ' narrative-discourse ' was used in the early stage, and then the technical analysis path of ' media-technology ' appeared. There is one-sidedness of collective memory as a social fact in two paths, which fails to explain the actual connection between collective memory and social level, also fails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this connection. In recent years, a research approach of “ mnemonic practice ” has emerged under the “ practice turn ”. The practical analysis of collective memory is to make a unified analysis of various human memory activities with subject and object. The study of mnemonic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can take media practice as the central point, and take media practice, mediaization and mediolog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provide a possible path for collective memory research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ctors, institutions, society, culture and history. This research approach based on ' relationship ' may achieve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lements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conduct theoretical dialogues on collective memory at different disciplinary levels.

**Keywords:** collective memory; mnemonic practice; media practice; mediaization; mediology

**Authors:** Pan Xiaoti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Chen Yi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 平台视域下全国居民疫苗接种的认知、意愿及影响要素<sup>1)</sup>

——基于五大互联网平台的舆情大数据分析

喻国明 杨雅 陈雪娇

**摘要** 我国在疫苗接种率的进展方面相对滞后。排除客观因素，是什么在影响公众的接种意愿，影响了公众认知，怎么做能有效推动公众的接种行为，就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重要课题。本报告基于五大互联网平台的舆情大数据，采用情感词库与智能化话语分析的手段进行数据处理，深度地分析探究社会环境以及媒体报道如何影响全国居民对疫苗接种事件的主观认知和行为意愿，得出了一系列极具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厘清非常态期间社会认同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以及传播规律，为推动健康传播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疫苗接种；认知与意愿；平台舆情；风险感知；铺垫效应；视频表达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 100875。杨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陈雪娇，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继 2020 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爆发后，新冠疫苗的研发与接种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据《纽约时报》于 6 月 9 日数据，目前全球已经接种超过 22.2 亿剂疫苗，但不同的国家疫苗接种率已经存在明显差距，而中国能否在这一场“战役”中获胜，关系到未来中国能否登上国际经济发展快行线的关键。就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而言，国内的接种率跟期望值之间仍然有着相当的差距，排除客观因素，是什么在影响公众的接种意愿，影响了公众认知，怎么做能有效推动公众的接种行为，就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重要课题。本报告基于微博、抖音、今日头条、哔哩哔哩、知乎等五大互联网上与“新冠疫苗接种”相关数据（其中，微博网民评论 497,953 条；抖音网民评论 85,947 条，今日头条网民评论 392,851 条，哔哩哔哩网民评论 28,365 条，知乎网民评论 32,305 条，共计 104 万条评论数据）在 NLP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上，使用我们研发的《语思中文情感态度词典》《认知词典》和《评价词典》进行相关数据的智能挖掘，深度地分析探究社会环境以及媒体报道如何影响全国居民对疫苗接种事件的

1)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喻国明学术工作室与北京云创网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进行的，也是 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主流媒体传播力绩效评估研究”(20JJD860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主观认知和行为意愿，厘清非常态期间社会认同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以及传播规律，为推动健康传播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本项调查的主要发现和分析性结论如下：

### 一、目前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居民接种意愿不够明确，种种“疑虑”影响着他们对于疫苗接种的行为决策

数据分析发现，虽然总体上有 45% 的网民表达了比较明确的疫苗接种意向，但同时却有超过 50% 的网民在接种意愿上没有明确表态或干脆表示“不接种”（图 1）。根据行为与态度改变理论，对于明确表态“拒绝打疫苗”人群，其态度的改变难度远远大于“意愿不确定”的网民，当前最需要对此类人群进行积极引导，解决其疑虑，坚定其接种意愿并促成其接种行为。如果“意愿不确定”人群的引导转化得以实现，群体免疫接种率目标就可以完成——根据钟南山发布的实现群体免疫的接种率目标，如果疫苗有效率为 70%，我国接种率应不低于 83.3%；如果疫苗有效率为 80%，接种率应不低于 72.9%<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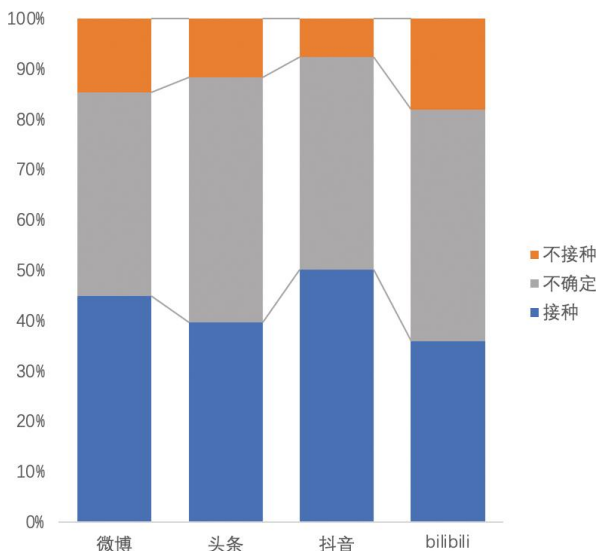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网络平台网民的疫苗接种意向对比

那么，是什么在影响着公众对于疫苗接种的行为意向呢？从各大平台网民对疫苗接种相关议题的情感表达上看，虽然我们居民整体上对此的正面态度高于负面，对疫苗接种的“赞扬”在主

要情感表达中数量最多；但是，“疑虑”在网民评论中占比排在第二位，“贬责”“焦虑”“失望”“悲伤”等是群众的主要负面情绪，对于这些情绪表达的具体文本的内容分析表明，正是对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的“疑虑”严重影响着公众态度和疫苗接种意向。（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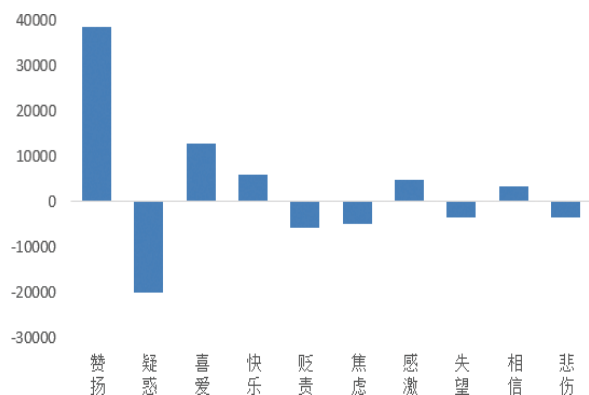


图 2 疫苗接种相关议题的网民主要情感表达

### 二、公众的认知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外疫苗负面报道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引起公众负面情绪的原因，将公众关注的新冠疫苗热门议题进行对比，可以看出：

（一）在国内正式接种疫苗之前和之中，国内媒体的报道很大程度聚焦于对国外疫苗的负面报道，引起网民密切关注

在网民关注的热门疫苗议题中，国外疫苗接种进展以及接种效果相关议题数量是国内接种状况的 2 倍有余（图 3），其中不乏大量国外疫苗接种后产生不良反应、疫苗安全性有效性低的相关话题，例如“挪威出现了 23 例与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死亡事件”“约 240 名以色列人在接种辉瑞疫苗后感染新冠”等报道。有学者通过研究情绪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关系时发现，负面情绪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sup>[2]</sup>而正面情绪的表达与转发、评论数量并无联系<sup>[3]</sup>。传播心理学和舆论学的研究表明，负面情绪唤醒的信息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显然，我国媒体关于国外疫苗接种中的这些负面报道极大增强了公众对疫苗接种负面议题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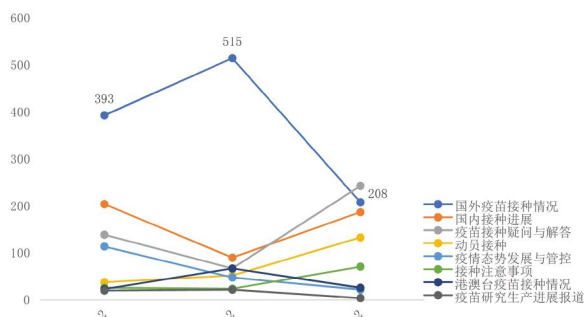


图3 网民关注的疫苗相关议题数量对比

(二) 媒体对国外疫苗的负面报道的“启动效应”，铺垫了国内群众的接种犹豫心理

“铺垫”理论(Priming)又被称为认知心理学家称为“启动效应”，以关联网络记忆模型(Associative Network Memory Effect)为基础，认为个体的记忆是由一个有组织的节点网络组成，这些节点通过大脑的联想功能组合在一起，外在的刺激诱导可以激活人脑中与之相关联的旧有认知结构，从而影响到现有的判断。<sup>[4]</sup>因此，铺垫效应预测了个体的既有经验对当前信息的阐释所造成的影响，<sup>[5]</sup>它是媒体赋予特定事件属性偏向的传播范式，又是受众构建现实与想象连接的认知基模。在国内正式接种疫苗之前，国内媒体的报道很大程度聚焦于对国外疫苗的负面报道上。如“不良反应频发 英国疫苗产能还跟不上”(3月15日，新快报)、“德、法、意等国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3月18日，怀化日报)、“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 英已有7人死于血栓”(4月4日，《今晚报》)、“美国强生疫苗与血栓可能存在关联”(4月22日，《新安晚报》)、“墨西哥、波兰出现假辉瑞疫苗”(4月23日，《东亚经贸新闻》)等。根据网察大数据平台显示3月15日至4月30日期间，提及国外疫苗的新闻报道中14.41%为负面报道，11.36位正面报道，而在提及国产疫苗的新闻报道中，20.82%为正面报道，仅有3.8%带有一定的负面倾向。



图4 网民评论中提及疫苗代号的高频词云

网民评论中提及疫苗代号的高频词云显示，美国的辉瑞疫苗是最受公众关注的疫苗类型，其提及频数是国内科兴疫苗的近两倍。因此，在国内正式推行新冠疫苗接种后，公众对疫苗的判断标准可能不再建立在对疫苗全面而理性的认知和了解上，而是会被个体最容易被激活的记忆所影响，即已有的对辉瑞疫苗的不良反应上。同时由于“逆火效应”，很多人看到新的信息之后有可能未被说服，反而更加坚持了自己原有的看法。很显然，对医药健康领域有一定了解和基本判断的网民，看到一直代表着国际一流水准和高质量标准的“辉瑞”“强生”都不值得信赖，那么对所有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也会有着疑虑、困惑和恐慌。因此，在国内正式推行新冠疫苗接种时，很多网民对疫苗的判断标准不是建立在对国产疫苗全面了解和理性认知的基础上，而是被个体最容易被激活的记忆所影响，唤醒和启动既有认知，即媒体报道的辉瑞等疫苗问题频发、“不靠谱”。

(三) 信息接收的“休眠效应”所产生的认知转移，进一步降低了公众对国产疫苗的信任感。

根据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提出的“休眠效应”，当信源或者信息线索具有高强度的影响时，那些抑制了内容说服效果的折扣线索(discounting cue)的影响力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强。在国内正式开展疫苗接种之前，公众已经接受了一部分关于国外疫苗造成血栓、面瘫以及死亡的负面信息，经过时间的推移，对疫苗品牌、细分种类和各种代号不敏感的大多数网民，很可能会淡忘疫苗的具体品牌，将负面认知转移到整体对象上，便会记得新冠疫苗本身会带来的潜在危害，从而进一步降低整体的接种意愿。

### 三、适度报道新冠疫情的负面信息有助于唤醒公众的风险感知，促进公众接种行为

从疫苗舆情的整体趋势看，“新冠疫苗接种”相关话题热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在疫苗试点初期的第一阶段(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1月22日)，媒体对部分地区确诊病例的报道让舆论传播量迅速上升，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疫苗接种免费的信息之后，该阶段的舆情讨论

量出现了最高峰；到了第二阶段（1月23日至3月14日），国内疫情控制良好，公众降低了对疫苗接种迫切性的感知，疫苗相关信息的讨论热度总体处于较低迷的状态，疫苗接种率持续走低；第三阶段（3月15日至4月30日），舆情热度随着全国疫苗接种情况的发布情况波动。4月2日云南地区的疫情让疫苗整体关注度达到峰值，媒体的新闻报道增强了公众对社会环境的风险感知，从而带动了对新冠疫苗的讨论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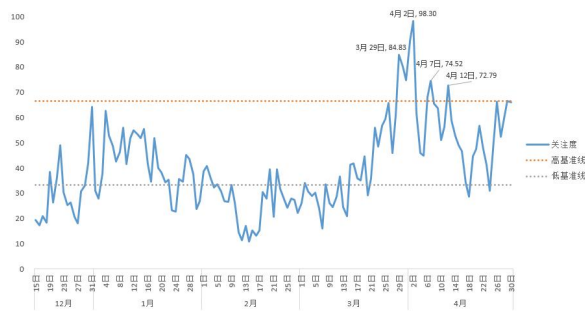


图5 新冠疫苗接种相关舆情关注指数图

以上舆情数据的结果显示，媒体对新冠病毒感染病患的报道很大程度上会增加公众的风险感知并且引爆舆论。风险感知是公众对潜在伤害的感受能力，也是影响个体风险决策的重要因素，<sup>[6]</sup>在面对高威胁性的外部性事件时，风险感知往往在公众的健康行为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风险感知研究一直是健康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不少学者围绕风险感知与意图、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一直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直到2007年，Noel和Gretchen等学者通过元分析法（Meta-Analysis）<sup>①</sup>验证了较高的风险感知会直接导致接种行为的假设。<sup>[7]</sup>他们收集并严格筛选了核心论文库中34篇关于与风险感知、疫苗接种/注射等词条相关的论文，共包含被试总数15,988人，经统计后发现风险感知的效应量（effect sizes, es）显著预测了公众的疫苗接种行为，这表明一定程度的风险感知将会直接促进公众的健康行为。因此，针对本次疫苗接种事件，适度报道与疫情相关的负面信息有助于增强公众的风险感知，从而有机会提高整体的疫苗接种率。

①元分析(Meta-analysis)又称为整合分析或者荟萃分析,是一种对具有相同研究目的的多个独立研究结果进行系统的定量综合方法。

除了风险感知的显著上升之外，舆情结果还显示，三个阶段所出现的舆情高潮也会伴随着一些“次热点”事件的出现，从而再次引爆舆论。这种多峰舆情也成为“次生舆情”，是因某一事件触发而再生或演化的新舆情。此类舆情的正面效应是对原生议题的修正，促进事态往正面态势发展；但如果不能有针对性地化解疑虑、排除障碍，则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则会体现为非理性的负面情绪扩散。因此，舆情高潮之后与次生舆情之前的窗口期是引导舆论的黄金时段，媒体以及相关机构应当抓住时机引导舆论走向，进一步强化大众疫苗的接种意愿。

#### 四、传受者之间心理距离会影响舆情引导传播效应，越能直击舆情靶心的内容文本，舆情的引导力便越强

在舆情引导中，“传-受”之间的“距离”的一个影响力发挥的主要变量。其中，时间距离（及时与否）、空间距离（接近与否）、社会距离（认同与否）以及心理距离（涉我与否）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构成维度。距离越远，受众对传者表达的话语便越抽象、越隔膜，关系认同度和价值感知度就越低；反之，距离越近，受众对传者表达的话语则越具象、越有质感，关系认同度和价值感知度就越高。

在本次疫苗接种舆情中，网民所提及国内人物的高频词云显示，张文宏、钟南山、陈薇以及高福等专家被提及次数最多。显然，在此类健康类议题中，专家因其本身的权威性、专业性经媒体赋权而被大众认知，他们与舆情靶心的接近度超过了其他非专业的意见领袖，这些专家往往能直接且准确地回答公众最为关切的健康问题，因而更容易得到人们的信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网民提及最多的前八位专家中，除了张文宏来自上海地区的专家组之外，钟南山、陈薇院士等专家均来自国家级别的专家组，这在一点程度上表明，专家权威性以及业内地位的高低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引起社会及网民高度关注的唯一标准，反倒是他们的个人特质以及表达方式等“距离”

特质的不同,而使影响力的发生有所不同。



图5 网民评论中提及国内专家的高频词云

有学者研究发现,远心理距离的高解释水平阐释的是事物抽象层面的要点,而近心理距离的低解释水平则更偏向于判断、决策和行为层面,前者从宏观层面建构认知对象的原则与整体特征,而后者则涉及到具体的细节和要点。<sup>[8]</sup>比如,“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实践场景,但它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除了坚定信心的作用之外,并无具体的操作价值。在本次疫情期间,张文宏不回避问题,直击舆情关注的“靶心”问题,而且总是及时地做出回应,并擅于使用接地气的方式来讲解疫苗背后的医学问题,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与大众交流,此前他认为新冠肺炎“没有神药”,他对此打比方表示:“临床试验结果没出来之前就是你女朋友,出来了,才知道是不是你老婆”,这种表达方式更接近公众的心理距离与接受习惯,更容易实现价值传达的内化,最终增强公众的主观认同与行为意愿。

## 五、官方意见场与民间意见场之间呈现的信息诉求的错位与隔阂影响着疫苗接种社会动员中官方意志的实践落地效应

在当下社会舆情的生成发育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哑铃效应”,指的是一个社会热点事件在形成、发展以及影响社会的进程中需要有两个重要的传播环节给予关键性的支撑:网络上社交媒体的赋能以及传统主流媒体的选择性跟进报道。前者是事件筛选、蕴蓄、爆发的中心平台,而后者则履行其“社会地位授予”的功能,一个重要信息的传播需要两类平台之间的协同与接力,二

者缺一不可。<sup>[9]</sup>

在本次疫苗动员过程中,受社交媒体影响的传统主流媒体作为舆论引导第一主体的功能有所削弱,但他们仍然是主要的发声“喉舌”,他们所赋予疫苗事件的议题显著性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的判断。<sup>[10]</sup>但是此次舆情数据结果同时显示,大众媒体虽然影响了公众对疫苗接种的注意程度,影响公众在“想什么”“关注什么”等方面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力,但在影响他们“怎么想”方面,即影响到他们对议题属性的判断以及行为决策方面影响力偏弱。分析表明,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流媒体与政府机构所形成的官方意见场与普通公众的民间意见场之间所出现的信息属性表达的偏差与错位所造成的。换言之,官方媒体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卡拉OK”的偏向,与民间意见场之间存在着“各说各话”的现象,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形成社会共识,启动社会行为方面还有相当欠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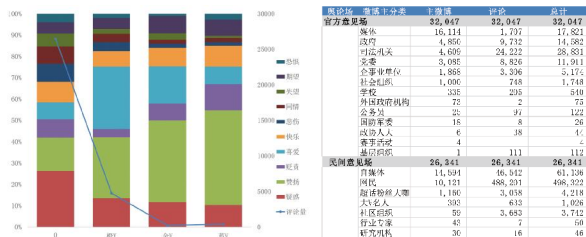


图6 各种认证微博用户对动员接种的具体情感对比

通过对比以政府、媒体机构、企业为主的官方意见场和以个人为主的民间意见场对动员接种的情感差异<sup>①</sup>,结果发现,以蓝V为代表的官方账号主体对动员接种行为越赞扬,疑惑情绪也越少;而未认证的普通用户则赞扬越少,疑惑更多。换句话说,微博平台上以蓝V为代表的官方意见场与普通网民所代表的民间意见场之间存在着信息传达的隔阂,这表现为前者对信息的了解程度更高,疑惑更少,而后者则反之。官方意见场宣传的信息主要以正向的积极情绪(赞扬、快乐以及喜爱)为主,但是这些信息并未解答民间意见场所想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造成了疑惑情绪。

①此处将官方意见场定义为微博上以政府、媒体机构、企业为代表的蓝V认证用户,将民间意见场定义为无认证用户。

由此可见,虽然主流媒体与政府机构如今仍然拥有者庞大的受众群体以及强大的社会公信力,但是官方意见场的信息传播并没有完全打破圈层之间的认知隔阂与界限,两个意见场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不同的象限中彼此隔绝,各说各话。在信息多元化的数字空间中,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特有的信息定制渠道,传播者想要进一步影响公众的认知以及行为意愿,则需要进一步体察社情民意,推动异见群体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达成必要的社会共识。<sup>[11]</sup>

## 六、视频手段的普及作为“泛众化传播”时代到来的重要技术基础,其本身蕴含的关系认同特性带来了更正面的情绪激励以及更多元的跨界交流

舆情结果显示,网民的满意度在各大平台上呈现出较大差异,其中以抖音、B站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满意度最高,其均值高达70%;而以知乎、微博为代表的文字类平台满意度最低,总值不到40%。再进一步对比抖音和微博平台的差异发现,文字平台上男性用户偏积极,女性偏消极;而视频平台上男女之间的情绪分化缩小,二者所发布的积极情绪占比显著上升,负面情绪降低明显,其中“贬责”“焦虑”以及“失望”等情绪表达量降低幅度最大。由此可见,与文字平台相比,同样一条疫苗接种的动员信息在视频平台上发布时将取得更正面的情绪激励效果并且更加有利于说理。以视频为代表的视觉文化不仅在逐渐影响公众对事物的认知,它所传播的非理性、低逻辑信息也产生更强的跨圈层关系认同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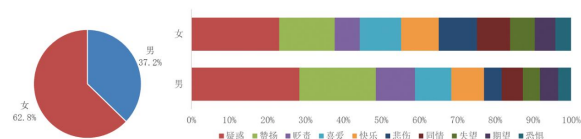


图 7-1 不同性别微博网民用户对动员接种的具体情感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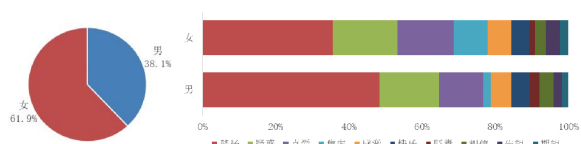


图 7-2 不同性别抖音网民用户对动员接种的具体情感对比

视频本身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内容传播样态的改变,也意味着用户在接受内容过程中思维方式的转换,视觉文化中蕴含着的感性、非逻辑特征让个体逐渐摆脱认知水平的限制,让处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用户打破交流障碍并且以关系联结为基础产生情感共鸣,放大内容的情感属性。在互联网时代,即使大家都在说“用户赋权”“人人都是传播者”,但是与视频传播相比,文字符号中蕴含着的精英主义逻辑并不能使每个人发表的内容都得到网民的关注与转发,不同个体的媒介素养差异决定了他们所能取得的信息容量,其背后还隐含着阶层性的权力结构特征。从本质上看,以微博、知乎等为代表的文字社区仍然是一种较为单一化的交流平台,而视频作为一种“热”媒介形态,其降低了用户阅读使用的门槛,减少了认知资源的调配,从更高的维度来塑造表意资源的保真度,在“注意”成为一种愈发资源的当下投其所好,能够快速抓取用户用户注意并且传达出关键的信息。

## 七、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之间的代际差异:中老年群体更乐观但也更有更强的贬责,90后以及千禧一代更悲观但是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近20年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媒介使用习惯以及媒介素养的差异划分出了迥然相异的两代群体:数字化原住民以及数字化移民,前者是在数字空间中出生并成长的一代群体,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则更偏向于30或是40岁以上的成年人,互联网技术环境对于他们说就像是“需要学习适应的新大陆”,然后这类移民也生活在数字空间中,但是他们足迹依然停留在过去。<sup>[12]</sup>在微博的疫苗接种议题上,舆情结果显示,90后网民是最主要的内容发布者,占比超过了50%,而60后至80后这一代群体的发声量不足90后的一半。

此外,从90后到60后,随着年龄增长,“赞扬”情绪表达占比也逐渐增多;而相比80年代以前的中老年群体,90后以及Z时代网民表达了更多“悲伤”“失望”以及“同情”等悲观情绪,虽然中老年群体的情绪相对乐观,但或处于社会阅

历以及经验，这部分网民也表达出了更多的贬责。相反，00后虽然是六个年龄层中表达了最多“悲伤”情绪，但是他们同时也对现状更喜爱，对未来抱有更多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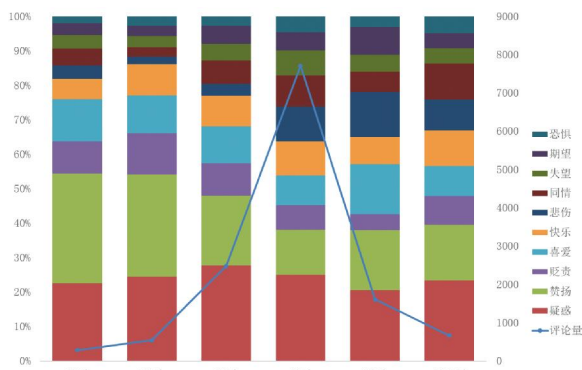


图8 不同年龄段微博网民用户对动员接种的具体情感对比

在信息爆炸的社会背景下，互联网空间中的交互模式日益复杂，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扩大。目前已有研究发现，互联网媒介的使用对中老年群体有显著的正向幸福激励作用，从而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幸福感。<sup>[13]</sup>但是这并没有直接反映到年轻一代群体对生活的满意度上。从代际演进的趋势上看，90后以及千禧群体对生活的满意度显著低于中老年群体。<sup>[14]</sup>这正如伊斯特林悖论所示，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的幸福感也应该提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小生活在互联网环境下的数字土著一代面临着更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媒介环境，游戏、社交媒体、视频娱乐等屏幕交互任务充斥了年轻一代群体的生活，他们失去的更多的睡眠时间与思考空间，数字媒介的使用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导致了他们更低的生活满意度。<sup>[15]</sup>

但是从这两个群体对未来的期待上看，中老年难以在互联网空间中自治因此整体期待降低；而90后以及千禧一代对互联网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处理能力因而对未来有更积极的期待。有学者将在数字化生存困难的中老年群体称为“数字难民”，即他们无法将互联网操作融入在日常生活中，也难以胜任无处不在的虚拟交流模式。因此，在观点多元的社会环境下，中老年人往往处在单

一的意见场中，对多元化信息进行简单的一元化统合，同时也缺少对复杂意见的处理能力。反观千禧一代的数字化原住民，他们更了解互联网交互的机制与规则，在信息爆炸时代仍然能处于自治的状态，通过信息的统合筛选来维持较稳定的认知上的稳定和健康。

## 八、大部分网民对疫苗接种持正面态度，但行动意愿不够明确，“关键人”的行为示范、人们的心理预期以及参照群体形成的“第三人效果”的感知定势成为疫苗接种的社会动员中最为关键的“临门一脚”

从五大平台网民对疫苗接种事件的具体情感分布来看，“赞扬”是占比最大的情绪基调，但是接种意愿结果显示，还有很多网民在结论和行为意向上不够明确，不确定以及不接种的态度占比超过了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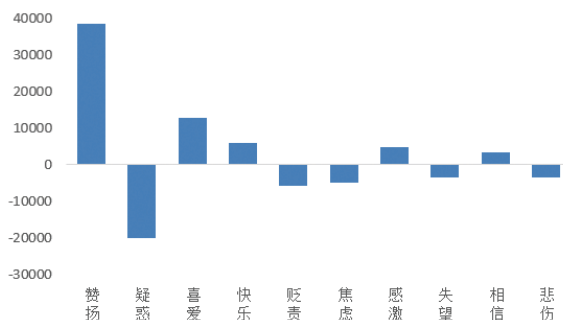


图8 五大平台网民对动员类贴文/视频的具体情感

如何解决疫苗接种的社会动员中最为关键的“临门一脚”？首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其认同的社会关系中的“关键人”（如知识精英、明星网红、党政官员等）的率先垂范是非常关键的，很多既有知识、逻辑、事实的逻辑博弈中，“关键人”的“怎么做”常常比他们“说什么”更重要。

其次，通过传播降低人们对于“疫苗”神话的心理预期，使人们可以更加理性地接受疫苗接种效应中的种种并不“完美”的现实非常重要。过高的预期会让人们面对实际时常常产生挫败感和排斥心理。不回避疫苗接种的某些不足，反而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社会信任。

其次,利用“第三人效果”理论增强人们的接种意愿,并促成他们的接种行为。传播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认为媒体所报道的信息对他人的影响要大于对自己的影响,其中身边诸如家人、亲友以及同学等参照群体的预期是情绪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疫苗接种过程中,由于国内良好的疫情管控态势降低了公众的风险感知,而媒体的报道基调主要以正面的宣传为主,因此个体会偏向于认为“既然别人都打了,那我就不需要再打”的感知定势,即当个人在确定自己的立场之前会根据外界参照群体的观点以及态度来调整预期,从而根据这种预期来制定行为决策。因此,对于传播者来说,通过发布的内容来让目标受众认为信息对其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也是促进他们态度行为改变的重要手段。这个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要选择能够使目标受众产生认知偏差的文本,在文本制作的过程中加入“参照群体”行为的内容;其次,发布这些内容,让公众产生认知偏差,高估“参照群体”行为可能性;最后,让公众产生传者所预期的情绪改变行为。例如,云南疫情发生后,媒体发布了部分“疫情恐慌”以及“全家人为疫苗接种在社区诊所门口占座排队”的信息,让公众产生“我再不打疫苗就打不上了”的感知定势,从而进一步促进疫苗接种的热潮。

必须指出,本项研究虽然是以疫苗接种为对象所展开的一项舆情研究,但其中所包含的民众的社会认知和行为启动与效应的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渠道及传播法则、传播手段之间的配伍、机制等重要的发现是具有普遍的理论认识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

## 参考文献

- [1]“实现群体免疫,疫苗接种率分别要达到多少? 钟南山晒出研究数据”[EB/OL]https://www.sohu.com/a/468616354\_120675562.
- [2]Rui, F., Zhao, J., Yan, C., & Ke, X. (2013). Anger is more influential than joy: sentiment correlation in weibo[J]. Plos One, 9(10): e110184.
- [3]刘丛,谢耘耕,万旋傲.微博情绪与微博传播力的关系研究——基于24起公共事件相关微博的实证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09):92-106+128.
- [4]Brewer, P. R., Graf, J., & Willnat, L.. (2003). Priming or framing[J].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5, 493-508.
- [5]Fiske, S. T., & Taylor, S. E. (1991). Social cognition[M].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6]Cooper, T., & Faseruk, A. (2011). STRATEGIC RISK,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BEHAVIOUR: META-ANALYSI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 Analysis, 24(2).
- [7]Brewer, N. T., Chapman, G. B., Gibbons, F. X., Gerrard, M., McCaul, K. D., & Weinstein, N. D. (2007).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health behavior: the example of vaccination. [J]. Health psychology, 26(2), 136.
- [8]Forster, J., Friedman, R. S., & Liberman, N., “Temporal Construal Effects on Abstract and Concrete Thinking: Consequences for Insight and Creative Cogni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87, no. 2, 2004, pp. 177 - 89.
- [9]喻国明. 跨文化交流中的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关于减少和消除“文化折扣”的传播学视角[J]. 新闻与写作, 2020(3):62-65.
- [10]史安斌, 王沛楠. 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年:溯源·演进·前景[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10):13-28.
- [11]喻国明. 重拾信任:后疫情时代传播治理的难点,构建与关键[J]. 新闻界.
- [12] 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2: Do they really think differently? On the horizon.
- [13]Li, J., & Zhou, X. (2021). Internet use and Chinese older adults'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The role of parent-child contact and relationship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19, 106725.
- [14]Twenge, J. M. (2019). The sad state of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R].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9.
- [15]Allen, M. S., & Vella, S. A. (2015). Screen-based sedentary behaviour and psychosocial well-being in childhood: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J]. Mental Health and Physical Activity, 9, 41-47.
- [1]“实现群体免疫,疫苗接种率分别要达到多少? 钟南山

## The Perception,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accination among National Residents in the Platform Perspective

——Big data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five Internet platforms

YU Guoming, Yang Ya, Chen Xuejiao

**Abstract:** China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in the progress of vaccination rates. Excluding objective factors, what is influencing the public's willingness to vaccinate, influencing public perception,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ublic's vaccination behavior becomes an extremely critical and important issue in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public opinion data from five Internet platforms, this report uses an emotional thesaurus and intelligent discourse analysis to process the data and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to explore how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edia reports affect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the nation's residents regarding vaccination events, and draws a series of findings with great practical guidance, clarifying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identity and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extraordinary period.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Keywords:** vaccination; perception and willingness; public opinion on the platform; risk perception; priming; video representation

**Authors:** YU Guoming, a Changjiang Schola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Adjunct Researcher of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Yang Ya,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en Xuejiao,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und project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by Yu Guoming Academic Studio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Yunchuang Netc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s on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20,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Project Number: 20JJD860001).

# “技术去能”与“多维透视”：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图景

汤志豪

**摘要** 围绕身体和生命的规制问题，福柯与阿甘本展开了他们有关生命政治的论述。二者的思想汇聚在一起，共同构筑起融合了否定性生命权力（决断权力）和肯定性生命权力（规训权力）的生命政治图景。步入智能时代，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深刻改写了社会现实，重塑了生命政治格局。当人技互嵌的数字生态日渐成型，人类的自然身体开始向“数字态身体”转变，生命政治便具备了全新的精神内核与实践指向。本文认为，“技术去能”代表着否定性生命权力的决断，“多维透视”则代表着肯定性生命权力的施展。二者互为增补，合力构成了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图景。

**关键词** 技术去能；多维透视；智能时代；生命政治；规训权力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汤志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 510632

近年来，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改写人类存在的整体语境，引领人们走进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生活世界。2020年8月28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的公司Neuralink首次向全世界直播展示了关于脑机接口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脑机交互设备。该装置类似于一枚硬币，能够植入动物颅骨内，进而读取大脑活动。<sup>[1]</sup>马斯克所搭建的这一技术场景拉近了现实与科幻影视作品之间的距离，也打开了一扇思考人类“媒介化身体”和“数字化生存”的窗口。实际上，在新媒介技术不断崛起的智能时代，“身体”作为一个关键概念至少迎来了两个层面的“复归”：一是身体在媒介研究视野中的重新显现，<sup>[2]</sup>二是身体在生命政治领域的重新激活。<sup>[3]</sup>

从媒介发展的视角来看，新兴技术正在不断入侵人的身体，在媒介融合的整体语境中制造了媒介形态融合、社会形态融合以及人与技术的融合。<sup>[4]</sup>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智能技术所创设的数字生态，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身体的游戏法则和权力的运作逻辑。<sup>[5]</sup>步入智能时代，5G、大数据、算法技术开始介入社会运作机制，虚拟现实装置、数字穿戴技术的出现，既革新了人们认识和想象身体的方式，也催生了全新的社会治理术。换句话说讲，智能时代既开启了人类生活的新篇章，同时也揭开了一幅全新的生命政治图景。基于此，本文将立足智能时代的宏观语境，以身体与技术的互嵌关系为切入点，探讨生命权力在身体层面的系统谋划与细微实践。

## 一、身体规制与现代生命政治的发展

自20世纪后期开始，“生命政治”（biopolitics）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开始从

哲学的疆土向社会学、人类学、生物伦理学、数字媒介学等领域辐射开来，在欧陆思想界促成了一个“生命政治的转向”（biopolitical turn）。<sup>[6]</sup>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学术界对生命政治的兴趣日益高涨，并在近几年兴起了新的研究热潮。<sup>[7]</sup>历史地看，“身体”作为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贯穿在生命政治的讨论中，牵动着生命政治学的发展。无论是作为一个明确的考察对象，还是作为一种基础性的隐喻，身体无疑都伴随着生命政治得到出场，对身体进行规范和制约的理念内蕴于生命政治的本质内涵之中。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由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科耶伦（Rudolf Kjellén）所创造。受到生命哲学的影响，科耶伦从有机主义的视角来考察国家，以一种有机体、生命体的方式来理解和想象国家的性质与功能。在科耶伦看来，国家是一个超越个体之上的有机体，它也会像人一样经历生老病死，也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被理解为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为维持自身机能、增强自身体质而进行的争斗和角逐。这种为了“生命”的持存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科耶伦笔下的“生命政治”。<sup>[8]</sup>不过，这种简单类比式的思维方式无法赋予生命政治足够深厚的理论影响力，未能激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生命政治”这一概念在经由福柯（Michel Foucault）的重新阐释之后，才得到了广泛的关注。1973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中使用了“生命政治”一词，将其定义为一种伴随现代性而来的新的权力技术——“生命权力”，这种权力不再像以前那样致力于“使人死”，而是“使人活”。<sup>[9]</sup>也就是说，与新权力技术相对应的社会治理术不再追求剥夺生命，而是转向扶植生命。在福柯的视野里，身体一直以来都是权力施展的重要“定位场所”，各种各样的规范、纪律、规章制度“都是针对身体而设的，旨在使身体变得顺从、被利用、改造和改善”。<sup>[10]</sup>生命权力的运行逻辑也建立在两个维度的“身体”之上：其一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即“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规训机制；其二是“人口的生命政治”，即

“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进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一连串的介入与调整控制。<sup>[11]</sup>具体来讲，前者针对的是“个人身体”，旨在通过一系列知识话语和控制手段构建起关于“人体”的生理常规，并将“非正常”的身体放置到监狱、军队、医院、疯人院等规训机构加以教育和矫正，使其符合规范；后者瞄准的是作为“社会身体”的人口，旨在通过建立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各种“安全技术”（techniques of security），对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财富和健康状态进行统计和监控，降低人口的总体风险，优化人口的整体生命质量。二者紧密交织、相互配合，合力形成了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术。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沿着由福柯更新的话题，继续对生命政治进行讨论。不过，不同于福柯把生命政治视作现代性产物的观点，阿甘本认为生命政治的结构一直以来都深嵌在西方的政治传统当中。他强调，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只是生命政治漫长历程中的一个极端的新阶段。<sup>[12]</sup>阿甘本从西方古老的神学当中找到了灵感，以“神圣人”（homo sacer）为关键切入点，引出了“例外状态”和“赤裸生命”（bare life）等与生命政治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简单来讲，神圣人指的是在古罗马法中，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的人。<sup>[13]</sup>他们因为犯了罪行或其他原因被排除在俗世法律之外，又因为罪恶玷污了自身而不能被祭祀，所以被排除在神法之外。在这种“双重排除”的作用下，他们被推入了一个例外状态之中，成为了无关紧要的赤裸生命，可以被任意抹杀。

通过对神圣人所处困境的探讨，阿甘本揭示了西方生命政治的“原初结构”——一种建立在“法律空间”和“法律例外空间”之上的区隔体系。自古希腊以来，人类的生命存在状态可以被划分为“zōē”和“bios”：前者与“生命”的意思相近，表达了一切生命体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后者与“生活”的意思相近，指的是“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sup>[14]</sup>“bios”天然带有政治属性，它代表着一种对高质量城邦生活的追求；而“zōē”则具有自然属性，它代表着一种城邦之外的动物性生命。所谓

的“生命政治”，就是将本属于城邦生活之外的 *zoē* 拉入到政治领域，使得“生命本身被捕捉、被征用、被控制”。<sup>[15]</sup>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后果是，一旦主权者在共同体内部划定一个区隔标记，决断出一个“例外状态”，就会有一部分生命会被推入到“法律例外空间”，从而丧失了一切政治庇护，退化为可以被随意征用的“赤裸生命”。正是由于生命政治原初结构的存在，现代社会陷入了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即每个人都成为了潜在的神圣人。<sup>[16]</sup>阿甘本断言，集中营是现代社会的典范，故意创造出恒常性的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这已成为当代国家的实践因素之一。<sup>[17]</sup>当例外状态变得常态化之后，携带着不同属性的现代人会被不同的区隔结构排除在共同体的法律保护之外，成为与社会规则格格不入的、无法被归类的赤裸生命。

从福柯到阿甘本，生命政治经历了从“常规状态”到“例外状态”的转向，其批判的焦点从作为“常态化的权力”的生命权力，重新回归在例外状态下决断生死的至高权力。福柯和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的连接，实际上构成了一幅更为完整的关于现代政治的图景——“征用生命的权力和扶植生命的权力恰恰可以毫无抵牾地联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生命权力的两个面向。换言之，生命权力既在至高例外的空间内进行操作，同时也无孔不入地展布在日常生活的常规状态中。”<sup>[18]</sup>福柯和阿甘本的思想为生命权力同时注入了否定性和肯定性的力量，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支撑起现代社会的治理大厦。否定性生命权力指代着“决断权力”，主要负责设置基准：它以总体安全的名义，通过划定例外空间的方式，区分出被捕捉的“常规生命”和被弃置的“赤裸生命”；肯定性生命权力指代着“规训权力”，主要负责加强规制：它以生命质量的名义，通过设立规范标准的方式，扶持和驯化“常规生命”。

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生命权力，特别是肯定性生命权力的运行机制已经突破了旧有的以固定空间和强制性矫正为代表的治理模式，进而进入了以“放任自由”和“适应环境”为主导的新阶段。在此阶段，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以及他们的意识、身体与外在环境表现出来

的适应性，全部都是“最大程度上适宜于现代生命政治治理技术的产品”。<sup>[19]</sup>一个人越是表现出自由，就越是受生命权力的操控。一个生命越具质量，就越容易成为生命权力所规制的对象。步入智能时代，新兴媒介技术进一步改写了生命存在的“底层语言”，人类不得不面对一个由智能技术铺设起来的数字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身体”和“生命”的概念将被注入新的意涵，围绕着生命安全、身体规范而实施的社会治理术也将呈现出新的面貌。

## 二、数字态身体：智能时代的人技互嵌

当前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型媒介技术的实践，正在将人类文明引入“媒介化生存”阶段。一方面，媒介不仅仅是连接主客体的手段，它直接参与到主体的建构中，进而打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格局。如今，媒介不但构成了有机体主体的一部分，还正在创造非有机体的新型主体。另一方面，媒介不再仅仅是受制于社会结构的一个子系统，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成为建构社会的基本动力。<sup>[20]</sup>媒介化生存的社会现实将人们推向了一个身体重塑的新历史节点——身体变得时刻与技术为伴，并不断在新的技术实践中得到发明、改造和增强。<sup>[21]</sup>

在现代社会，尽管身体作为一个“牢固的基础”，能够为人们构建起一种“可以仰赖的自我感”，但身体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定事实，而是“一个处在成为（becoming）过程中的实体，是一项应当治理打造的规划（project）”。<sup>[22]</sup>身体不是一个单一的物质躯体，而是一种多维的社会表达，它承载着政治、哲学、文化的等多层面的内容。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提出了五种身体形态：世界态身体、社会态身体、政治态身体、消费态身体、医学态身体，以此揭示出人们认识身体的五种观念或五个维度。<sup>[23]</sup>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从更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区分并讨论了工作态身体、运动态身体、社交态身体和技术态身体。<sup>[24]</sup>随着身心二元论的日渐式微，丽莎·布莱克曼（Lisa Blackman）补充了交流态身体、情感态身体和非物质态身体，<sup>[25]</sup>进一步

丰富了人们关于身体的想象。

如今，全息投影、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虚拟性技术正在蓬勃发展。在数字科技和物联网的推动下，身体成为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交流接口。人类不再被视为一个高于物的独立因素存在于数据网络之中，而是被同样转化为一个数据包，与各种物的资源链接和互动。<sup>[26]</sup>作为一种通信接口，身体的结构被分解为关联数据，然后在虚拟现实中被重构为远程感知、远程呈现、远程动觉。人体的虚拟重建不仅涉及到人体功能的转换，还涉及到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人的思维方式正处于现实世界与技术所产生的各种虚拟世界的交汇点。技术的进步改造了身体，也导致了当代社会动态和每个人的主体性的变化。<sup>[27]</sup>作为主体的人的行为已经被转化为一个数据，并在一个庞大的万物互联网中发生着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正在见证“数字态身体”（digital bodies）的诞生，人类的身体被持续而严密地包裹进数字虚拟生态中，并不断创新着身体和生命的存在形式。

数字态身体，意味着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主体概念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不稳定的、缺乏中心的主体在数字空间中扩散。<sup>[28]</sup>伴随生物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日益技术化，技术日益人格化。当人与机器的边界愈加模糊、人的主体性变得暧昧不清、人的存在变得虚实难分、人的优越地位受到挑战时，“后人类主义”以更加绚丽的姿态登上时代舞台，“赛博格”（Cyborg）也成为人们思考技术与人类关系的重要线索。<sup>[29]</sup>赛博格既作为一种技术性的生物—机器复合现实，同时也代表着“一种逾越了人—机边界，以至于无法在有机体—机器的类别关系中定位的主体性的隐喻”，多用于指代人与技术机器的密切交流与联合，人与技术的共生互嵌的关系。<sup>[30]</sup>在智能时代，身体成为一个整合了有机与无机控制论的终极媒介，人与技术的融合迈向主体层面，造就了新型主体“赛博人”。赛博人是生物性身体与技术的互嵌，它突破了人与机器的边界，整合了肉体与技术的双重逻辑。<sup>[31]</sup>

智能技术与人类的互嵌，表现在身体维度、时空维度和生态维度。身体维度的人技互嵌代表

着一种生物现实，它指的是作为物质载体的数字技术在人类肉体层面的介入，表现为技术物绑定在身体上或植入人体内部。从智能手机、穿戴设备到植入芯片，人类与智能技术正在实现前所未有的紧密联合。时空维度的人技互嵌代表着一种虚拟感知，它指的是作为“逻辑语言”的数字技术促进着人的“赛博格化”，使得人的物质实体被以数据化方式映射为“虚拟实体”。<sup>[32]</sup>智能技术不再完全沿着适应人类感知比率的方向演进，相反，人的身体却不断向技术的“语法系统”靠拢。其结果是，移动虚拟数字技术实现了对于人类时空的全面嵌入，时时刻刻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身体经验中。<sup>[33]</sup>生态维度的人机互嵌代表着一种环境结构，它指的是作为媒介环境的数字技术为生命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语境”。身体沉浸于由数字技术支撑起的社会生态，人的主体性需要经由技术才能得以显现。可谓是，我制造数据，故我在。

三个维度的人技互嵌相互交织，协同运转，用数字化的法则重新铺设了人类存在的根基。自此，身体、生命同媒介、位置、健康、信用、交通、教育等社会要素实现了数据、网络意义上的共融互通，这使得生命权力革新了与数字态身体之间的接榫点，创造出更具新意的生命政治现实。

### 三、技术去能：数字生命中的“无家可归者”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智能技术发展之于社会的影响”这一命题持有一种乐观进步的态度，认为新兴网络技术具有突破传统政治桎梏的能力，能够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形态，推动着“数字乌托邦”时代的到来。<sup>[34]</sup>然而，纵观整个人类信息发展史，貌似中立的科学技术在权力结构中被异化的境遇一再重演，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异轨构成人类历史重要的变奏曲。<sup>[35]</sup>换言之，在智能技术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背后，存在着一个被权力和政治所裹挟的“镜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权力变更了形式和模样，具备了全新的运转能量。从进步主义视角来看，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手段正在帮助人类实现多方位“赋能”（empowerment），提升着人类的生命和生活质量。

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日新月异的智能技术开始重新组织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为生命权力的展布开拓了全新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造成了特定人群“去能”(disempowerment)。如果说“技术赋能”体现了人类与技术和谐共进的美好愿景,那么“技术去能”便代表着技术在数字空间中为人类带来的新一轮异化。生命政治正是在这种看似悖论性的镜像结构中不断生长,最终成为一股融入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强大力量。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依靠“赋能”和“去能”之间的“镜像关系”,更加全面地把握智能时代生命权力的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

简单来讲,赋能指的是个体或者组织通过获取意识、技能、知识与经验,对客观环境与条件拥有更强的控制能力来取代无力感的过程。<sup>[36]</sup>进入智能时代,“技术赋能”或“数字赋能”成为人们思考“人类-技术-政治-社会”关系的重要路径,二者均意味着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不断解构和重构着既有的权力结构,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增强了人们把握世界、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sup>[37]</sup>

智能时代,人们所面对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先导的最先进、最发达的科学技术。在此环境中,技术赋能表现出以下几种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近”:智能技术往往采用更加贴合人类使用习惯的方式,减少人们媒介接触的突兀感、简化身体与媒介物之间的操作路径。触屏时代,以手机为代表的便携式媒介物实现了从按键设计到滑屏设计的转变,逐渐突破由年龄、文化水平等因素造成的“使用壁垒”。从按键到触屏的飞跃实际上是一场设计语言的革命,它明确了手指的滑动与点击作为人与手机交互的最佳方式,使得复杂的操作路径被扁平化的图标代替,从而消解了传统的技术门槛,加深了人们与媒介技术物之间的紧密连接。<sup>[38]</sup>第二个特点是“快”:5G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打破了原有网络速度和容量的限制,进一步缩短了终端和云端数据传输所需的时间,使得虚拟空间的场景转换和数据使用变得更加迅速。<sup>[39]</sup>此外,智能时代的科技新速度还有效弥补了由网速不足引起的间断感和缓冲

感,使得人们形成了一种连续的,甚至是加速的使用感觉。第三个特点是“宽”:新兴技术开辟了人类存在的新空间,拓展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价值尺度。智能时代,通过新兴传播技术搭建起来的智能神经中枢具有更好的普及性、渗透性和便利性,它能够串联起政务、教育、医疗、交通、娱乐等各个智能系统,用数据化和网络化的方式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加人们参与公共事务、优化日常生活的渠道和机会。第四个特点是“准”:智能时代,媒介技术正在不断学习,催促着自身“语法”向更加智慧化的方向靠拢,进而精准贴近人们独具特色的个人需求。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智能推荐、深度学习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使得网络像一个筛网,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智能化挖掘与处理,并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更加精准的推荐。用户可以通过各种终端随时随地享受这种个性化服务和定制化体验。<sup>[40]</sup>

承上所言,技术赋能意味着智能技术创造着生命“存在”的多样性。根据“赋能”与“去能”之间的“镜像关系”,技术去能也就意味着智能技术放大了人类“死亡”的可能性。凯瑟琳·米尔斯曾断言,死亡是生命权力运作的根基。“恰恰是通过唤起死亡之风险、唤起在生命中死亡之内在性,生命权力才得以操作。因为正是那始终在场的死亡之威胁,正当化与合理化了对于人口生命与个体生命的规制性介入。”<sup>[41]</sup>诚然,智能时代的“死亡”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指代肉体的消亡,它通常意味着数字生命遭到废弃的可能性。技术对于人类的全面介入,表明人类已经被数字环境全面包裹,人的生命似乎必须经由以一般数据(general data)为根基的数字化平台转译之后,才能具有社会价值和意义,才能在既定的区域中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在此情形下,数字化的形式第一次以最赤裸的方式成为架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利器,人类不仅被还原为物,还进一步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数值关系。<sup>[42]</sup>如今,人类的身体已经维持“自证”,必须要依靠数字证据才能证明自身。失去了数字技术的加持,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在智能社会的重要存在方式。因此,更进一步讲,“技术去能”意味着新技术的涌入以及技术环境的

搭建可能剥夺人类的个人权力和生存能力，迫使人们离开曾经习以为常的“技术居所”。在这样的趋势下，那些不能适应新技术语法和技术生态的人将被迫成为智能时代的“无家可归者”，他们类似于阿甘本笔下的“赤裸生命”，以被排除、被弃置的方式纳入到共同体中。

技术的迭代，或者说技术与权力的融合形式的迭代，正在创造出一个不断扣接的生命政治链条，成为智能时代开启和维持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的关键要素。一方面，新技术能够作为新的例外状态开启之后的重要支撑，人们需要借助新技术来阐释自己，以维持自己高安全性、高质量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技术本身也是诱因，技术的革新与应用，可能迫使旧技术生态成为例外状态。技术的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人类社会对于技术入驻形成的依赖，使得人们被困在不断加速的数字洪流中。从一种社会发展的视野来考量，人类身体的私密数据在“数字知识经济”（digital knowledge economy）中被赋予了重要的研究价值，<sup>[43]</sup>经由技术所转化出来的身体数据若不让人自由利用的话，它便是一种道德上的恶，因为它阻碍了数字经济和智能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进入智能时代，“数字身体”的价值可能会大于生物身体。因此，在技术赋权的美好愿景中隐藏着这样一种悖论：技术越是革新，就越容易生产出新的价值标准，引发身体与技术之间的断裂，加深社会的区隔体系，从而导致那些没有意愿或没有能力紧跟技术节奏的人，成为数字生命的“他者”，在智能技术环境中寸步难行。更进一步讲，从“镜像关系”反射过来的技术去能，也因为“近”“快”“宽”“准”的特点而具备了全新的意涵。

“近”，意味着在生命政治在身体与技术的紧密关系中找到了运作空间。在福柯和阿甘本的视野里，否定性生命权力扎根于“自然的身体”，它通常由进化论、病理学、生物学的知识来设定标准，通过知识论层面的区隔对“患病的他者”实施“去资格化”处理，以维持社会的总体安全和健康。<sup>[44]</sup>如今，智能时代的否定性生命权力已经完全融入到“数字态身体”中，身体的技术适应性

成为了新的准入标准。生命权力通过人技融合层面的区隔来搭建社会的安全体系和健康机制，并以此重构了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当技术与身体之“近”成为常态时，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远离技术的人，必然会被这套智能技术系统支撑起来的安全机制识别为“异物”，从而遭到排斥和弃置。

“快”，意味着生命权力俘获每个个体的效率变得更高。当技术成为人们习以为常，无法剥离的存在之后。高速的数据传输使得人们所感受到的卡顿感趋于无形，促使物理现实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快速转变成为“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sup>[45]</sup>如今，智能技术能够无视介质差异，允许计算机通过一个接口来对另一个接口进行数字模拟，<sup>[46]</sup>帮助虚拟之物侵入、标注、修改、覆盖、占领现实空间。虚拟时空不再有明确的边界，而是不断进击、四处弥漫<sup>[47]</sup>。“混合现实”具有的强大标注能力，能够成为生命权力具象化的指引符。在位置媒介（locative media）技术的加持下，原有的物理空间成为关联现实与虚拟空间的媒介界面。<sup>[48]</sup>身体与技术、虚拟与现实的交互将原本漫无目的的个人行为转译为充满意义的故事，人类正是在这种故事化和游戏性的实践中得到规范和牵引。

“宽”，意味着生命权力对于人的介入有了更宽阔的施展疆土，它使得每个人客观上背负着更多的“技能压力”。从本质意义上讲，“数字赋能要求人们必须掌握至少一门数字技术，技术决定着信息拥有量和能否体验新的赋能途径。技术拥有者和不拥有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sup>[49]</sup>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智能技术系统之后，人类将被迫不断地学习与新技术“对话”的“语言技能”，不断地变换话语方式。因此，表面上，智能技术充当着人类的生活管家，帮助人们料理各式各样的事务，还悠闲于个人。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智能时代“并不是闲适的时代，而是绩效的时代”，它“将工作时间绝对化”。<sup>[50]</sup>数字态身体成为了一幅忙碌的身体，它的工作就是持续不断地同技术规则打交道。

“准”，意味着生命权力施展变得更为精准智能，能够因人而异地变换表现形式。智能技术提

供的个性化服务，能够满足每个人独特的需求，同时也使得基准和规范成为了一种“私人订制”，更能被人们识别。智能时代的否定性生命权力，客观上调动起人们更加丰富的生活策略，推动着“自觉政治”的出场。前智能时代，例外状态的发展路径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能力，人们只能保持一种消极的、附和式的姿态，等待着新区隔体系的生成。在智能技术的支撑下，例外状态已经变成了一种半封闭的“黑箱”，尽管其具体的运行规范并不明晰，但人们可以通过一次接一次的“数据投喂”大致描画出它的发展趋向。由此，个体变得更加自觉，能够用积极的、创造式的方式“预测”主动探索权力在技术和身体维度上的偏好，并以此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行动和生活策略。

#### 四、多维透视：如影随形的权力之眼

智能时代，人与技术的交织关系正在加速着人类生命本质和存在方式的更变，也使得旧有的“主体性”概念产生动摇。在现代生命政治的理论视野中，人被理解为“欲求主体”。“物性欲求成为政治的起点、目的、对象和动力，体现物性欲求的利益、欲望和身体可以看成是生命政治自我展开的基本环节。”<sup>[51]</sup>生命政治的本质是对人的物性生命的承认和捍卫，它以维护和改善物性生命为根本目的。福柯强调，生命权力所涉及的总体策略和干预手段均围绕人的“生物特征”而成型。<sup>[52]</sup>在他看来，肯定性生命权力（规训权力）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权力技术对“人”的监控、扶植、评估、矫正和优化，这通常特指现代国家建立了一套针对生命的监控机制，它以学校、监狱、医院等为生命权力的施行场所。这些场所仿效了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监狱”空间构想和规训策略：“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接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sup>[53]</sup>在技术与空间的合力铸造下，人的身体遭到视觉俘获，被置于一个“看”与“被看”的权力结构中：权力的眼睛躲藏在暗处，致使每个人都背负着被观看的压力，进而自觉地转变成自己的监视者。<sup>[54]</sup>

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构序里，权力之“看”既是一种物理空间和生物视觉相配合的结构性观看，同时也是由生物学、统计学支撑起来的“知识—权力”的凝视。随着权力的目光由“个人身体”转向“社会身体”，统计学开始充当起一种针对人口进行分析的规训手段。<sup>[55]</sup>人口统计学不仅仅为国家提供了关于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年龄分布、地域分布等有关生命质量的数据，同时还为权力标准和规范的确立提供了科学依据。不过，这种由生物统计数据构建起来的安全技术并不够全面和精确，权力之眼将自己限定在生物机体的视域内，其凭借统计学所捕捉到的身体与生命仍然是较为笼统抽象的。而对于生命权力而言，一个完善的社会监控机制需要对大量的细节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和分析，这只有在进入到高度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时代才成为可能。<sup>[56]</sup>这意味着，智能时代监控机制已经从较为粗略的统筹规划升级成更加细致的“精打细算”。在新兴媒介技术的加持下，生命权力所捕捉的对象不再是一个客观的生物有机体，而是“一组由人、技术、世界构成的关系”。<sup>[57]</sup>这样一来，权力之眼便能看得更广、更深、更清晰。

如前文所述，“数字态身体”映射出新兴技术对于人类的生物完整性、认知完整性、信息完整性和自治完整性的重新塑造的前景，智能技术使得社会法则在身体维度、时空维度和生态维度遭到改写，也使得更加细微、更加精准、更加全面的监控机制被逐渐建立起来。在监控机制的构建过程中，视觉资料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为智能社会的生命政治供应着能量。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曾指出，对于战争而言，影像补给是军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sup>[58]</sup>同样，对于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而言，其工作重心就是要组建起一套智能化监视系统，完善视觉后勤体系，不断开发新的“视点”、攫取各类视觉资源，以保障规训权力的高效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监控机制的智能创新，本质上源于权力之眼所拥有的补给资料和补给方式的创新。整体而言，智能时代的监控机制呈现出“多维透视”的特点，开创了含有多种观看结构和观看形式的规训手段，将个体生命的方方面面都置于权力的目光之下。就主体维度

而言,规训权力表现为建立在个性化数据之上的“全面窥视”;就时间维度而言,规训权力表现为能够记录过去、阐释当下、预测未来的“全程检视”;就空间维度而言,规训权力表现为以“合成视觉”为模型的“全员互视”。

主体维度的“全面窥视”,意味着规训权力通过一种内窥式的眼光,对个体进行从肉体到精神层面的细致挖掘。在福柯所处的时代,以人口统计学为基础的规训技术略显粗糙,无法抵达更隐蔽的精神层面。在这点上,统计学和大数据是截然不同的。“大数据不仅能刻画出个人的,也能刻画出群体的心理图析,还可能照亮心灵深处,实现对潜意识的利用。”<sup>[69]</sup>大数据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捕捉并结构化海量数据,以此来发掘万物的普遍联系,它不再像统计学一样着眼于数据的“平均值”,而是更加关注“特殊值”或“精准值”。智能时代,规训权力的施行越来越沿着数据的逻辑展开,开始用数字化的方式改变个人的自我认知。智能手机、数字腕表、植入装置等已经实现对个人身体的全面监控,让人们习惯于用数据驱动生命、用数字量化自我。<sup>[60]</sup>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认为,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在推动着我们走入“微粒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的潜在欲望等一切有关人类生命的东西都将以更精细、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价。<sup>[61]</sup>“数据越多,我们的特征就越清晰可见,数据越丰富,独特的个体就越多,网络化程度越高,个体化的程度也就越高。”<sup>[62]</sup>就此,规训权力实现了从“统一治理”到“个性化治理”的跃迁,沿着大数据提供的深度相关性不断开掘,对人的身体与精神展开全方位的持续窥探。

时间维度的“全程检视”,意味着规训权力通过一种回溯式和预见式的眼光,实现了对于个体生命历程的整体俘获。智能时代,人类的身体与生命遭到数字生态的全面包裹,权力之眼对人类的窥探有机会完成从出生到死亡的全程运算。如前所述,当智能技术所铺设的数字生态系统趋于稳固之后,人的生命必须以数字形态“出场”,才能获取社会合法性。智能化传播成为主要传播形

式,一切按智能网络程序进行,每个信息以及每个信息接受者都在这个智能网络中生存。<sup>[63]</sup>这一智能网络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支撑,承担着普遍记录、解释和推算的重任,能够基于过去数据模型的预测性分析,用以为当下的行动提供一种规范性的未来向度。<sup>[64]</sup>换言之,搭载在智能网络上的权力之眼能够记录每个人的历史、捕捉每个人的现状、预测每个人的未来,进而描摹出每个人立体而全面的人生画像。这样的规训权力不再迫使个体向明确的一致性规范看齐,而是帮助他们书写个性化的“生命故事”。智能网络为每个人都量身定做了一套专属的治理方案,预测人们下一步该做什么,致使“数字态身体”成为了一个被智能系统持续引导的身体。“我们变成了数据下的特定的独特对象,而智能控制能够精准地判断我们的需求和行为,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sup>[65]</sup>

空间维度的“全员互视”,意味着规训权力通过占据“基脚视点”,探索社会各个角落,最终实现对于“隐秘空间”的征服。智能时代是一个“合成视觉”(synthetic vision)的时代,<sup>[66]</sup>各式各样的身体佩戴物和植入物开始在视觉维度上对人体实施改造,将自然视野(view)与人工界面(interface)融为一体。<sup>[67]</sup>“合成视觉”能够有效补足被监控探头和无人机等传统视觉补给设备遗漏的缝隙空间,帮助权力的目光辐射到更广阔和更隐蔽的疆域。毋宁说,负载着视觉技术的人类身体,转而成为了一种移动穿梭式的监控装置,能够沿着“弥散式补给”的逻辑扩充权力的视觉资源。借助有无数个体组成的装置,权力的眼睛能够有效抵达那些碎片化的、被遮挡的空间,亦能全方位捕捉被规训的身体。人与技术的社会化共存,使得规训权力超越了福柯笔下“少数人观看多数人”的“全景监狱”结构,并转向托马斯·马蒂斯(Thomas Mathiesen)眼中“多数人看少数人”的“对视监狱”以及杰弗里·罗森(Jeffery Rosen)眼中“多数人看多数人”的“全视监狱”模式。<sup>[68]</sup>当人与技术实现了生物学层面的共存之后,这种多数人针对多数人的观看也具有了新的意涵。“合成视觉”所凸显的“全员互视”,不再是自然人之于自然人的观看,更是“技术-人”之于“技术-人”的

观看。技术系统对于人类视觉的入侵,使得原本漫不经心、一带而过的“瞥视”行为走向消亡,让任何一次观看都负载了生命政治价值。人类在社会空间中的流动加深了“全面窥视”和“全程检视”的程度,致使个体不仅暴露在自己的植入设备中,也暴露在他人的技术目光里。至此,权力之眼同时穿透了身体空间与物理空间,实现了与每个个体的精准对接和智能引导。

## 五、结语

围绕身体和生命的规制问题,福柯与阿甘本展开了他们有关生命政治的论述。二者的思想汇聚在一起,共同构筑起融合了否定性生命权力(决断权力)和肯定性生命权力(规训权力)的生命政治图景。步入智能时代,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深刻改写了社会现实,重塑了生命政治格局。当人技互嵌的数字生态日渐成型,人类的自然身体开始向“数字态身体”转变,生命政治便具备了全新的精神内核与实践指向。本文认为,“技术去能”代表着否定性生命权力的决断,“多维透视”则代表着肯定性生命权力的施展。二者互为增补,合力构成了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图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离开了技术工具与数字逻辑,我们就失去了人性的证明,我们将不能理解有关自己的知识、抱负和价值。<sup>[69]</sup>我们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微动作、每一丝精神欲望,都被遍在的权力之眼尽收眼底。我们看似自由,却无往不在数字生态所型塑的动态枷锁之中。

就近而言,随着数字媒介和智能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身体和技术所负载的理论价值将变得更加深厚,而生命政治亦会成为我们审视智能社会的一个窗口。此外,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为我们“重新发现”生命政治以及深入挖掘相关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生命政治思想之于人类社会更深层的价值和意义,仍有待更多赋有时代眼光、具备回溯性思维和前瞻视野的研究深入开掘。

## 参考文献

[1]沙森. 马斯克演示芯片植入猪脑新技术[N]. 中国科学

报,2020-08-31(001).

[2]刘涛, 汤志豪. 媒介观念的多维审视:2019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27(004).

[3]张灿. 身体的设计与建构——身体干预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研究[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06): 68-73.

[4][31]孙玮. 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J]. 新闻记者,2018(06): 4-11.

[5]郝志昌. 数字资本主义与现代生命政治的接榫[J]. 甘肃社会科学,2020(01): 167-173.

[6]Campbell T, Sitze A. Biopolitics: An encounter [C]// Campbell T, Sitze A (eds.). Biopolitics: A reader,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40.

[7]马中英, 韩璞庚. 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未来走向[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2): 29-36.

[8]吴冠军. “生命政治”论的隐秘线索:一个思想史的考察[J]. 教学与研究, 2015(01): 53-62.

[9](法)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1976)[M]. 钱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64-265.

[10]莫伟民.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64.

[11](法)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0-101.

[12]吴冠军. 生命政治:在福柯与阿甘本之间[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01): 93-99.

[13][14][16](意)吉奥乔·阿甘本.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 吴冠军,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3;3;159.

[15][18]吴冠军. 译者导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M]// (意)吉奥乔·阿甘本.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吴冠军,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34;46-47.

[17](意)吉奥乔·阿甘本. 例外状态[M]. 薛熙平,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5.

[19]蓝江. 赤裸生命与被生产的肉身: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发凡[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02): 47-55.

[20]孙玮. 媒介化生存:文明转型与新型人类的诞生[J]. 探索与争鸣, 2020(06): 15-17+157.

[21]Blackman L. The Body: The Key Concepts [M]. New York: Berg, 2008: 2.

[22](英)克里斯·希林. 身体与社会理论[M]. 李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5.

[23](加)约翰·奥尼尔. 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M]. 李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

[24](英)克里斯·希林. 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 李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1.

[25]Blackman L. The Body: The Key Concepts [M]. New York: Berg, 2008: 9-12; Blackman L. Immaterial bodies: Affect, embodiment, mediation[M]. London: Sage, 2012: xv.

[26]蓝江. 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通信技术变革的哲学效应[J]. 探索与争鸣, 2019(09): 37-40.

[27]刘国强, 韩璐. 从身体中介到人机互嵌:技术演进与身体传播研究的变迁[J]. 当代传播, 2020(02): 73-77+88.

[28]Negru T. Rethinking the human body in the digital age [J]. 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2013, 9(01):

123-132.

[29]张净雨. 数字后人类身体的美学建构与意义生成[J]. 当代电影, 2020(07): 152-158.

[30]阮云星, 高英策. 赛博格人类学: 信息时代的“控制论有机体”隐喻与智识生产[J]. 开放时代, 2020(01): 162-175+9.

[32]彭兰. 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J]. 新闻记者, 2019(12): 4-12.

[33]孙玮. 交流者的身体: 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 国际新闻界, 2018(12): 83-103.

[34](美)尼古拉斯·卡尔. 数字乌托邦: 一部数字时代的尖锐反思史[M]. 姜忠伟,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VII.

[35]唐永, 张明, 陈明. 权力结构中的数据简史与生命政治范式——以“数字”经济的时间演进为例[J]. 东南学术, 2019(03): 45-53.

[36]Perkins D D, Zimmerman M A. Empower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5, 23(5): 569-579.

[37]Mäkinen M. Digital empowerment as a process for enhancing citizens' participation[J]. E-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 2006, 3(3): 381-395.

[38]王建磊. APP: 技术赋权的回归[J]. 新闻大学, 2016(06): 59-63+149.

[39]郭小平, 陈亦珂. 技术赋能: 5G 时代视听传播的媒介创新与数字审美[J]. 电视研究, 2019(04): 8-11.

[40]杜智涛, 张丹丹. 技术赋能与权力相变: 网络政治生态的演进[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1): 26-31.

[41] Mills C J. Biopolitics, liberal eugenics, and nihilism[M] // Giorgio Agamben: Sovereignty and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0-202.

[42]蓝江. 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J]. 山东社会科学, 2017(08): 5-13.

[43]Sanders R. Self-tracking in the digital era: Biopower, patriarchy, and the new biometric body projects [J]. Body & Society, 2017, 23(1): 36-63.

[44]刘国强, 汤志豪. 去蔽勒鹿: 身体规制与多维的集群“非理性”[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01): 134-144.

[45]Hansen M B N. Bodies in code: Interfaces with digital media[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6.

[46](美)W.J.T. 米歇尔, (美)马克·B.N. 汉森. 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M]. 肖腊梅, 胡晓华,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46.

[47]施畅. 赛博格的眼睛: 后人类视界及其视觉政治[J]. 文

艺研究, 2019(08): 114-126.

[48]李耘耕. 从列斐伏尔到位置媒介的兴起: 一种空间媒介观的理论谱系[J]. 国际新闻界, 2019(11): 6-23.

[49]陈海贝, 卓翔芝. 数字赋能研究综述[J]. 图书馆论坛, 2019(06): 53-60+132.

[50](德)韩炳哲. 在群中: 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 程巍,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51.

[51]罗莺. 现代主体性政治的逻辑终点——政治叙事中的生命政治概念及其环节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02): 5-13+158.

[52][55](法)米歇尔·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M]. 钱翰, 陈晓径,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 64.

[53](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231.

[54](法)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 严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58.

[56][65]蓝江. 智能时代的数字—生命政治[J]. 江海学刊, 2020(01): 119-127+255.

[57]骆世查. 媒介环境即生命政治——数字时代的“有机体”话语与主体追问[J]. 新闻界, 2018(06): 73-82.

[58](法) 保罗·维利里奥. 战争与电影: 知觉的后力学[M]. 孟晖,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

[59](德)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 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力技术[M]. 关玉红,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30.

[60]Wolf G. The data-driven life[EB/OL]. (2010-05-02). <http://www.nytimes.com/2010/05/02/magazine/02self-measurement-t.html>.

[61][62](德)克里斯托夫·库克里克. 微粒社会[M]. 黄昆, 夏柯,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VI-VII; 10.

[63]陈龙. 文化转型: 开启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化[J]. 探索与争鸣, 2020(06): 9-11+157.

[64](美)托马斯·达文波特. 数据化转型: 从 0 到 1 成为数据独角兽[M]. 盛杨灿,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230.

[66](法)保罗·维利里奥. 视觉机器[M]. 张新木, 魏舒,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22.

[67]Azuma R T. A survey of augmented reality[J]. Presence: Teleoperators & Virtual Environments, 1997, 6(4): 355-385.

[68]刘涛. 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 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J]. 国际新闻界, 2014(05): 48-63.

[69](德)克里斯托夫·库克里克. 微粒社会[M]. 黄昆, 夏柯,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181.

## “Technology Disempowerment” and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Prospect of Biopolitic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Tang Zhihao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regulation of body and life, Foucault and Agamben started their discussion about biopolitics. The thoughts of them come together to build a picture of biopolitics which integrates negative biopower (decision power)

(下转第 94 页)

# 突破“雅俗之争”： “武器论”与中国摄影观念的范式转移<sup>1)</sup>

赵鹏

**摘要**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逐渐接触摄影并开展了民族性的摄影活动。由于机械性和作为肖像记录的功能性，摄影最初被称为“照小像”，不登大雅之堂。以刘半农为首的画意摄影倡导者，采用中国画论当中的“写意”传统对摄影进行了“雅俗”的判分，建立了以中国画论为基础的摄影理论，提升了摄影的艺术地位。但作为复制技术，摄影对艺术品原真性的消解本身就带有大众文化的特质，采用画论传统对摄影进行“雅俗”判分仍是将其禁锢于传统艺术中绘画附属者的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风起云涌的左翼思潮影响下，沙飞提出“摄影武器论”，并在中共领导下创办《晋察冀画报》，开展系统的摄影实践，采用政治的“进步”与“反动”而非“雅俗”的标准判分摄影实践，完成了中国摄影史的一个重要转折。

**关键词** 画意摄影；刘半农；郎静山；沙飞；摄影武器论；晋察冀画报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赵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 一、亟待提高的摄影地位

在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之后的第二年，中英鸦片战争打响。清政府失败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五口通商做出了明晰的规定。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摄影术也随之进入了中国的部分城市。从外国人来中国采风，到零星的商业摄影行为在广州和澳门等地出现，再到1845年以营利为目的的照相馆在香港开业<sup>[1]</sup>，摄影术跟中国社会的联系日趋紧密。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由于看到了摄影术对肖像画可能产生的影响，很多中国的肖像画师也开始学习这一新兴技术，南方各通商口岸逐渐出现很多中国人自己开设的照相馆，其中广州和上海是两个重镇。<sup>[2]</sup>中国人逐渐由被观看的客体，转而成成为摄影技术的使用者和消费者。时及光绪初年，照相馆在中国北方也逐渐落地生根。<sup>[3]</sup>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摄影跟大众的结合还是以肖像拍摄为主，此外至多有一些风景摄影走入大众视野。因其与传统画像相比，对人像刻画的纤毫毕现及所需时间、金钱成本的低廉，摄影越来越成为人们进行影像留存的重要方式。以人像拍照为主要经营内容的照相馆从而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藉鲁迅的名篇《论照相之类》可见，到19世纪末，连绍兴这种小城镇都有了常设的照相馆。<sup>[4]</sup>因为在过去把画师的肖像画创作称为“画小像”，所以作为对这种功能的替代，

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念结构与演进研究”(18CXW002)。

摄影被人们称作“照小像”。而正因为从西方传入的摄影只在肖像留存的功能层面为人所认知和使用，所以当时的社会并不把摄影看做一种艺术形式。尤其是在上层社会和知识精英群体中，人们更多地还是把摄影理解为一种“奇技淫巧”，对摄影并不重视，甚至还十分轻薄，将“照小像”作为一种对摄影的贬低称呼，常常使用。

跟绘画相比，摄影的便捷和机械性也弱化了摄影师的作用，因为在摄影的过程中看不出摄影师在影像制作中所体现的任何高深技艺。所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摄影太容易了：“无论何人，五分钟之内保可学会。”<sup>[9]</sup>而既然是一种容易掌握的技艺，那么从事这项技艺的人自然也很难得到尊重。“人家请了个画师来，当然要由主人亲自招呼……先请坐，次请茶，再请烟……亦许还端出四碟子的无聊点心来。”<sup>[10]</sup>而“照相的”却被怎样对待呢？“来了么？叫门房里等。”没有人招待，只能在门房里等着主人。“于是乎劳你驾，稀臭的门房里请你坐一下”，还不仅如此，“门房大爷的底子钱，也就不得不给。”而且主人还迟迟不出现，“说是三点钟照，看看已经四点了，上头还是睬也不睬。”一直可能要拖个数小时，快到傍晚光不够了的时候，主人才“吃得酒醉糊涂的滚也滚的出来”<sup>[11]</sup>。这一段话虽然是有些文学性的夸张，但是倒是将当时摄影师地位的低下，不被社会尊重体现得淋漓尽致。

## 二、摄影的高雅化运动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摄影师并不被知识精英所尊重，摄影术只被当做一种“奇技淫巧”而存在，被排斥在高雅文化之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术逐渐与市民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考察，上海地区最早的华人照相馆可以追溯到1853年的丽昌。<sup>[12]</sup>而到了1918年，上海地区当时的照相馆就有39家，这39家的统计还都是华商和洋商所开的大型照相馆，中小型的还未入列，至1925年，上海已达53家之多。1930年广州有33家照相馆，重庆有15家，贵阳12家，宁波有13家，北京达到61家照相馆。<sup>[13]</sup>照相馆的大规模出现，足以从一个

侧面说明当时蓬勃兴起的摄影消费，摄影术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于之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与此相伴而生的，是爱好摄影并且从事摄影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尤为重要的是，有一些知识精英也成为了摄影爱好者，他们对摄影的喜好和摄影术在知识精英群体中所受到的普遍轻视的矛盾让他们有了提高摄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地位的迫切要求。

### （一）作为策略的雅俗区分

二十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对中国摄影艺术而言是一个重要时期。可以说，在这十多年当中，摄影逐渐从一种“奇技淫巧”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被广泛接受的艺术门类。在这一过程中，握有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与他们构建的摄影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7年，作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刘半农撰写了《半农谈影》，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本探索摄影艺术的理论著作。<sup>[14]</sup>这本书开篇就引用他好朋友疑古玄同（即钱玄同）的话：“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sup>[15]</sup>并且他还不直接立即就反对这个说法，他说这种说法不仅是不爱摄影的人有，就连他这种爱摄影的人，“也肯大承而特认”<sup>[16]</sup>。这就说明这样的说法是有社会基础的，在当时的社会中很可能是一种普遍的认识。而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便是要破除这种说法，要把摄影抬入艺术的殿堂，要提高摄影爱好者的地位。

很显然，只有让摄影摆脱“五分钟即可学会”和简单机械操作的刻板印象，才有可能让摄影迈入艺术的殿堂。为此，刘半农的策略是将摄影进行区分，提出了一个评价摄影作品好坏的标准，他分出来三种摄影的类型，即照相馆的摄影、写真的摄影与写意的摄影，并且认为这三种摄影有高下之分。

这样的一种区分模式实际上秉承了中国传统中一贯存在的雅俗判别方式，即将一种艺术形式进行精英（雅）和大众化（俗）的区分，并通过与流行的隔绝来达到艺术精英化、高雅化的目的。在这三种摄影中，“照相馆摄影”无疑是最大众化的一种类型，而这种类型在刘半农看来是最最不堪的一种。他举例说，有人曾经评价他的作品很好，说“照相馆也不过如此”，人家是恭维到了

十二分，在他“却气到了十二分以上”。<sup>[13]</sup>而原因在于，他认为照相馆的作品比较死板，“男的必定肥头胖耳，女的必定粉雕玉琢”<sup>[14]</sup>，往往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和套路进行拍摄，而一旦缺少了创造，也就谈不上艺术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他注意到了照相馆如此拍摄的原因，也就是他所称的照相馆的难处，那就是大众的审美如此：“既要营业，就不得不听社会的使唤。”<sup>[15]</sup>正因为照相馆遵循了大众的审美方式，是最为大众化的一种摄影类型，所以导致了照相馆摄影的“不堪”。

但摄影的大众化呈现并不只有照相馆摄影一种，他后面则对“写真”和“写意”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区分。他将“写真”和“写意”的照相又称为“复写的”和“非复写的”。“复写的”摄影，其目的“在于清楚，在于能把实物的形态，的的切切的记载下来”<sup>[16]</sup>。这是一种记录式的样态，追求的是描摹形似。而“非复写的”则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助照相表露出来”<sup>[17]</sup>。这就使照相成为一种营造意境的空间，使之带有意蕴蕴藉的可能。而他在后面又用“技”和“艺”来说明这两种摄影，认为一种只有技术的表达，一种却有艺术的内涵存在。他虽然在文章中说“并不菲薄写真照相”，而且甚至说以为写真才是照相的“正用”，但是他却说他想在照相中找出一些“美”来，说写真照相需要的是工夫，而写意照相则还需要一些天才。<sup>[18]</sup>刘半农对“写意”的推崇其实就很明显了。

刘半农在此实际上沿用了中国传统中对“工匠”和“大师”的区分模式。中国自古以来，尤其是在五代以后，在绘画中就有明显的重写意、轻写实的倾向。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而宋元之后文人画的兴起，更是把手中笔墨当做是心中丘壑的描绘工具，而如果只能是将现实景物一模一样地绘制下来，那只能被看做是建筑工匠的图纸，而登不了精英阶层艺术鉴赏的殿堂。如果一个人绘画的技艺高超，画出来的神形“毕肖”，还只能是一个画工，属于巫医乐师百工之流，社会地位是底下的，而只有当一个人有足够高超的学养，才能够让绘画进入更加高深的“道”的层

面，画出来的画才能够有审美的价值。刘半农用“技”和“艺”来描述“写真”和“写意”，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技”与“道”、“匠”与“家”的二元对立一脉相承，他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高雅化策略和中国传统推崇意境蕴藉的审美范式，来建构这个来自西方的摄影的艺术性。通过“意境”和“写意”的提出，他实际上把中国传统中学养和艺术的结合加入到了摄影这个艺术形式之中，这就让摄影的批评掌握在了一小批有较高学养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手中，而通过跟绘画中“企图将他们的艺术跟一般流行者区隔开来”<sup>[19]</sup>一样的策略，实现了摄影艺术的高雅化，也就提高了他们作为文人摄影师的地位。

## （二）画意摄影的艺术实践

刘半农写意照相的理论确实提出了摄影艺术性的一种可能，为摄影地位的提高作出了贡献。而这种摄影精英化和高雅化的策略在当时是非常有效的，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画意摄影与这个理论互为表里。如果说刘半农的摄影理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美术理论，那么画意摄影的艺术实践则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观看及批评方式在摄影中的延续。

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最为广大的两个摄影团体，一个是在北京的光社，一个就是在上海的华社。这两个社团对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光社在北京中央公园的展览自1924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市民前往观看，据说第一次摄影展览开幕后，6月14日至15日两天内就有五六千人的参观，京城各界人士各方面的好评不断。<sup>[20]</sup>除此之外，光社还编辑出版有《北京光社年鉴》，为艺术摄影的推广做了贡献。而位于上海，1928年成立的中华摄影学社（华社）也通过办展和办刊的方式扩大了美术摄影的影响。

刘半农是光社的成员之一，他的摄影理论在上文已经有过讨论，而华社的代表成员就是“集锦摄影”的开创者郎静山。郎静山的作品一直到现在都十分有影响力，在当时也是被推崇至极，在国际上都获得认可。郎静山的作品在画意摄影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跟中国的水墨画几乎如

出一辙。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湖山览胜》《坐看云起时》《春树奇峰》《晓汲清江》<sup>[21]</sup>远去看去真会误以为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画。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此亦即吾国绘画之理法,今日始实施于照相者也”<sup>[22]</sup>。而他所使用的“集锦照相”的方法,也就是跟多重曝光类似的图像拼接,形成一种类似于散点透视的效果。这也确实是一种适合中国画意的摄影表达方式,《湖山览胜》就是典型的通过图像拼接来模仿传统文人画的长卷,而《春树奇峰》则模仿的是中堂的构图。除此之外,他甚至会模仿中国画的画外装饰,在摄影作品的空白处用毛笔题写序跋,还印有闲章。

此外,他还将中国绘画中的重要“谢赫六法”运用到摄影的创作和批评中,比如他进行集锦摄影的创作就是因为看到了西方摄影师的这个方法跟“谢赫六法”中的“经营位置”“传模移写”这两个方法类似<sup>[23]</sup>,而且在他之后的摄影理论著作《摄影与中国绘画艺术》<sup>[24]</sup>中,更是提出提升摄影艺术性的标准在于“色调”“透视”“位置”“气韵”“品格”五个方面,这明显也是脱胎于“谢赫六法”。可以说对于用摄影这个工具来体现中国画的画意这个目的,他从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做出了归纳,也在刘半农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而且在当时,画意摄影的主要拍摄对象也是承接自传统文人画的符号,郎静山不仅在整个摄影构图中就采用的中国绘画的模式,在每一个部分也都是安排了中国画中常见的石、树、山的景致。其他的并没有尝试“集锦照相”法的摄影师所拍摄的摄影作品,也往往带有传统文人画意趣和典型符号,“‘船行水上’‘渔人泛舟’等中国文人画中常见的母题在摄影作品中也十分常见。”<sup>[25]</sup>顾铮更是将刘半农和陶冷月的摄影实践比喻为摄影的“新瓶”与传统的“旧酒”的统一。<sup>[26]</sup>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中国摄影师对摄影对象的选择来自于中国的绘画传统,尤其是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传统,而时人建构的摄影理论则来自于中国艺术传统的雅俗之分。摄影理论中的重写意轻写实,重学养轻技术,加上通过特定的拍摄对象来呈现传统文人画意境的摄影实践,都是传统雅俗之分

的现代延续。

刘半农对摄影作品进行写真和写意的区分为画意摄影的艺术表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以中国传统绘画为美学依归的画意摄影,其具体实践也标志着当时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摄影界对这个评价标准的认同。可以说,这些文人知识分子对摄影艺术性的发现和表达作出了贡献,对摄影爱好者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帮助。在他们的推动下,摄影真正成为了一门社会广泛认同的艺术形式,鼓励了更多人加入到摄影创作中来。

### 三、标准的松动:三十年代的历史情境

摄影作为一种新兴的视觉媒体,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对这个媒体的认识是有限的,而且人们对于这种媒体的价值建构,往往会诉诸于以往的经验。所以写意摄影的理论和画意摄影的实践,实在是因为在摄影之前人们的重要视觉经验就只有图画一种。<sup>[27]</sup>所以,摄影的出现会让人们很自然地运用已经发展已久的图画理论,这一点中西皆然。只不过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绘画经验有所不同,这也让中西方产生了不同的画意摄影风格,但都是跟本文化的视觉经验一脉相承。

但我们当然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用图画理论解释摄影,用对画意的模仿来进行摄影创作,只把摄影当作对图画的现代化模仿,势必会产生“摄影不如画”的总体认识,即摄影地位再高,也不会高过绘画。其实这样的认识在《半农谈影》中就有出现:“照相总比不上图画,这也是件千真万确的事。”<sup>[28]</sup>当然从刘半农行文的总体倾向上看,他是要驳斥这种说法的,但是他所举的两个例子却都没有说服力,也不能驳倒时人的这个观点。一个例子主要是说明照相跟用乐器弹奏之类一样,虽然是假借的,但是不妨碍其艺术性,这个与他谈论的照相与绘画的比较没有关系。另一个例子,刘半农说如果让一个人看一张极好的照片,人们会说好归好,可惜是照的,不是画的,而如果让一个人看一张极差的画,那人却会说这算不得画。也就是说,人们对照片的评价是先看是不是画,再看好不好,而人们对绘画的评价则不看是不是画,只看好不好。

如果摄影只是为了模仿画意,摄影所要达到的功效跟绘画一模一样,只是一种模仿绘画的现代工具,那摄影当然比不上绘画。一件郎静山照的《春树奇峰》和一件画家画的《春树奇峰》,如果让人选择的话,确实看不出摄影的优越性在何处。人们有这种感受是很正常的,而秉持着这种摄影理论的刘半农自然也不可能对这种观点进行有力的驳斥。

所以,刘半农等人的摄影理论与摄影实践,确实让摄影脱离了“奇技淫巧”而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认可的艺术形式,但是这种雅俗的判断方式和来自于中国传统审美的评价体系确实不能完全适合摄影的需要。其可以作为一种对摄影批评的救急方式,但不会适应于摄影艺术的长期发展。更何况摄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形式,在本质上就是对“雅俗之分”这种评价体系的一种消解。

#### (一) 大众传媒时代与摄影的可复制性

摄影技术诞生于一个大众传播时代中,可复制性是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本雅明在他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sup>[20]</sup>中已经指出,在一个艺术品可以被无限次的机械复制的时代中,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那种“魅影”,即某种程度上的神秘感,消失了。艺术作品通过复制行为和观众(大众)的距离变短了,艺术品可以被放在任何地方,而非仅仅在特定的唯一位置进行陈列。而跟机械复制时代来临之前的艺术作品不同,摄影作品本身就是可复制的,而不必假借其他的方式进行复制(如绘画可能需要借由摄影或者木板水印进行复制)。而作为神秘感体现的“魅影”的消失,艺术品和大众距离的缩短,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艺术品解释权的下放和作为实际的高雅艺术的破产。对艺术作品的创作、解释和欣赏不再属于某一个上等阶层,而借助于大众传媒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摄影传入中国,首先是通过照相馆跟社会大众进行功用性的结合,其次是通过各种画报对大众进行图像化的视觉启蒙。而画报则是图像大众传媒的最重要载体,对市民文化起到了补充和建构作用。摄影画报已经将视觉传播变得具有日常

化和大众化,各种大众传媒已经促进了“通俗文化的兴旺发达”,亦即“底层文化的崛起”。<sup>[20]</sup>

而当大众文化崛起,艺术和欣赏者的见面方式发生了改变,连原本的高雅艺术绘画都作出了改变,二十世纪的海派绘画就是一个例证。根据石守谦的研究,二十世纪初,绘画与观众见面的主要方式已经从古代的雅集变成了美术展览会,而参加美术展览会的人是当时社会的新精英阶层。虽然这种新精英阶层还是工商为主的富裕阶层,但是这也比古代的仅仅是学养丰厚的精英阶层人数和范围都要扩大许多。而且,这种美术展览会“以‘公开性’的展示取代了过去‘封闭式’的雅集活动,将艺术的观众由朋友知交的具体少数扩及其不计身份姓氏的芸芸大众”<sup>[21]</sup>。艺术品观众范围的扩大也带来了画家创作的某种改变,故而“雅俗之争”其实也是中国美术界在民国时期所争论的重要话题。

通过大众传媒的发展,底层文化逐步崛起,而通过机械复制,艺术品本身所带有的神秘感的“魅影”也就不见了。所以本雅明指出,艺术品将“不再建立在礼仪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上,即建立在政治的根基上”<sup>[22]</sup>。其实在民国时期,知识精英早就认识到通俗文化正在崛起。并且知识精英也想要推动民主、开启民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白话文的书写也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文学,为中国的通俗文学注入了活力。知识界已经做出了这种改变,或者说做出了某种由精英转向大众的思考。可是,虽然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之一,可是却将摄影艺术推向了相反的道路,这一方面当然说明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歧性,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呼唤是很有见地的了。

所以,借由中国传统的雅俗之分,将一个本身带有可复制性的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行高雅化的尝试本身就不会长久。况且,在一个大众文化逐渐崛起的时代中,一个文化的解释权正在被大众逐渐掌握的时代中,将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摄影的解释权缩小、上移,虽然对这种文艺形式的艺术性思考有积极作用,但是恐怕

就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式微。

## (二) 战争情境与纪实作品的兴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这一时期,新闻画报开始大批产生,新闻纪实摄影也十分受到民众的欢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的新闻摄影异常活跃,来自抗战前线的摄影图片在报刊上常常出现,各种战事新闻摄影画册风行一时。<sup>[31]</sup>《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一书更是把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三十年代成为“(新闻)摄影机构大发展时期”,并且认为这跟当时“民众关心国是,渴望目睹时局的演变”的社会思潮有关。<sup>[34]</sup>摄影记者这一职业也终于获得民众的尊重,成为“在社会占有重要之地位者”<sup>[35]</sup>。但需要指明的是,在这一时期,虽然新闻画报在社会上满足了民众的获知需要,而且很受欢迎,但是新闻纪实摄影并没有引起精英知识分子太大的注意,也并没有撼动自刘半农以来的摄影中“雅俗之分”的理论体系,这一点从当时举办的多种抗战摄影展中可见一斑。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开始出现一些为了抗日而举办的摄影展览,可是这些摄影展览还是大多延续以往的审美标准,以风光照片为主,以画意摄影领军人物的作品为主,而这些摄影展览支援抗日的途径主要还是通过义卖作品来进行资金捐赈。如1932年举办的“三友影会义赈摄影展览”,参加展览的就包含了画意摄影的领军人物郎静山,可是这次展览“从展品的题材内容看,似和以往影展无异”<sup>[36]</sup>,只是说展览的目的发生了变更,并且展览所得尽数捐献。在1935年举办的“铁华游日展览”影响更大,据说参观人数过万,但是从标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展览的内容是日本的风光,所以何铁华说这个展览是本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sup>[37]</sup>的目的举行的,后来他还举行了名为“沦陷区名胜”的影展,也大多延续风光摄影的题材。而1936年“敖恩洪、卢馥、卢毓联合援绥影展”中,《申报》对其的介绍仍旧是“简是一幅唐宋名画”“优美”“富有诗意”<sup>[38]</sup>,而他们对抗日情绪的渲染也大多通过讽喻的写意手法,如标题为“何日能还我”的作品拍摄的是东北长白山上的青松,而他人的评论也是说“除摄

影艺术之外,尚有深刻的用意焉”<sup>[39]</sup>。

从中可以发现,在这个时期,虽然有大量新闻画报的出现,有许多新闻摄影作品的产生,但是以艺术性为主要追求的摄影展览却没有选用这样的照片。这些以艺术性为追求的文人摄影师对摄影艺术的理解还是沿用了刘半农之前的理论,对摄影作品好坏的评价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审美范式,拍摄的内容也大多延续自画意摄影的传统,只是将展览的目的做了变更。而这当然没有撼动摄影评价体系的雅俗分别。

但是在这个民族危亡的时代,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情境中,以中国传统审美旨趣为导向的画意摄影已经不能对接当时那个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国族的危难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为人生而艺术”思潮的影响,需要艺术家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和现实政治相结合,从而起到唤醒民众的作用。应该讲,当时的社会情境“对那些坚持不肯放弃文雅立场的艺术家们,自然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压力”<sup>[40]</sup>。所以当时著名的摄影师中有一部分就开始舍弃传统中国画中所表达的出世、离尘的拍摄对象,转而拍摄一些有社会针对性的纪实风格的照片,如当时和郎静山并称为“南郎北张”的张印泉。他“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社会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一改初衷”<sup>[41]</sup>,舍弃了原来那种带有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画意摄影模式,转而进行纪实风格照片的拍摄。

艺术的功能性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被突出强调了,艺术对唤醒民众的效用也被提出。在摄影领域也有人振聋发聩地呼召“真正的摄影家绝不是信手乱拍,也不是唱一唱无可奈何的哀歌就可以了。摄影家要以直观来把时代的一切包括在他的作品里”<sup>[42]</sup>。但是这样的直接针对摄影艺术本身提出的呼喊还是少数,而且作为时代最真实反映的新闻纪实摄影在当时的摄影界仍然较为边缘、不算主流,甚至仍然有大量的画报和新闻杂志的新闻摄影作品都没有摄影者的署名。

## 四、突破“雅俗之争”:沙飞及其同仁的新标准

可以说,在这个时代中,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标准来替代刘半农带有雅俗意味的,根植于传

统中国审美的摄影作品好坏评判标准，来重新厘定摄影作品的好坏标准和价值评判标准。而此时，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影响巨大的左翼思潮和革命意识形态为这种新标准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在中共“文艺大众化”的号召下，左翼思潮开始进军到各种文艺形式，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1年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及其后的“左翼剧作家联盟”集合了当时社会中一大批最有影响力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他们的左翼理念以及在左翼思潮影响下的创作实践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成立的仅是“左联”和“剧联”，直接受到这个思潮影响的是文学领域和戏剧领域，但是在这些组织中，也有来自于其他领域的成员，比如冼星海就是“左联”的成员，后来“剧联”也提出了“向电影进军”的口号，这使得左翼思潮几乎渗透到各种文艺形式之中。左翼的文艺提倡文艺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希望发挥文艺所可以具备的发动民众的作用，认为文艺应当作为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上文中提到的摄影界零星的倡导摄影为时代服务的呼声，也正是在这个大的文艺思潮背景下提出的。<sup>[43]</sup>

#### （一）作为武器的摄影

而这种呼唤摄影为时代服务的声音只有到了沙飞的手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新的摄影理论，并且由于沙飞和中国当时的左翼政权的结合，这种新的声音才最终使得摄影冲破了“雅俗之争”的桎梏。

在1942年沙飞加入中共时所写的《我的履历》中，他自陈他最开始是在电影、木刻和文学三者之间徘徊，并没有想到要从事摄影这份工作，直到后来，他在外国的画报上看见了一些新闻照片，所以觉得很感动，便想要从事摄影的相关工作。所以沙飞对摄影的最初触动就是来自于新闻照片，而非当时中国最为流行的画意摄影。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比较深刻地分析了摄影与电影、木刻和文学三者的不同，最终认为摄影因其真实和高效而拥有跟另外三者相比的显著优越性。也就是说，他对文艺道路的选择并不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三者，而是充分显示了他对文艺功用性的理解。

在1937年在桂林举办的影展中，他写有一篇《写在展出之前》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我总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象的工具”<sup>[44]</sup>。这个观点跟刘半农的“要把作者的意境，借助照相表露出来”大异其趣，沙飞的摄影观是将摄影与现实联系，而非与个人的主观意境（而且这种意境往往是既有的程式）联系。而且沙飞将那些画意摄影的实践认为是人们仍将摄影看待为“一种纪念、娱乐、消闲的玩意儿”<sup>[45]</sup>的体现。对于这些作品，沙飞认为是“忽略了艺术的意义”<sup>[46]</sup>。而当时出版这些作品的画报，沙飞则认为同样是“无聊帮闲的甚至是反动的”<sup>[47]</sup>。所以沙飞首先是猛烈批判了画意摄影的艺术表现，认为这种摄影方式是对现实的逃避，是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深渊，其次提出了他的摄影观，即摄影是一种“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摄影不是完全作为审美而存在，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唤醒民众的武器而存在的。在他同年所写的另一篇文章《摄影与救亡》中，他同样提到的这个观点，一方面“‘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另一方面，摄影“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sup>[48]</sup>

值得注意的是，沙飞是首先成为了一个左翼青年，才开始选择从事何种文艺门类的。所以他实际上是采用了左翼的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以“写意”为理论基础的画意摄影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他通过使用“反动”一词来评价已有消闲画报，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评价体系，那就是政治性的评价体系，即将摄影艺术进行进步和反动的二分。而这可以作为一种对“雅俗”二分评价体系的替代方案，并且也在后来的操作中实际替代了旧有的“雅俗”评价。

如果说在1937年之前，他对摄影进行批评所采用的方法只是带有一定政治性，而并没有完全形成新的摄影理论的话，那么在他前往晋察冀边区，成为了聂荣臻领导下的中共军队中第一名专职摄影记者之后，当他给吴印咸的《摄影常识》作序时，那篇序言就可以被认为是新的摄影理论的大致完整的表述。如果说在他之前的思想中还仅仅是对传统摄影方式进行“进步”与“反动”

的二分，并没有阐明政治性在摄影实践中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话，在这篇文章中，他已经可以批判那些认为摄影仅是娱乐消闲的人们“根本忽略了摄影的政治意义”<sup>[49]</sup>，政治性的标准在这篇文章中被正式并且完整地提出。

沙飞认为：“在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过程中，一切都必须为抗战建国而服务。”<sup>[50]</sup>他对摄影的认识已经完全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进行理解，这与左翼思潮对文艺的看法一脉相承。而摄影则被他看做是“一种负有报道新闻职责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一种锐利的斗争武器”<sup>[51]</sup>。在进行拍摄的过程中摄影师需要有“正确的政治认识”，而照片的拍摄则是一项巨大的政治任务。在这篇序言中，他通篇没有提到摄影的美感问题，只是把摄影当成了文艺战线上一个肩负着政治宣传任务的文艺武器。可以说，他已经从“雅俗之分”的传统摄影理论和与中国传统山水画一脉相承的摄影审美中走了出来，而使用了唯一的政治性的标准（即是否可以为抗战建国服务）作为评判标准。

#### （二）新标准下的摄影实践：《晋察冀画报》

当然这个标准的提出和这个标准产生影响并不是一个概念，如果没有沙飞和中共政权的结合，并且在中共领导之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摄影建设和摄影活动，如果没有这套理论和中共宣传建政的紧密结合，并且通过行政力量推广，可以说这套理论虽然有沙飞提出了，具备有冲破雅俗之争的潜质，但是仍然会像其他的具有时代感的呼号一样，可能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沙飞由“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到摄影是“重大政治任务”的认识，有一个深化和理论化的过程，而这个理论化的过程也跟沙飞在中共领导下的摄影实践，以及将中共的革命文艺理论与摄影结合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进行这套理论的推广和具体实践中，沙飞等人在晋察冀边区的支持下筹办并且正式发行的《晋察冀画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笔者在《走向群众：〈晋察冀画报〉研究》<sup>[52]</sup>一文中已经论证，《晋察冀画报》直接隶属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是军队下属的一份画报，而且

画报社的全体成员都来自于军队。在每一期《晋察冀画报》的封面上，都写着“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而且作为画报主要创办人的沙飞，当他从大都市直接来到晋察冀，见到聂荣臻的时候，聂荣臻直接就让他参军，成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第一任编辑科长。画报的创办人直接进入了党的宣传和军队系统。画报的成员来自于军队，画报供稿的来源是军队，每一名《晋察冀画报》的摄影记者都是军人，在军人的身份中，他们完成了摄影机和枪支的类比，这是沙飞“摄影武器论”的象征所本。沙飞及其同仁在官方的支持下，普及了摄影知识，完成了晋察冀军区内部的摄影队伍建构，培养出一大批掌握摄影技术并且为宣传总目标服务的新摄影师和摄影记者，这支庞大的新队伍就和以往服膺于传统美学的摄影队伍形成了抗衡的可能。

而他们所接受的摄影教育就是沙飞的“摄影武器论”，是沙飞所奠定的新的摄影理论和摄影评价体系。从现在留存的一份《晋察冀画报》第三期摄影训练队记录本（高良玉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察冀画报》进行摄影队伍培训的内容。这个笔记中大致分为三个大的部分，即新闻摄影、摄影术和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即如何进行报道），而第一个部分虽然名字叫新闻摄影，却讲的是摄影工作的功能、作用、前途及意义。

在第一个部分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晋察冀画报》要让初次接触摄影的战士们形成怎样的摄影认识。这个部分有五个小标题，分别为“摄影工作的发展及其前途、作用”“摄影工作是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又是民族、阶级斗争中的锐利武器”“摄影工作的内容：真实性、艺术性。在整个世界民主（笔者注：似为民族之误）界限阶级社会无消灭前，新闻摄影工作和其他斗争武器是一样的”“摄影工作开展（笔者注：开字后一字不识，按内容来看应为开展之意）与情形中的几个故事”“怎样才是一个摄影的新闻记者”<sup>[53]</sup>，在五个标题中摄影作为武器的提法出现了两次，而在正文中，几乎每一个小标题下都有“摄影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的相关表述。而且笔记中延续了沙飞对传统画意摄影的一贯批判：“仅停

留在商业、消遣和娱乐中，不但不能为国、民出力，而反要害人。”<sup>[54]</sup>

在培训中，态度的训练非常的重要，在“怎样是一个摄影的新闻记者”一节中，第一条就是“报道光荣的一面和我们的……另外则要报道敌人的欺骗和残暴行为”<sup>[55]</sup>。因为“我们要用我们的武器……把社会的黑暗与光明反映出来，加以说明。使人民大众知道能应走的道路，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与抗战必胜信心”<sup>[56]</sup>。而且，在面对不同的拍摄对象时还需有不同的态度，基本的态度是三种：对人民、军队和党（指中共）要弘扬要赞成，对敌人和人民公敌则需要暴露其缺点指出其灭亡前途，而对于朋友及同盟者则是要联合、批评。<sup>[57]</sup>这都是作为“任务”告知给参与培训的学员的。所以，在《晋察冀画报》庞大的摄影队伍培训中，政治性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摄影作品都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而画意摄影和刘半农理论中所强调的“写意”和艺术性表达在摄影培训中则一概没有提，甚至还对其进行了猛烈地批判。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创办的《晋察冀画报》，其内容的政治性自不必提，以《创刊号》为例，其新闻摄影板块分成了五个大专题加六个小专题，五个大专题分别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保卫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53幅照片）、“一千五百万人民在战斗中生活在战斗中锻炼”（21幅照片）、“团结、抗战、民主”（27幅照片）、“生产进行曲——春耕秋收”（9幅照片）、“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22幅照片）。<sup>[58]</sup>通过共计132张照片，《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的这几个大专题就涵盖了军队战绩、群众参军、民主政治、农业生产、文化建设等边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把军事和军队摆在了重要的突出位置上。从主题上看，摄影的内容是跟政治宣传，尤其是现实政治的宣传紧密相关，而对摄影作品的阐释、摄影作品的标题拟定也都服从这一政治性。

但是我们从《晋察冀画报》刊载的摄影作品中依然能够找到一些跟画意摄影一脉相承的印记，只不过对摄影作品的评价体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在《晋察冀画报》第二期中有几幅描绘田园生活的摄影作品，同样有画意摄影中常常出现的

渔舟意象，把其中一幅由孟振江拍摄的“白洋淀上的渔船”<sup>[59]</sup>跟刘半农在1928年拍摄的“静”<sup>[60]</sup>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有诸多类似之处，但是对摄影作品的阐释发生了改变。“白洋淀上的渔船”被归在“淳朴富庶的田园生活”这一主题之下，实际上表现的是在战争尚未波及的地方人们的美好的生产劳作场景，表达的是对和平的向往和战争尽快结束的渴望。而这个主题被放置在“子弟兵的战斗战绩”和“战争卷起在家乡”两个主题之间，所要表达的意思自然是子弟兵的奋斗是为了人民群众和平的田园生活，而一旦“战争卷起在家乡”就变成了一派恐怖的景象，那就是“日寇掘堤纵水为患”和“村庄尽成泽国”了。<sup>[61]</sup>所以这些照片乃是要在组合之中唤起人们对敌寇的痛恨和对人民军队的热爱，这种服从于政治性的目的来进行的解读体现在图注和画报的总体编排之中。

所以，画意摄影的视觉传统可能还在《晋察冀画报》中有所延续，但是对画面的诠释和评价体系已经完全变更了。这也就不妨碍沙飞采用充满艺术性的手法来拍摄长城，因为长城在他的镜头中已经不是简单的风景，而是“作为晋察冀八路军的抗日象征”<sup>[62]</sup>。在这个意义上，《晋察冀画报》中刊载了大量的风景照片就并不显得奇怪，比如《晋察冀画报》第八期由吴群拍摄的五台山组照<sup>[63]</sup>，其中第一张如果放在画意摄影的评价体系中也会是一张优秀的照片，但是一旦配以“雄峙敌后的五台山”的标题，山上的宝塔就从超然绝世、代表隐逸安然的风景变成了制敌的武器和敌人身后的带有巨大压迫感的斗争隐喻。

在《晋察冀画报》中，摄影的创作标准、摄影的评价体系都正式发生了变革，并且通过这个大众传播的工具实现了革命斗争和对群众宣传的重要功能。该报建立了庞大的新闻摄影队伍，在新理论指导下拍摄了大量的摄影照片，并通过一个固定出版的刊物进行系统性地传播。而且这个摄影理论、摄影实践、摄影评价体系都和中共的政治权力紧密相连，实现了沙飞由下而上的理论建构到自上而下的组织化传播。通过《晋察冀画报》，沙飞的“摄影武器论”真正实现了对中国摄影史中“雅俗之争”的突破，形成了先进与反动、

为人民和不为人民的新的评价标准。使得中国摄影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审美，摆脱了“仿画”的附属地位，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和审美建构。并且，在中共最终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在《晋察冀画报》的创办中所形成的摄影队伍最终成为全国各大画报的领军人物，掌握了摄影艺术的话语权，这一套摄影理论成为了全国共同遵循的摄影理论，完成了中国摄影史的一个重大转折。

## 五、结论

如果我们细究“雅俗之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士民之辨”。石守谦有对此有精到的分析，他认为雅俗的区分最早应该可以追溯到孔子对雅乐和郑声的区隔，前者是统治阶级的音乐，后者则是流行于一般民众中的音乐，而“孔子既是士大夫阶级的成员，他的立场自然是‘恶郑声之乱雅乐’”。所以他清楚地指出“‘雅’与‘俗’不仅表示两种艺术品位，而且关系着统治精英与受统治庶民上下两个阶级的区别”<sup>[64]</sup>。雅与俗不仅代表着在文化精英的立场上来看待的艺术品位之高低，还是确定统治精英文化优越性和统治地位的一种表现。

到了近代，大众传媒获得了极大发展，通俗文艺崛起，而新的阶层分化也逐渐取代了古代简单的“士农工商”的区分。可是这样的艺术品位却仍然在艺术品鉴的惯性中有所留存，文化精英的优越感也还存在。如果说在过去，对于文化精英而言，“教化人民虽是他们的‘天职’或不可逃避的使命，但他们似乎绝无意于与大众分享他们的艺术品位。”<sup>[65]</sup>那么在近代中国，虽然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大众传媒的兴起对民众的启蒙产生了十分有益的作用，而且启蒙民众也成为文化精英所想要完成的使命，但其实很多学者也发现，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成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性格的二重性，比如，他们提倡平民主义口号却反对通俗文学作品<sup>[66]</sup>，提升白话地位却经典化了类似于“新文言”的白话文<sup>[67]</sup>。

在文化方面，由于艺术作品市场化、商品化程度的加深，文化精英也开始不得不谋求一定层

面的大众赏爱，虽然他们纡尊降贵的对象还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新精英阶层”，但也有许多的文化精英在从事大众传媒的相关工作，比如《点石斋画报》上面的绘画作品大抵都出自于名家之手，画意摄影的相关作品也会通过画报或者期刊的方式进行传播，五四新文学也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一样都在报刊上连载、传播。可是，虽然借助于大众传媒，文化启蒙有了方便之门，但是文化精英对大众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还是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对大众宣扬自己高雅的艺术品位，其目的不仍然是为了带领大众脱离“俗”的艺术品位？所以就本质来看，文化精英虽然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愿意或者是不不得不跟大众分享自己的文化品位，但是仍然是站在“雅”文化的自豪区域中，想要借由大众传媒，把自己所归属的雅文化和雅俗标准传递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实际上，仍是一种传统雅俗观念的新延续。

而这种观念，实际上只有到了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逐渐得到改变。在这个思想的领导之下，再加上沙飞对“摄影武器论”的具体论述，摄影作品好坏的评判标准就从传统的“雅俗之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对摄影作品的审美就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审美中解放出来。沙飞及其团队的具体拍摄实践为摄影找到了一种新的判定模式，那就是进步的和反动的、为人民的和不为人民的，并且通过在中共左翼政权下的系统性实践完成了中国摄影观念的范式转移。

中共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来替代传统“教化群众”的观点，这就改变了“先进的艺术家们总是居高临下地俯看芸芸众生”<sup>[68]</sup>的传统模式，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替代“雅俗”这一艺术家和观众的关系和艺术的评判标准。所以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思想确立，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只有当文艺是为大众服务的，而不是教化大众的，只有当文艺是需要以政治性和进步性来评断好坏时，艺术家就成了掌握艺术本领的战士，成为了中共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士兵。艺术家与大众的传统关系被彻底颠覆，艺术家不再具有自士大夫一脉相承的传统优越感，而是变成了人民大众面前

的一个学生。

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沙飞及其团队为摄影所奠定的新的传统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摄影作为文艺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脱离了雅俗的评断标准之后,在新的标准影响下逐步建立了全国范围的摄影体系和摄影队伍。无论是摄影作品的创作还是摄影作品的批评,都遵从政治性这一标准。摄影作为艺术品的传播真正如本雅明富有先见的论断一样,脱离了礼仪的根基,而建立在了政治的根基之上。

### 参考文献

- [1] (英)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 1842—1860[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9—11; 全冰雪.中国照相馆史 1859—1956[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22.
- [2][36][39]马运增,陈中,胡志川,钱章表,彭永祥.中国摄影史 1840—1937[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47—49;216;217.
- [3][8]陈中,谢建国.中国影像史 第2卷 1839—1900[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149;170.
- [4]鲁迅.论照相之类[N].语丝,1925—1—12.
- [5][6][7][11][12][13][14][15][16][17][18][28]刘半农.半农谈影(节选)[A]//顾铮,林路,编.中国摄影大系 理论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11;12;12;11;11;11;11;13;13;13—14;12.
- [9]张伟.沪读旧影[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32;亦可参见张伟.影楼沧桑堪追忆——晚清民初的上海照相馆[J].中国摄影,2011(7):61—62.
- [10][26]顾铮.摄影这个新瓶子——论刘半农与陶冷月的摄影实践[J].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9(5):85;84.
- [19][31][40][64][65]石守谦.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88;392;402;388;388.
- [20]赵俊毅.中国摄影史拾珠[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3:19.
- [21]郎静山.摄影大师郎静山作品集[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90:2,5,15,27.
- [22]郎静山.集锦照相[A]//龙惠祖,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253.
- [23]郎静山.集锦作法[EB/OL].[2021—2—5]. <http://news.cn-photos.net/learn/note/20060720/102208.html>.
- [24]郎静山.摄影与中国绘画艺术[A]//中国摄影学会.摄影艺术论集.台北:中国摄影学会,1955.
- [25]郭秋孜.民国摄影与中国视觉现代性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39.
- [27]亦可参见潘万里.早期中国本土摄影理论中的画意模仿论[J].中国文艺评论,2019(11):53—56.
- [29](德)本雅明.单向街[M].陶林,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73—107.
- [30]陈阳.视觉现代性:近代画报出版与视像变革[J].中国出版,2015(14):65.
- [32](德)本雅明.单向街[M].陶林,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82.
- [33]甘险峰.中国新闻摄影史[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8:41—45.
- [34]马运增,陈中,胡志川,钱章表,彭永祥.中国摄影史 1840—1937[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136;亦可参见杨克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摄影[J].中国摄影家,2007(7):61.
- [35]林泽苍.摄影记者在社会之地位[N].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7—4—9.
- [37]何铁华.我的早期摄影生活简述[A]//中国摄影家协会研究室,编.中国摄影史料(第五、六辑).1983:25.
- [38]敖恩洪卢氏昆仲联合援绥影展[N].申报,1936—12—25.
- [41]宿志刚,林黎,刘宁,周静.中国摄影史略[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58.
- [42]刘同慎.献给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们[N].晨风摄影文艺合刊 第四集,1934—3.
- [43]可参看曹培鑫,赵鹏,彭天笑.从文艺大众化到摄影武器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的影像转向[J].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7(1):55—68.
- [44][45][46][47]沙飞.写在展出之前[N].沙飞影展专刊,1937—6—25.
- [48]沙飞.摄影与救亡[N].广西日报,1937—8—15.
- [49][50][51]沙飞.摄影与政治、艺术和科学——《摄影常识》序二[A]//顾铮,林路,编.中国摄影大系 理论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43;42;42.
- [52]曹培鑫,赵鹏.走向群众:《晋察冀画报》研究[J].现代传播,2017(5):52—59.
- [53][54][55][56][57]石志民.《晋察冀画报》文献全集 卷3[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1364—1379.
- [58]新闻摄影[N].晋察冀画报,1942—7—7.参见罗光达,编.《晋察冀画报》影印集 上[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27—67.
- [59]孟振江.白洋淀上的渔船[N].晋察冀画报,1943—1—20.参见罗光达,编.《晋察冀画报》影印集 上[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122.
- [60]刘半农.静(1928)[EB/OL].[2021—2—5]. [http://www.cpanet.org.cn/detail\\_picdetail\\_100217.html](http://www.cpanet.org.cn/detail_picdetail_100217.html).
- [61]战争卷起在家乡[N].晋察冀画报,1943—1—20.参见罗光达,编.《晋察冀画报》影印集 上[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123.
- [62]曾小凤.世变·革命·宣传——解放区摄影的视觉表达与观念建构[C]//中央美术学院 2014 年青年艺术批评奖获奖论文集.北京:《美术研究》杂志社,2015:4.
- [63]雄峙敌后的五台山[N].晋察冀画报,1945—4—30.参见罗光达,编.《晋察冀画报》影印集 上[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404.
- [66]胡朝雯,方长安.五四小说纯雅身份的形成[J].孝感学院学报,2009(7):15.
- [67]高玉.论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及其历史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52.
- [68]林木.毛泽东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与二十世纪文艺的大众化思潮[J].美术,2002(4):14.

## Transcend the Dispute between High Culture and Low Culture: " Photography as Weapon" and the Paradigm Shift of the Photography Ideas in China

Zhao Peng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ese people have gradually encountered with photography and carried out photography activities. Because of its mechanical nature and functionality as the portrait record, photography was originally called "taking small pictures (Zhao Xiaoxiang)", which was not regarded as a fine art at all. Pictorial photography advocates, led by Liu Bannong, followed the "freehand brushwork" tradition in Chinese classic painting and establish the Chinese photography theory, made the critic of the "elegance or vulgarity" of photography to promote the artistic status of it. However, as a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photography eliminates the authenticity of artworks, which show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culture. Using the traditional painting theory to judge photography as "elegant and vulgar", the pictorial photography advocates still imprisoned it as an accessory to painting. In the 193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eft-wing trend of thought, Sha Fei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photography as weapon" and founded the Jin-Cha-Ji Pictorial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carry out the systematic photographic practice. He used the political criteria of "progress" and "reaction" rather than "elegance" and "vulgarity" to judge photography, completing an important tur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tography.

**Keywords:** Pictorial photography; Liu Bannong; Lang Jingshan; Sha Fei; Photography as Weapon; Jin-Cha-Ji Pictorial

**Author:** Zhao P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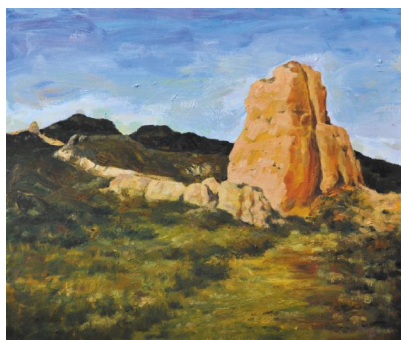
---

(上接第 8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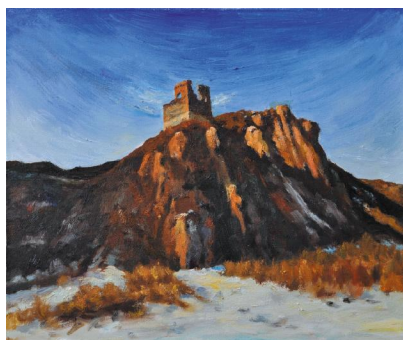
and positive biopower (discipline power).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the ever-changing media technology has profoundly rewritten the social reality and reshaped the pattern of biopolitics. When the digital ecology of human and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taking shape and the human natural body begins to transform into a "digital body", biopolitics will have a new spiritual core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technology disenpowerment" represents the negative decision of biopower, whil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represents the positive exertion of biopower.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prospect of biopolitic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Keywords:** technology disenpowerment;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biopolitics; discipline power

**Author:** Tang Zhiha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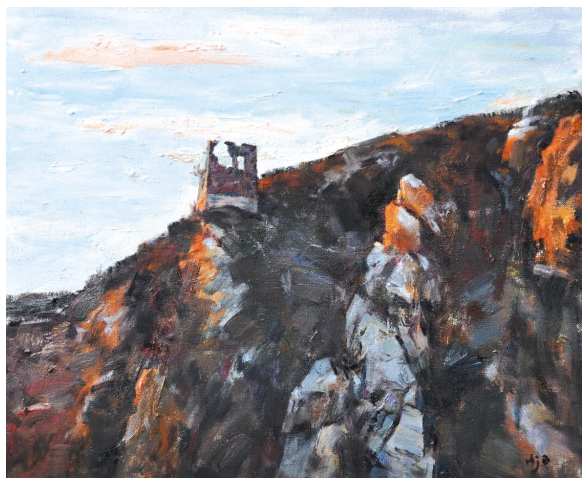
《塞外长城》油画 2020 年 50 × 60cm



《冬日雄关》油画 2020 年 50 × 60cm



《冬日余晖》油画 2020 年 50 × 6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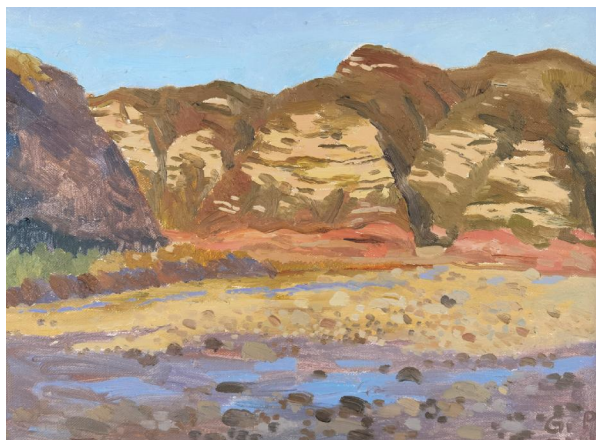


《古城新辉》油画 2020 年 50 × 6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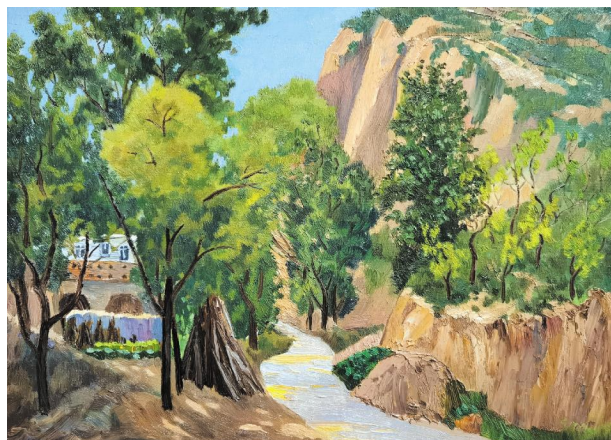


《青山云长》油画 2020 年 60 × 80cm

作者郝建斌，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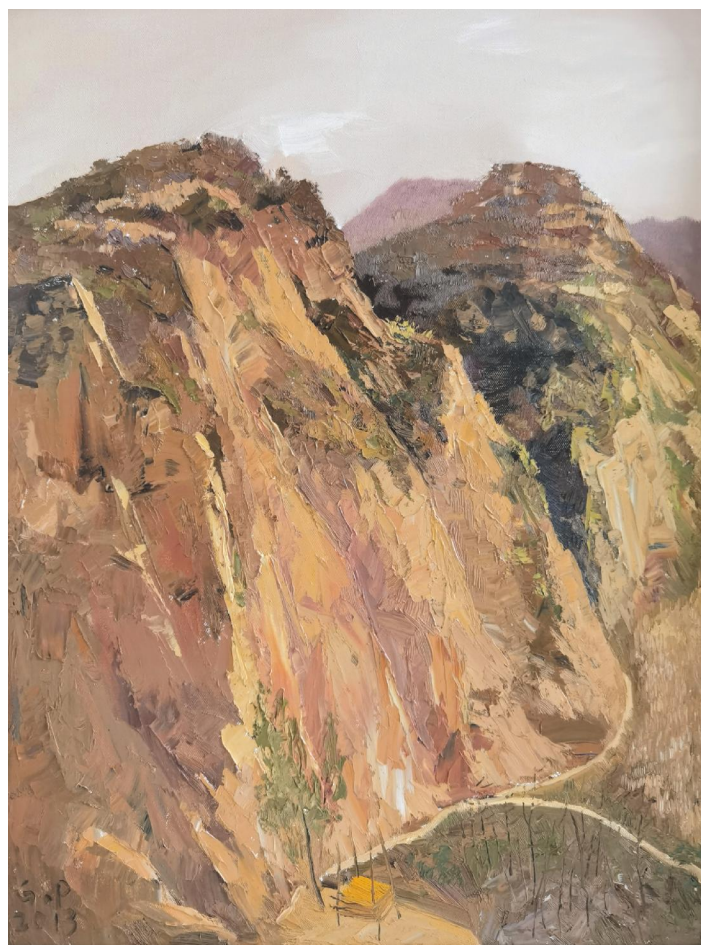
《黄河渡口》布面油画 30 × 40cm



《陕北印象1》布面油画 50 × 70cm



《陕北印象2》布面油画 100 × 180cm



《陕北印象3》布面油画 50 × 60cm

作者郭鹏，榆林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

# 四川云2.0

数据驱动 AI 赋能

12月28日上线发布

数据共享

智能融媒

社会治理

2021  
善治新力量

第二届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天府论坛

指导单位

中共四川省委网信办 中共四川省委城乡基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办单位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承办单位

川观新闻 川观智库

